

高爾基原著
瞿秋白 呂伯勤 合譯

爲了人類

掙扎社版

MG
IS12.65
1

爲 了 人 類

高 聖 呂
慶 秋 信
著 原 著
合 台 畫
著 譯

掙 扎 社 出 版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一 月



3 1770 9075 4

序 言

關於本書中的論文，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會說過：

『在歐洲的大衆面前介紹高爾基，那是不要的了。就作家的一點來說，他的名望，顯然已經是普遍地建立了。可是對於他的另一種名望，法蘭西的美學家卻還喜歡把來吝嗇地藏在他們的外衣裏面。這就是正在建設着一個新世界的普洛知識階級的戰士，主角和領袖的這個高爾基。這個高爾基幾乎可說是歐洲獨一無二的人物——無論如何，他是最前列，也是最澈底的——只有他才敢把『中堅份子』看成可污辱的榜樣（這個榜樣，人們不敢追隨，直到船沉的時候，他們才想像耗子一樣地游開去，救活自己），他是藝壇的偉大名字，偉大智者和偉大作家，他把他的天才和名望交給了革命的陣營，並且從防禦的另一邊向西方的知識份子說了話。我自己，也曾跨過這防禦，握着高爾基

的弟兄一般的手。

一兩年來，我雖則並不正規地，卻也捧讀着所謂「蘇聯的第一個突擊隊隊員」的這個作家的突擊式的著作——他發表在莫斯科各報上的著作。我所感到遺憾的，就是西方對於那些熱烈的文字，竟然毫無所知，那些文字，不僅是反映着高爾基的強烈的、燃燒似的靈魂，而且表現着他所觀察的所刻劃的，正在建設中的新社會。可喜的，是我在這一部書裏，讓我自己選出了要選剔的幾篇文字。我或許要加選幾篇別的文字——就一個作家之點說來特別給我印象深刻的幾篇文字——為的是它們給我看到了：數世紀來被奪取了語言的效用的，在嚴重壓迫下障礙了文化成就的普洛階級的蘇聯人民的藝術、文學和科學之驚人進展的光景。

現在的這一部書，包含着兩項主要的文字：給敵人的答覆和給友人的勸勉。

前一項文字，指出着蘇聯所進行的批判的無拘無束的權利（因為這些文字，是對於蘇聯所收到的堆積如山的狂吠般的和惡毒的信件의 答覆），在大多數的場合，這些文字是帶着一種譏刺的、暴厲的、無情的作風。熱情洋溢於字里行間。戰爭的氣息也瀰漫着。它們的熱情固然是如此，我卻並不愛讀這些文字，因為它們的效力，是要激起反對者惱怒，而不是要使他們信服，它們的重要性，主要

地是在刺激那些先時已經信從了的人們的戰鬥性。

就我們西方人來說，我認爲這些文字的重要性更大在這些文字里，高爾基以蘇聯勞動者的導師自任，鼓勵而且啓導他們，指示他們以正確的道路，有時斥責他們，提醒他們對於那或許會發生着輕視傾向的歷代流傳下來的文化要表示重視，運用着使他們體驗到時代的偉大性的這種方法，以喚醒情緒低落了的青年參加活動，並把今天的工作和正在我們面前展開着的而又必然會產生一種新的人類的這個豐富生活加以讚揚。在答覆那些哀悼布爾喬亞的朽舊偶像——如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消逝的人們時，他運用着強有力的語言，以表示真個性和真自由的本質，我倒很想把這些話引在這里，因爲我相信這足以排解西方知識份子的恐怖心理，他們是怯懦地蜷縮在他們的窟邊，他們的枯瘦的頭頸屈伏在他們所謂自由之軛下還引爲光榮。

布爾喬亞社會驅使着個人去服務於它的目的——以擷取大多數體力爲基礎的政權的這階級的目的。布爾喬亞國家的個人的自由發展，不但受制於種族，民族，階級和宗教的種種觀念，同時更受制於『民族文化的獨創性』——僅僅是浮面存在着的一種獨創性——的偏私的信念……

我們的國家是建築在一種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的，束縛的觀念是肅清了的，個人已經享受到自由地發展他的一切力量和才幹的權利。

有人會對我這樣說吧：蘇聯政府既然反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並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擁護者虛偽地大放厥詞的而實際並沒有這麼一回事的其他一切『自由』，那就表示你方才說的話是不對的。

我們的國家已經建立着爲個人的最大的最完全的自由，肅清着那幾世紀來阻撓着而且壓制着他的進化的種種觀念。我們的國家，只有在個人變成阻滯個人本身智力自由發展的那觀念的支持者和散佈者的時候，才反對個人。這些恰恰是資本主義政權所依存着的觀念——階級，種族，民族和宗教……

要在勞動者和農民的國家內容許那絕對有害於勞動者和農民的傳統觀念，或企圖向勞動大衆去證明他們的奴隸狀態的合法則性和不可避免性，那都不免是荒謬的，可笑的，唐吉訶德主義吧了。

在另一篇文字里，這位淵博的心理學者把那資本主義國內的『知識獨立』的最後的少數維護者拚命依附着的虛偽的個人性，作了一番明徹的分析，使他們看見他們的努力是怎樣地慘敗了。個人擁護着他那囚在籠子裏的虛偽的自由和明顯的獨立。這籠子——作家，新聞記者，哲學家，政府官員，以及資本主義機構裏的其他一切油膩膩的輪齒都被囚禁着的這籠子——不消說是比農民的籠子舒服得多……

個人主義是階級社會帶來給人負擔的外部的重壓的結果。個人主義是一種個人想抵抗暴力的無益的企圖。既然在一種『自衛』的場合之下知識的發展過程會被阻延，所謂『自衛』便是『自縛』了。這麼一種場合，對於社會和個人同樣是有害的。國家化了幾萬萬塊錢去建設軍備，來對付鄰國；個人主義者化了他的最大的能力給自己抵抗着他被階級社會所範圍着的暴力。生活就是鬥爭嗎？不錯，可是應當是一個人類對自然的基本力量的鬥爭，以征服自然，駕御自然為目的。階級社會把這個崇高的鬥爭變形為一個限制人類的體力而奴化他們的卑劣的戰鬥。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知識份子的個人主義和農民的個人主義，所不同者只在形式上

的表現而已。知識份子的個人主義是比較注目比較炫耀的，可是同樣是原始的，盲目的。知識份子是在人民之上和國家之下的中間的。照理他的生存條件是粗暴的，充滿着戲劇性的，因為他的周圍對他大部分都是敵愾的，這就是他的狗囚的思想，那麼時常地使他把自己的生活條件的負載歸咎於整個的世界，而這種主觀的觀念，便產生了哲學上的消極主義，懷疑主義，和其他卑劣的思想。

我引了這精粹的幾頁，為的是它們恰和我自己的反映相符合，因為在近幾年內的尖銳的鬥爭的過程中，以我的看法，我也得到和這相同的結論。在最近的將來，我想寫一部在西歐的自由思想發生史的血跡斑斑的書。這種危機對於我們法蘭西、德意志和其他國家的數千同志們，都是很關心的，我知道他們正在這樣的路程上暗中摸索着。

對於這種在他們的牢獄裏兜着圈子的囚人般的個人主義的可憐的現象，他們唯一的遁逃數，就是向上逃避在宗教靈魂的冥想裏，或在一個束縛的超然主義者的傲慢的幻夢裏。高爾基很容易的便指證出，由於革命而建立起來的新社會裏的在社會的階級和個人的單位之間被影響了的康健而力強的變化。革命的羣衆產生了情熱的力量，這力量被個人抓住，在他的智力把集體的力量

寫爲一個理想的典型，而更增強了這個力量之後，他把這發電力又送回羣衆裏面去。羣衆的意志，在創造行爲的偉大的進程中，『會做出對於個人是絕對做不到的事業，不管個人的天才是怎樣地豐富。』這一個偉大的意志的知識賜給個人一個英雄的喜悅和興奮，這喜悅和興奮就掃除一切徒然哭喪着臉的人們的歎息：『怎麼好呢？』同時更消滅了布爾喬亞的個人主義的寂寞感。

高爾基對着咀咒生活的灰色，生活的無用和中庸的人們，說道：——

我親愛的青年們，爲了你自己，我誠懇地希望生活會給你一個教訓，使你感受到生活的堅硬的手的重量——我們人類用我們的理由和我們的意志沾潤着的那個偉大而嚴辭的先生的手。我誠懇地希望你們明白你們的怨言是沒有絲毫意思的。……當人們獲得了一個美滿的幸福生活於人類最偉大的年代的時候，在熱心的人們建立着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一個平等的國家，不管舊式的人物反抗得怎麼凶惡，野蠻地反對着每一個新的，歷史終於把他們處死刑的，狂歡的年代裏，埋怨是可恥的。……要是你們，青年人，真的希望要得到一個「壯大而美麗的生活」，那麼，創造它吧，和那些建設着一個需要巨大的能力，空前未有的巍峨的建築物的人們並肩地工作吧。

我們的呼聲將回答從俄羅斯來的呼聲，整個西歐將反響東歐的聲言。這將給那些在多多少少爲商化的政客們和帝國主義的財閥們的虛偽的奴顏婢膝的醜態中求着它的利益的無恥的青年臉上給一個耳紅的愧色，或者給另一種爲了恐懼實踐而停止戰鬥，關在他們房子裏，在一面鏡子前把自己枯死於無益的自慰裏的那些藝術的自滿主義的文藝界的青年的臉上給一個耳紅的愧色。如果他們不能在他們的貧弱的血管裏找到分量充足的血來認清他們的不堅決而改正，那麼，就讓北風把這些枯死的葉子吹掉了，讓人類的森林生出新的後代，更健康，更蒼翠，來覆蓋他們的遺骸吧！在蘇聯，「一億六千萬人民工作着，不僅僅是爲着人民自身的利益，同時是爲着全人類的利益，指給全人類看看知識地組織了的羣衆的意志所完成的偉業。」西歐的各國人民，你們，幾世紀來一向是人類的前衛——現在反使落後了——你什麼時候才再在新世界的建設者的隊伍裏站上你的崗位呢？或許有你，或許沒有你，新的世界終究是會出現的。」

羅曼·羅蘭的這種見解，我是完全同意的，因此曾陸續地譯出了高爾基的論文十多篇，在武漢各大報及雜誌上部份地發表過，一時搜不及，出版者卻又急欲把它出版，同時他擅自主張把瞿譯的

文字一併編入，在篇數上，兩方面差不多，勉強得很的稱之爲合譯。付印後，要我寫一點序言，不得已，就此忠實地說述一下，以免剝削之誦。

此外，我還要說明一點：原著者的許多論文中，重複的議論很多，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在本書中似乎減少了，卻仍多方面反映着新社會的建設過程，關於個人，社會，農民，工人，智識份子，婦女，小孩，文學，哲學，道德等方面，都有極堅強而且透澈的見解。

對於本書出版者的勞績，親自奔走印刷，日夜編校，我仍然是表示十二分的銘感！

譯者一份子寫於漢口綠區。

目次

序言	一
論勞働個人主義與第三種戰士	一
論個人與大眾	一〇
論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四
論農村婦女生活	二二
論婦女	二五
論小孩子	四四
論智識份子	七七

論仇敵·····	一一二
論叛徒·····	一一七
論文化·····	一三三
論文化·哲學·戀愛及死亡·····	一三七
論真實的教育·····	一六二
論文藝及其他·····	一七八
論人道主義·····	一九三
世界文化界的槍痛·····	二〇三
直接地從民間來的——有力的，堅實的·····	二〇八
爲人類幸福而生活·····	二二三

論勞動個人主義與第二種戰士

——給覺醒的東方

我衷心地祝賀着蘇維埃喬治亞勞動者和農民的產業上和文化上英勇的良好結果的勞動之十週年紀念！我原該作爲一個旁觀者來出席這個光榮的慶祝會，來喚起我曾經在四十年前見過的喬治亞的印象；來喚起我曾經開始我的文學事業的提夫里斯城的印象。

我不能忘掉，我就是在這個城市里，舉起過我這四十年來所走過的道路的不很自信的第一步。或許是由於這個國家的堂皇壯大和國民的浪漫主義和溫良，或許正是由於這兩種外力，驅使了我，使我成爲一個從流浪人出身的作家。

在喬治亞的勞動人民的慶祝會上，在這些人民正在當着它的敵人的面前宣佈它的創造精力和成就，它的積極繼續偉大的文化革命的工作的時候，我怕我的抒情主義是很不宜於提出的吧。



然而，同志們，我却要冒昧一下，插入這抒情主義的一斷片。我要訴說幾句關於我對你們和你們的國家的無限的愛，我知道，在我們的時代，我們是沒有容許抒情主義的爆發的餘裕。

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工作的神話樣的成就的日子，歐洲生活的無比的動亂和那不可逃避地急劇地必然要達到它的邏輯的結局——勞働大眾克服資本主義的勝利——的階級鬥爭的銳化的日子——這些日子，乃是從強盜們和寄生蟲們的軛下解放出來的全世界普洛列塔里亞參加這個偉大慶祝會的前夜。

布爾喬亞的閒遊日之前，往往取所謂「瀉下法」；但在全世界普洛列塔里亞的慶祝日之前，卻將取「最後的決戰」的方法。

喬治亞位於接近產油的大富源的地方，如果歐洲的勞働者不能及時地擒住白里安們的咽喉，白里安們自然會派遣他們成千成萬的勞働者和農民去反抗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勞働者和農民。

我們的敵人並不是睡着的。他們卻是驚覺着的，這不僅僅是由於他們的無壓的貪慾，而且是由於恐慌。他們常留意於五年計劃的成就。他們也看到了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隊工作」的驚人的

結果。曾經是社會主義者的白里安，在『布爾希維主義將完全佔領全世界』的這種事實面前，也無法遮掩他的『恐懼心』。尤其在並非一切劫奪者都敢於參加干涉的事實面前，這位老叛徒的『恐懼心』也就加深起來了。他們固然也很明白地看到蘇聯對於布爾喬亞的威脅，可是他們與其說愛好戰爭，寧願說是愛好生意經的。

他們知道，就是不必利用機關槍和大砲，人民也是能够掠奪過來的。日常的掠奪法，和平時的合法化，其結果，一則是危險性較少，二則是喧嚷的聲音也較少。當然，那些靠戰爭專業的利潤，靠製造屠殺勞働者和農民們的武器而發大財的資本家，卻是時常積極備戰的。

請你們注意你們已經知道了的真理吧。全世界普洛列塔里亞必須記住：這是祇有唯一的『真實的，公正的神聖的戰爭』。這就是反資本家的戰爭。勞働者也還必須記住：他們只有一個祖國，正在建設着社會主義的這個國家——蘇聯。

全歐洲和全世界的普洛列塔里亞必須記住：下一次的大戰當中，如果他們不掉轉他們的手臂去反對資本主義，他們必然要像前次大戰時一樣，殘殺他們自己，而且規模更廣泛，所用的方法，也將比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屠殺的破壞性更巨大。

只有兩種勢力存在於世界：一種就是被自身的矛盾，被貪慾和嫉忌所損毀的資本者階級；就是只顧他們自己的事情的，流於荒謬和虛無的，墮落，無力，必然消滅下去的這一階級的份子。

覺醒了的，起來取而代之的，就是普洛列塔里亞，這是那一位把地球支持在他的肩上的神話中的亞特拉斯（Atlas）。這是創造一切事物的勢力，如在蘇聯的勞動階級所表現了的一樣；它能够創造從前所創造不出的事物，以及向來所認為不可能創造的事物：一種平等的國家，資本主義世界中的一種社會主義的社會。

正像在全世界上有它的敵人一樣，蘇聯的勞動者在國內也有敵人。這些敵人，就是想做大寄生蟲的那些渺小的寄生蟲。

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這一類的寄生蟲曾參加過一些活動，他們從勞動者和農民的後方，幫助拖住了地主和廠商。他們的所以參加這項有用的活動，並不是因為他們要解放勞動者和農民，而是希望自己能去填滿這些空位吧了。『納普』（Nap）（註一）鼓勵着而且保證着這些希望。

註一 NAP，與 New Economic Policy 三字的首字組合而成的一個專門名詞，意思就是『新經濟政策』。

然而『納普』僅僅是在有力的社會主義躍進以前的一個休息吧了，而那些希望騎在勞働人類背脊上的人們終於是絕望而且受創了。

他們不喜歡社會主義。他們發着怨言：活不下去了。他們時常給我寄來了含淚的信件和文稿，『給無神論者』——當然是對上帝的擁護——更寄來了其他的文章，他們的悲憤或含怒的聲調在一種溫和的感傷的態度上混和着他們的癡愚的神氣。

舉例來說吧，昨天我就收到過從這些紳士們中的一個人那裏寄來的一封信。這不是一封十分通順的信，卻是怪有趣的，因為這一個半通半不通的寄生蟲正說着他想說的話。他問我：『勞働的個人主義的存在，完全地改變了事物的政治秩序，而現在就把勞働的個人主義唱起白鳥之歌來，那豈不是太早了嗎？』

這真是一曲古歌。所謂『勞働的個人主義』指的就是小私有財產制度——是從這腐爛的泥土中，曾開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毒花，給全世界的農民和勞働者飽嘗了不幸和憂患。那麼，把這個制度的形式『唱起白鳥之歌來』，為什麼還說是『太早』呢？這個制度豈不是爲了無恥的擁護資本主義反對普洛階級而貪婪地吸盡了土壤和寶藏的嗎？

你知道這是爲的什麼嗎？大概是因為『在戰線上的』一個第三種戰士看來，康姆主義勞動和資本主義的一個世界的衝突，不過是一個神話罷了。——這就是說整塊布頭所製造出來的一個傳說。

『第三種戰士』就是『勞動的個人主義者。』這其實就是素樸的蘇聯報紙上所稱做『柯拉克』(Kulak) (註1) 的一批傢伙。至於我們的黨，那是決不停留在這裏的。

這『第三種戰士』幻想着他具有着『在戰線上』站腳的力量，具有着站在紅軍和白里安們的弱化的軍隊之間的力量，並對我們的戰士和法蘭西資本家們收買下來的羅馬尼亞和波蘭的兵士們說：『弟兄們，不要再作戰了！你們要損害我的卑微的田園，我的可敬的牛羊，以及我在內戰時期爲了我的草舍和我的牛羊的鬪爭中賺得了的可愛的私產了。不要再作戰了，弟兄們！』

聽到了這些感傷的話，勇敢的白里安——過去是社會主義者而現在是私人財產的最熱烈的擁護者——將吩咐他的御用軍隊，用了純粹的法蘭西語說：『回老家去吧，弟兄們！』

然而克里姆·伏羅希洛夫……這一位工人出身的勞動者和農民的紅軍領袖，怎樣在這樣的一種特殊時機活動過來，這些事，我可以不必說給你們聽。

註一、柯拉克，俄語，即「富農」。

你們儘可以看出，這個『勞働個人主義者』的信是不很高明的。但這倒不關重要。後面還有更壞的事情要來。寫這封信的人接着如次地說：

你說，康姆主義者是仇恨資本家的。可是勞働個人主義者，雖則名義上是保存自我，和他結爲同盟，其實，也正是仇恨資本家的。

何等好玩，何等意外，同志們！這里所說的『名義上是保存自我，和他結爲同盟』等詞，顯然是故意避用『第三種戰士』等字眼。這恰恰是邏輯毀穿了磚頭。在這幾個字里面，這『勞働個人主義者』十足地表現出了他的真正的色彩。他原是資本家的盟友，你們的敵人。

你們或許要問：對於這些愚蠢的信件是否值得注意呢？是的，真是值得注意的，同志們！問題並不是因爲他們寫了信來給我，而是因爲這些寄生蟲是生活在，計劃在，而且活動在你們的中間。這些寄生蟲的愚蠢，就是他們的『神聖的真實』。你們必須要跟他們無情地鬭爭。他們是靠你的骨肉而生，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吸你的血。

白里安喊道：『中歐的和東方的各國，易被布爾塞維克的爪子攫去，所以我們必須救救他們。』譯成明白的言語，這些話就變成：『我們要看看到底是否有使得蘇聯轉化爲無聊的歐洲首都

的一個殖民地的任何可能性，到底是否有使得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阿布拉齊亞人（Abkhazians）、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和蘇聯國內其他民族的人民都像阿非利加的尼格魯人似地淪於奴隸狀態的任何可能性。」

這些寄生蟲們在消息報和真理報上面讀到白里安的建議的時候，他的語調閃亮了他們的希望，雖則這位老頭兒冒險家的好鬪的語言並不是從他自己的嘴唇中發出，而是從那比較常人的頭顱低矮得多的一部分人那里發出的。小寄生蟲聽到了這些聲音，就幻想着白里安能夠使他們變成大隊伙了。

他們在最近的十年來學習了一些事物，並且能夠很清楚地分別出奶油是在麵包的那一邊。（註三）他們是有機地愛喝布爾喬亞沼澤中的污濁的死水，作為唯一的解渴劑。他們爬行在你們中間，期待着能爬上你們的背脊的時運到來。他們發着蛇一樣的嗚嘶的聲音，靜默地，嚴密地毒化着你所呼吸着的空氣。他們只看到那依然包圍在你的周圍的一切困難，可是他們怕看見那將要使你們的生活舒服而且美麗的一切巨大成就。

註三 奶油是在麵包的那一邊，意即私利之所在。

大家都知道，當一隻熊走到蜂房那里取蜜的時候，蜜蜂就會對熊螫一下，於是熊就逃跑。可是在西伯利亞台伊迦（Siberian Taiga）的這隻熊，卻不很容易脫身於羣蠅的。

在你們慶祝的日子，同志們，同時在你們勞働的日子，不要忘掉了蠅——「勞働個人主義」與「三種戰士」，因他的渺小而使你們的鬪爭愈感困難的敵人。

反抗你們敵人的最好的武器，就是教育，知識，和你們這一階級的歷史任務的意識的發展，以及你們聯合全世界普洛列塔利亞的意識，還有，那歷史號召你們創造「它的新世界」的無敵的力量（註四）。

註四 最末，本來還有一句口號，因環境關係，特地略掉了。

論個人與大眾

——相互的賞識

親愛的同志們！

你們對於我六十四歲的祝賀，不由得給了我很大的感動。我要答以由衷的感謝！若是這樣感謝你們對我的友誼和注意，我真感到次數太多了，可是這是你們的不好，並不是我的不好。

好，這些且不去管它吧。可是我們得同意個人和大眾之間的這種相互的賞識，是絕對不能避免的，只要這個人是具有某程度的成功和忠實而反映着歷史所賦與的革命工作的執行者的大眾的積極情緒。

同意了這一點之後，我們就可以從大眾和個人之間的這些相互的賞識之中，獲得十分單純的而在我們卻含有教訓意味的結論了。第一個結論，就是大眾的不可爭辯的教育力量；這種精力影響着

個人，而個人呢，反過來把這種精力獻給了大眾。關於這點，我們已經談到過不只一次了。

其次，個人越是能夠把人們的情緒的精力吸收而成觀念和形象，那麼個人的社會革命的價值也就越是顯著。

布爾喬亞社會驅使着個人去替它的目的服務——這個階級的目的，其基礎就是憑着這個階級的政權和力量去擄取多數人的體力。布爾喬亞社會里面的個人的自由發展，受着種族、民族、階級和宗教等觀念的限制，同時也受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里面的偏狹信仰的限制——僅僅存在於浮面之上的一種特殊性。

我們的國家是建築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面的，受限制的觀念是被消滅了，個人都得自由地享受着發展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的權利。

有人要對我說吧：那是不確的，因為蘇維埃政府是反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一切『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擁護者所虛誇而實際並不存在的一切『自由』——的啊。

我們的國家已經規定好了最廣大的最完備的個人自由，並使他消除幾世紀以來阻礙着限制着他的進化的那些觀念。我們的國家也反對個人，但那只是當他成爲阻滯個人自身的知識力量的

自由發展的觀念的代表者和散播者的時候才如此。這些恰恰是資本主義政權相依爲命的觀念——階級、種族、民族和宗教。

蘇聯的勞働階級，在「前衛」的領導之下，知道了這些觀念是有害的。它認爲這些觀念是使人惡化的東西，是勤勞大眾的敵視者，因此，它要排斥這些觀念，並且禁止這些觀念的傳播。

那些十足仇視工農的觀念，或那些企圖向勞働人類證明他們的奴隸狀態尙是合理而不可避免的觀念，倘若還能容許其在工農的國家里面存在，那簡直是荒謬的可笑的唐吉訶德主義 (Don Quixotism)。

你們都知道，同志們，我所說的，也正是你們所已經知道了的事情。這在我是常常如此的，即使不是永遠如此。這是因爲我是通過着你們，而在跟「第三種戰士」說話，關於這「第三種戰士」，我曾在最近寫過一次。我又接得了好幾封信，在這些信里，「第三種戰士」還在擁護他自己站在資本家和勞働者之間的立場的合理性。跟這種人爭辯，浪費時間，是不值得的，因爲他的愚蠢是無法克服的。這種愚蠢實在是他的一部分，到死也是不會脫掉的。

但還有許多的他的信徒，也喜歡這『第三種』和『中間』的立場。當然，這個立場並不是『中間』的，而是旁邊的；這是強盜的等待立場，躲在自己的無恥的廢話的林子裏，等待着戰鬥的結局，而出來打劫。這種人在各式各種的外省的角落裏，這種角落越是遼遠，越是荒僻，那就對於越加方便的可以在自己的周圍散播一些反猶太主義，浸禮會主義，市僧式的無政府主義以及其他『自由思想』的毒汁。我想像得到，那種靜悄悄的城市和『第三種戰士』的靜悄悄的私語；這些對青年的私語，使得被私語家所包圍的青年的耳朵都震聾了，而那些小思想的毒計，正要毒害青年對於生活的積極而健全的感覺。思想也和人一樣，是在死亡、解體；而腐爛着的思想的屍毒，也和其他的屍毒一樣，是會傳染到荒僻的地方，狗熊角落里的青年，雖然渴望着知識，卻還沒有充分的必需的力量，却有效地抵抗私語家所放出來的毒氣。在新歷史的創造者的社會主義精力所執行的巨大工作的明亮的背景上，那些灰黯的，煙霧似的市僧主義的污點，特別看得清楚。自然，這些污點，是在消散，消滅，然而始終不要使它們的最後的滅亡，會在青年身上再來延遲這麼一天。

論第二次世界大戰

最近，法國「Y. H. O.」雜誌，提出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好些問題，徵求世界各國文學家的答覆；亞瑟的大文學家高爾基的答覆是很可以注意的，我們把問題和答覆的全文譯在下面：

第一、「現在有沒有再來一次戰爭的危險呢？」

——歐洲各國政府正在化費無限的數目，化費國家收入之中的鉅大經費，拚命的武裝。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手槍，亦不是買來裝飾客廳的，而是爲着謀殺或者自殺的。我們總不能夠相信，那些全副武裝的巡洋艦，潛水艇，坦克車等類東西，是爲着和平政策而建造的罷！

第二、「戰爭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要承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資本家的存在——資本家的爭逐利潤，簡直是一種病症，這種病的症候和“Gaucha”病相彷彿的。這一個小小階級，或者更正確說，這一班瘋漢，霸占着地球上的財富，完全不負責任的掌握着人民的生命，就是勞働羣衆的生命——他們的存在是多麼奇怪，這也用不着來指出了。

關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凡是性情良善，思想正直的人都已經指出來過的。例如經濟學大家西斯蒙蒂（Simondi），他其實離開社會主義還很遠呢。他在十九世紀的初期就已經完全懂得：

「極大部分的社會上的消耗，是用在反對窮人而保護富人上的。」

我們知道，這些正真的人所指示出來的真理，被馬克思放到毫無疑問的科學基礎之上，列寧又根據馬克思、昂格斯的歷史哲學，繼續發展而得到邏輯上的結論，並且對於俄國的工人階級，給以指示和實際的方法，使他們脫離了那些無理性的無人道的人們的任性妄爲的壓迫制度。

我們現在確有合法的權利來申明：戰爭是富人實行的，不但爲着要加強他們對於窮人的權力，而且還爲着他們自己之間的互相反對，他們把窮人做犧牲，他們會利用一班「精明人」——就是

那些替資本家的絕滅人道的目的服務的智識階級。這種服務，是現在世界上最可惡的把戲之中的一種！

說：例如有一個英國人邱吉爾（Churchill），一九三〇年八月間，他在英國工業家的一個會議上

「英國民族決不放棄他對於印度生活和發展的監督。圓桌會議沒有權力來準備印度憲法。英國的國會是不受圓桌會議協定的任何束縛的。」

印度政治家及其信徒已經有二萬四千人，在監牢裏面。對於擾亂，正在用斷然堅決的手段鎮壓下去。我們必須申明：英國民族決不放棄他在印度的使命。我們決不能喪失這顆大英帝國皇冕上最晶瑩的寶鑽（印度）。喪失印度，就是大英帝國的末日。」

這篇演說，真是無恥之極，——似乎應當激發 Canterbury 大主教的基督教的良心了罷。然而事實上卻沒有這麼一回事。這位大主教亦是英國人，亦是一個無恥的混蛋。他的例行公事的「人道主義」，只有到了他的雇主需要的時候，譬如要反對蘇聯的時候，才肯拿出來耀武揚威。

這一班決定人民運命的瘋漢之中，最安靜的是西班牙王。他是靜悄悄的在那裏殺他的人民。波

關的畢勃蘇德斯基就不同了。他對着訪員，簡直像瘋漢的狂嘍一樣，申說他的屠殺的『神聖權利』

『我是強者之中的一個，我還要說，我是一個有例外的十全不美的天才，能夠使用權力，能夠決定。』

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的事實出來，證明一個根本的奇突的事實——就是各民族的生命卻被一班絕對瘋狂的人管理着；各民族的生命和自由，一天留在這班人手裏，那麼，戰爭以及種種式式的『和平掠奪』，以至於一般社會的鉅災，將永久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是什麼樣的戰爭呢？』

——關於戰爭將要是什麼樣的問題，一九三〇年八月法國的一個國務總理蓋伊沃 (M. Caillaux) 解釋得很緻細：

『不要幻想罷。最後那次戰爭還只是重砲機關槍、潛水艇的戰爭。下次的戰爭——如果人類仍舊發瘋了而願意再來一次——那就是化學戰爭了。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只是幾百萬人上戰場去打。某某年的新戰爭裏面——我是希望日曆上永久不要有這個某某年的——所

謂普通居民是要完全消滅的。沒有意思再去保護普通居民。現在已經有毒瓦斯，這種瓦斯穿透人的皮膚不着傷痕的，受着的人也覺不到的，可是在極短期間，就會使人起極劇烈的抽搐拘攣，直到變成定期的不可治的瘋癲症。這種惡毒的東西，並不是專為對付打仗的兵士的，而且主要的還是為着對付普通居民的呢。」

同時，就在去年（一九三〇年）八月間，蓋伊沃先生的話，有一位軍事學大家戴摩林將軍（Berthold von Deimling）出來替他證實；戴摩林將軍的意見，是根據於去年意大利、法國、英國的航空操演的詳細研究的：

『在里昂地方，當「敵軍」飛機將要到之前，居民都發了瓦斯面具；並且準備好了醫藥救護。守衛這城市的，是一隊特別飛機隊，電光探視燈和航空射擊隊。然而「攻擊」的飛機隊始終進了城，並且扔了炸彈。最近幾次的操演，證明航空射擊隊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因為飛機常常能夠飛得比發彈的適當距離更高或者反而低些。英國的操演，證明普通居民比「敵軍」所受開花炸彈的襲擊要多得多。』

第四『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給了法國人民些什麼？如果沒有戰爭，他們能夠做的是什麼？』

——這在“*Vue*”雜誌上有過極好的計算。887 billion 的法郎是耗費掉了，這是 887,000,000,000,000 法郎呵，這都是勞動人民的錢，因為世界上沒有別種錢。此外，還有多少人的健康的生命，多少對於社會極有價值的人民是毀滅掉了呢？！

如果我沒有記錯，彷彿各國都有一種法律去『預防和制止罪惡。』

看起來，直接的邏輯上的結論應當是：為要脫離戰爭的這些脅迫，必須把凡是為着保護他們自己那些沒有意義的利益，而要引導到羣衆的毀滅人道的人們，都應當隔離起來。

有一個很人道的辦法，來隔離這班對於社會很有危險的人物。譬如說，可以把他們送到 *Solomon* 島上去，或者其他食人民族居住的地方。我絕對的相信，我這種提議決算不得太殘酷，特別是對於邱吉爾，張伯倫，班嘉萊，*Canterbury* 的大主教等類的先生們。然而，事實上卻並不照着『預防和制止罪惡』的法律去做，並沒有想幾個罪犯的計劃，蓋伊沃還提出一個最奇特的結論。照他的意見，要救人類，就要重演古代“*Promethus*”的神話（*Promethus*是古代神話裏的一個奇神，他用泥

士造出人類，並且偷取天上的神火給人類。蓋伊沃的意見是：人民應當把新的 Prometheus 鎖起來。

「如果人類還想存在，他們就應當把新的 Prometheus —— 就是科學 —— 束縛起來。」

這是野蠻主義！資本家的政權把全世界引導到這種野蠻主義方面去。而資本家階級的思想，卻還以為他們自己是創造並且保存文化的階級呢。資本家現在發見了：科學已經滿足了他們自相殘殺的需要，以及反對工人階級而保護他們自己的需要，—— 所以，科學已經夠了！如果歐洲也和美國一樣，生出了自己的「低眉的 Pygmalion」，如果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居然又要親眼看見「猴子案件」，由大主教神甫牧師來做檢舉人，要禁止教授達爾文的「天演論」，那麼，這決不是出於意料之外的事情。

第五、「怎樣避免戰爭呢？」

—— 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如果都像蘇聯一樣做幾件事情。為着要停止罪惡的事實，我們必須脫離某些東西。俄國工人階級所開始做的，絕對正確：他們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他們十三年來工作的結果，一方面，全世界的匪徒對於他們是一天天的更加切齒痛恨，別方面，激起各國工人階級以及各國

正直人們對於他們表示積極的同情。

第六、「戰爭裏面破壞主權，是不是主要的問題呢？」

——照我的意見，在主權是資本主義的畸形產物的地方，沒有可能說什麼各國的「主權」的。

論農村婦女生活

——走向幸福的新生活(註一)

我真誠地抱憾着，同志們，因為我不能前來參加你們的大會。我熱烈地感謝着，因為你們要把我的名字改稱爲你們的駁名的這樣的光榮歸我。

讓我來告訴你們吧，我從幼年時代以來，在默察婦女的生活——尤其在默察農村中的婦女——之際，我一向悲念着她們的生活的艱苦，悲念着私有財產制度之下的農村生活環境所加於她們肩上的不堪忍受的勞働重担。

在這些情形之下的農村婦女，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她就只是她的爸爸，丈夫，和翁姑的一個奴隸吧了。她就只是洗女婦，縫衣婦，織女，廚子，牧女，婢女和園丁吧了。她終生地不斷地工作，在家里，在田里

註一 這是高爾基在土耳其却爾克工廠更名爲高爾基工廠時給該廠勞動婦女的一封信。

都一樣；一到三十歲，就已經是一個老婆婆——積勞成病的老婆婆了。這樣的一種監獄式的不快意的生活，顯然沒有生存的價值可說。研究的時間，讀寫的時間，都沒有。即使她求得了一些自己學習來的知識，也很易於忘記；因為她既沒有可以應用這些知識的機會；而當時農村方面又沒有書和報紙。

黨和蘇維埃政權，把私有財產變革為集體財產，同時把集體農場也組織起來，於是這些農村婦女才從奴隸的地位中解放出來，不再從屬於男子和她的主人，而一種較舒服較人道的農村生活也就建立起來。在蘇聯南部的集體農場中，在烏格蘭，在高加索北部和伏爾加區域，凡是差不多一切農民財產已經變成集體財產的地方，婦女們已經開始生活在大不同的，聰明得多的，舒服得多的，啓明得多的狀態里。在那里，婦女們已經建立起村的麵包處，洗衣處，廚房，浴室和育兒堂。在那里，婦女們正開始生活在一種廣大的村生活之中。她們已經有了上學的，讀報的，閱書的時間。她們也已經有了認識蘇聯以及全世界的現勢的機會。

世界正進行着勞働人民反抗他們的主人，反抗那些靠別人的勞働而生活的人們，反抗那些慣於騎在工農背脊上面的人們的一種廣大的無比的鬭爭。這一勞働者鬭爭的基礎是由我們自己的勞働者奠在這里的。它正如大火一樣地在全世界發展着，蔓延着。它將在勞働者的勝利中宣告終結。

你們，同志們，該知道，重要的，是要你在這個爲了你們的自由和自由的關爭中，在這個爲了改革和改善自身生活的權利的關爭中，參加活動。——這是爲了一種幸福的，智能的生活的關爭。走向這個目標的第一步，是要反對永遠保守在你們的祖母和曾祖母那樣的地位。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是柯爾霍池（Kolkhoz）^{註11}——農業的集體經濟。集體農場的生活，將使你們站在男子們同等的地位。你從前的那一個主人，將成爲輝煌的，聰明的，滿意的新生活的建設工作中的你的同志和朋友。接受了我的最由衷的祝詞吧，體察了我的語言的真實吧。

註11 俄語「柯爾霍池」譯出來就是集體農場。

論 婦 女

奇怪的是我們這裏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想到寫一本關於教會對付婦女的書，而婦女們早就應該知道她們要『感謝』宗教和教會的是什麼，尤其是基督教的『正教』教會（註一）。

大家都知道的一切宗教所規定的對於婦女的觀點多多少少是不好的，有些甚至於確定地是敵視的。我們時代之前的兩千七百年，希臘詩人海西沃德（註二）在他的『神統譜』——就是關於神的來源的——那部書裏說：『齊吳斯（註三）把惡——女人給了會死的丈夫，』而在『工作和日

註一 俄國人把他們所信仰的東羅馬派的希臘教叫做『正教』。

註二 海西沃德 (Hesiod)，最早的希臘詩人，生於紀元前八世紀，Boeotia人，他的主要著作是神統譜 (Theogony)，『工作和日子』 (Works and days)，『赫爾墨斯的防禦』 (Shield of Hercules)。

註三 齊吳斯 (Zelus) 是希臘一切神和人類的父親，是所謂天上和人間的主宰。

子」那篇詩裏，他還說女人是「美麗的惡」，是「人的苦痛。」猶太人的祈禱書裏，有一句簡短的，厲害的，可是對於婦女很不恭維的禱告文：「謝謝你，上帝，因為你沒有叫我做女人。」教會的神話，說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做出來的，聖經上的預言家對於女人的惡毒的詩歌，阿拉伯和印度的神話，以及其他宗教對於婦女的一切種種無窮無盡的侮辱，——這一切都證明各種宗教的巫師們，一致地要在社會上屈辱婦女。認為婦女是男子被逐出天堂的罪魁，是「罪惡的根源」，是「世界的誘惑」，這種觀點從教會方面傳達到了日常生活裏。無數的成語和格言，這樣辱罵婦女，主張不要信任她們，要打她們，——都毫無疑問的反映着教會的影響：「亞當是因為老婆被逐出天堂的。」「老婆把沃洛菲恩的頭都割掉了。」「叫你的老婆恐懼，不要捨不得責罰她。」——耶甫萊談·西魯斯（註四）說：而日常生活就把這種話翻成了自己的言語：「時常打打老婆，愛情也要甜蜜些。」吉里爾·耶魯撒冷斯基暗示着：「婦女的說話，不要多相信，」而日常的成語是：「婆娘說的——是昏話，誰相信她！」「婆娘的想頭——說鬼話的念頭。」這樣的這一類的成語，簡直是無窮無盡的練條，牠的最後一個

註四

耶甫萊談·西魯斯 (Ephraem Syrus) 生於 320 年，卒於 370 年，敘利亞地方的一個神甫，後來有些教會裏把他當做聖人看待的。

鐵環是很可注意的：「老婆和丈夫——毒蛇和雄蛇。」

兩千年來，基督教教會一直是這麼一個源流，從牠那裏，找出許多法律上經濟上限制婦女的說法。在上帝跟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這是使徒保羅說的教會的教訓，而這教會又教訓着：「不是丈夫爲着老婆；而是老婆爲着丈夫造出來的。」這樣的，諸如此類的教訓毫無疑問地肯定着：老婆女人——是不能夠和男人平等的東西，是「第二等人」。而這卻並沒有妨礙女人們，福音經的崇拜者，承認這部還是神聖的，「人道的」書，雖然這部書的全部智慧只在於企圖暗示人家，說地上的生活，同着一切苦痛，都不是什麼別的，而只是人的預先的準備，爲的要到天上去享受永久的幸福，而人要到天上去卻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柔和，要像石頭似的忍耐，要聽從教會的法律。一般的說，這個學說是要使餓着肚子的窮人，把重的認爲輕的，苦的認爲甜的。

塞普替美·脫爾士里安 (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 第二世紀的基督教作家，說基督教徒應當「爲着偶像崇拜的罪惡的恥辱，而用神聖的信仰的恥辱」去使得基督「滿意」。基督教作家的嘴裏居然說出信仰的恥辱，這種奇怪的字句是完全有理由的，——因爲基督教教會的那種狂妄的行爲，那種無情的反對批判思想的鬭爭，反對科學，極殘忍的壓迫，大批的屠殺「信仰

不同的人，牠們在油鍋裏活活的燒死『異端』和『魔鬼』——燒死那些精神病的婦女，而更多的是那些很有才能的婦女，她們只不過對於生活的事實，拒絕遵照教會中人所命令的思想罷了。『不要殺』——這是教會所宣傳的，而這個教會讚美着基督教徒自相殘殺的戰爭，這樣的戰爭其實是爲着掠奪的目的開始的，其實是破壞着『不要偷』的信條的。教會的本身，本來是富的，他們永久只代表富人的利益；他們自己是奴隸主，也就從來沒有反對過奴隸制度。所有這些，多多少少還是可以了解的：教會是階級的機關，牠是『剝削別人勞動的階級法律的總匯，牠爲着自己階級的目的而服務，也出於恐懼，也出於良心。』牠對於婦女的敵視態度，牠要在社會上屈辱婦女的政策，却要難懂得多。可以這樣想：基督教時代以前的巫師們，在自己的職業上利於把婦女描寫成一切種種罪惡的化身，——這樣，他們可以阻礙婦女變做那種容易而有利的工作，就是在寺廟裏供養神道。可能的是：不但爲着發財的目的，而正是爲着在社會上屈辱婦女的目的，所以有些『異教徒』的宗教規定一種教會娼妓的制度。

然而單是這一種原因，還不能夠解釋基督教教會反對婦女的那種病態的惡毒。假使在這些原因之外，再加上對於禁止結婚的復仇心——基督教教會是禁止自己的神甫和主教結婚的，——那

末，也不能夠完全解釋僧侶對於婦女的敵意，這種敵意發生在羅馬教會規定禁止結婚以前，而且「正教」的「白派」僧侶並不禁止結婚，禁止結婚的只有「黑派」的僧侶。

自然應當記起：「愛情和飢餓管理着世界。」傳種的本能，使男女結合起來，使得不能忍受的勞動生活的困苦條件更加複雜化了。上面已經提起過的海西沃德抱怨着：「女人不是勞動的同伴，而是浪費財產的同伴。」我們俄國的成語說：「老婆用小鉢頭從家裏裝出去的東西，比丈夫用大口袋裝出去的還要多些。」可以引證幾千種這樣的抱怨，在預言家的詩歌裏，在宣教的教條裏，在成語，故事和笑話裏。然而所有這些話只證明同樣的一件事：這些話是有財產的人想出來的，他們有家，也的確有東西可以從家裏裝出去。

這裏，同各處是一樣的，顯然暴露了經濟要素的影響；這裏，彷彿特別表現着男主人和婦女之間的一點矛盾，婦女是男主人的管家婆，是他的妻小，在社會上是沒有權利的。這個矛盾大概在於男人和女人對於積聚財產的神聖事業的態度是不同的。可能的是：女人，丈夫的奴隸，沒有像她的老公那麼深刻的覺得自己是私有財產的奴隸；正因為婦女沒有權利，所以她在積聚私產的事業裏，不會那麼深入；她對於這種畜生事業，比她自己的主人要冷淡些。也許，直到我們現在，大多數的婦女還保存

着這種冷淡。

然而，爲着要使自然在家裏，在主人的被窩裏的地位更穩固些，爲着要在那裏儘可能地多留一些時候，一直到主人年老的時候，到他已經不需要情人，而只需要醫院裏的看護婦的時候，婦女就應當緻細的照顧自己的身體，用盡一切方法保留身體的美麗，新鮮和力量，用盡一切方法裝飾自己的身體和身體周圍的一切。這個代價是很貴的，而且越來越貴了。不久以前一個美國人，百萬富翁，說了這麼一句笑話：

「我們不怕共產主義者，老婆早就要使我們破產了，比工人們來得及幹這件事要早得多呢。」——這個笑話倒不壞。

教會，不見得沒有積聚財產的貪慾，牠的目的是要鞏固自己對於信仰上帝的人的『精神上的』權力，牠總是非常之熱烈的咒罵婦女的愛奢侈，可是，這並不妨礙羅馬教會的僧侶和牧師用瘋狂的奢侈把自己圍繞起來，也不妨礙『正教的』主教，大主教，大僧正很闊氣的生活，該着奴隸。然而婦女愛好奢侈的自然傾向，不能夠完全解釋教會中人的惡毒。這裏，真有點兒狂妄的病態。不能夠說那種禁慾主義的說教是健全的現在，所謂『肉慾的死滅』——是教會中人，上帝的奴隸所宣傳的——

這是反對生活本能的鬭爭，其實照他們的學說，生活又是上帝自己創造出來的。

教會把傳種的本能叫做『姦淫』，在暗藏的形式裏宣傳着閹割主義，而認為生小孩子是污穢不潔的事情，因此，產婦在生育之後的六星期禁止參拜教堂，——產婦要再進寺廟，必須在神甫給她唸過『清淨咒』之後。

教會在這繼續的兩千年之中，很努力的不斷的暗示男人對於女人要抱着不好的敵視的態度；這種態度非常深刻的印在男人的意識上，簡直有了本能的力量。宗教的『仇視女性主義』的影響很清楚的表現在一些『學者』的書籍裏，這種『學者』時時刻刻要想對全世界證明，說女人『照她們的天性』就是『精神上受着限制的』東西，不能夠認為是和男人平等的人。從這種『學說』裏得出來的實際結論是很簡單的：女人在法律上政治上應當受着限制。也的確把她們『限制』了。她們沒有支配自己命運的權利，不能夠和男人享受同等的教育，不得到丈夫的允許就不能夠支配自己的遺產。日常生活裏，在實際上，還有許多對於婦女是很屈辱的限制，這些限制阻礙着她們的力量和才能的正軌的發展。教會所蔭庇的『父權』，從經濟上着想而結合的男女年齡不相等的婚姻，促進自己階級的衰落，產生那種乾癟的，退化的種子。

沒有任何的疑問，如果不是這麼束縛婦女，勉強縮小她們的興趣範圍，只給她們一些妻小、母親、管家婆的責任，而且把她們從廣泛的社會工作、文化政治工作方面推開去，那末，文化發展的速度可以快一倍，因為創造的力量多出了一倍。然而資產階級的社會和國家，並不於文化發展得更快些，資產階級寧可停止在他們已經達到的程度上，剝削着無產階級的勞動，像野獸似的吞沒他們的力量。資產階級生活得够方便了，如果他們始終還有點兒前進，那末大家都知道，這不過因為有那種競爭的無政府狀態，以及被競爭所激動的工業技術的進步。這種不得已的機械式的變動和真正文化的進步很少相同之點。恰好相反，資產者的文化典型，比他在十九世紀所達到的高度起來，已經降低了。很多。這個低落，在帝國主義戰爭之後，特別明顯的表現了出來，那次戰爭很增加了野獸，無恥之徒和強盜的數量，而除開『法西斯蒂』之外，並造不出什麼別的『精神上的領袖』這是我們看得見的。

『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的法律，幾千年來沒有變動，現在也並不變動，這是任何理論都不能夠動搖的。』

資產階級的全部「哲學」就包含在這句話裏面。這個貧乏的思想，被一切國家和一切時代的「聖人」用各種各樣的詞句重複了幾千遍。歐洲、美洲的報紙和雜誌，每天都在重複着。如果這個「理論」要這樣時常的堅持的提出來，那就可見得事實上有什麼東西在反對着這個理論，所以要把牠打進頭腦裏去，像要把拐杖打進枕木裏去似的。拐杖是結實的，粗壯的，然而並非永久的，牠始終要受着時代的破壞影響。事實是很現實的，然而還並非真理，事實不過是粗糙的生的原料，可以做創造將來全人類的真理的材料罷了。資產階級很想要肯定現在的事實，使牠永久在已經形成的形式之中：法西斯蒂主義就在這一方面努力工作着。然而「動作引起反動作」——工人階級對於自由勞動的文化意義的認識，是在強有力的生長着，這種自由勞動是要解決生活的全部混亂的；工人階級對於自己應當取得政權的認識，也在生長着，而資產階級的聖賢、新聞記者、院子裏的狗和房間裏的狗，卻要非常之高聲的狂吠，拚命的喊着家庭原則的不可動搖，牠們要咬自己主人的仇敵，咬那些根本就相不相信這地球上有什麼不可動搖的東西的人。

必須承認資產階級的社會，是在把婦女教育成一種低級的人。這句話，不會也不應當侮辱「弱的性」(註五)——問題是在於資產階級的一種罪惡，他們是把體質的健全的，生物的基礎歪曲了。

也不能夠否認，被教會中人弄糊塗了的女人，無意之中自己在參加着這種歪曲的過程。然而我們現在，似乎到了一個復仇的時期，也是無意之中的，從婦女方面來了一種對於「家庭原則」的復仇。

已經說過了，婦女的愛奢侈和「夫妻之間的不忠實」從最古的時代起，就被教會文學咒罵的了。世俗文學也很早就跟着教會罵，然而責備着女人是一切種種戲劇和悲劇的原因，卻又很高興的，很能幹的描寫她是享樂的源頭。諷刺哈默德時代以前的一個阿拉伯詩人說：

「地上的天堂，是在聖賢的書籍裏，在馬背上，在女人的胸脯上。」你看，照他說起來，女人能夠安慰男人的本領，還只占得到第三等的地位。

歐洲的文學家，把女人當作消遣的玩意兒，卻給了她第一等的地位，似乎女人還驕傲着這種可疑的光榮呢。從十九世紀的下半期起，這種浪漫諷刺的讚美女人，說她是「享樂的源頭」崇拜她的「神秘的實質」等等，很明顯的開始讓開自己的地位，而來了一種現實主義的批評態度，多多少少激烈的表示不滿意於她在家庭裏和社會裏的行為。大家知道的，在我們俄國，這是因為婦女要求教育，要求和男人平等的參加革命工作而引起來的。跟着俄國的「女虛無黨」首先是英國的婦女，開始

註五 「蔚的性」指婦女而言，這是歐洲的「習慣」。

了社會工作和爭取獨立的運動，因此立刻就得到一個譏笑的綽號——叫做『藍襪子』。德國女人和法國女人，在文學上和政治上出了一些很有才能的代表，可是並沒有急急於來學俄國女人和英國女人的榜樣。

然而，在歐洲資產階級的一切婦女之中，大概有了些什麼新的，不痛快的現象，所以，又要把她們放到教會所規定的地位上去，——就是『第二等人』的地位。瑞士有一個什麼大學教授，他的姓名我忘記了，在九十年代的中期印了一本很厚的書，他在這本書上，證明婦女是生物學上的特別種類，在一切方面都比男人低，比男人壞。同時，弗里德里赫·尼采也向婦女宣戰，這位尼采先生是想恢復有點兒發胖的『民族精神』的。威廉第二應當從他的高高的皇位上來提倡，說德國女人對於自己的國家只有三種責任：孩子，廚房和教堂。還有許多企圖，各種各樣的，都是要想證明給婦女聽，說她是一『第二等人』。資產階級的『仇視女性主義』的最激烈的表示，應當要算一九〇二年在奧國出版的鄂託·魏寧格爾的一本書，叫做『性和性格』。

所有這些現象，合攏起來，都在說明歐洲資產階級的『地心裏』發生了什麼驚慌。後來，部分的解釋這個驚慌的，是英國的『塞非來基斯德』(antheist)的運動，——這是一些婦女要求和男

人平等地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也只部分的罷了。而更廣泛的解釋『仇視女性主義』的爆發和資產階級之中所以發生這種驚慌的，我看是卓·卓·卓洛夫一個不大出名的作家，他著過一部『一般事件的哲學』託爾斯泰和宋斯託耶夫斯基認為他是個『天才的思想家』。

他寫了一篇關於一八八九年的巴黎展覽會的文章——那次展覽會是為着紀念法國大革命的一百年週年而開的——他說，『資產階級的制度，自己也不能夠明顯的表示牠所服務的原則，牠所賴以生活和運動的理想。』照·卓·卓洛夫的意見，這個理想在俄國卻暴露了。

『我們一八六二年的當地的全俄手藝展覽會是近於真理了，這個展覽會幾乎發見了這個社會以前是替誰服務的，現在還在替誰服務，而一八八九年的世界展覽會也就是這個社會的表現，牠發見了這個，在展覽會的入口，擺了一個女人的像（或者妥當些說——是一位太太，夫人，妃子的像——不管她是夏娃，愛倫，潘朵拉，歐羅巴，亞斯帕西亞……）身上穿着整個俄國工業所供獻給她的各種衣料，大概是展覽會上所陳列的衣料之中大家所公認為最好的衣料——這個女人的像，望着鏡子裏的自己的影子，似乎認識了自己在世界裏的中心地位（自然只是歐洲的世界）認識了自己是文明和文化的最後的原因。』

底下，N. F. 卓采洛夫就得到一個結論，說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是膨脹了的，也就是病態地擴大了的，達到了高度緊張的性的本能；他說，生活就是『女人的王國』，就是女人的『並不沉重卻是滅亡的統治』的各方面的表現（原註）。這種觀念的教會的來源是非常明顯的，可是在這一次，這種觀念之中卻包含着很大部分的『壞的真理』。

一九〇一年在普楚克·叩村子裏，任着一個肺結核的教員采白洛克龍斯基或是采白洛霍特斯基：A. P. 柴霍夫把他介紹給我認識了，柴霍夫說，『這位教員也寫些什麼呢，但是，沒有希望的。』這個教員原來是一部『無結果的勞動』的作者。在這部著作裏，他統計了完全爲了給女人穿，給女人裝飾，以及一般的爲了滿足女人需要而工作的工廠。這稿子是紀念С. С. 賽拉託符臘特斯基的，寫得很沉悶，引證了駭人的數目字。記得大多數的數目字，作者是從關稅報告冊裏引來的，似乎還引用了С. 維特所出版的那本『俄國工業發展』的書。我覺得這一部著作的手稿，是受着託爾斯泰的影響而寫出來的，反映着『民粹主義』的思想，而且很合於他的標題——的確是『無結果的。』作者不但在生理上是一個病人，而且傳染了偉大的驕傲病，似乎還有點宗教的昏話；他還自以爲受了

原註 這裏所引證的是根據С. С. 謝特尼茨基的小冊子『С. С. 卓采洛夫所描寫的資本主義制度』。

『俄國思想』雜誌的編輯，郭爾亦夫的侮辱。——郭爾亦夫讀過了這部手稿，勸他『不要出醜，燒燬了稿子罷。』後來，我看見了以、阜、宋、洛夫的『一般事件的哲學』的第一卷之後，我倒記起了這部『無結果的勞動』了。

誰都不會否認，資產階級婦女所需要的奢侈品的生產，發達得像黴菌或是墳場上的野草那麼快。也許並不是『因為這個原故』，然而，始終同時發展着文學上對於女人的『批評的』，甚至是敵視的態度，女人還只是當作妻小，母親，『家庭之中的第二個領袖』看待。在現代的英國文學裏，這種情形特別顯著，而英國這個國家不久以前還驕傲着『家庭傳統的不可動搖』呢。越來越多的出現了一些書籍，描寫『國、李、杜、石的家庭』的崩壞過程，描寫着那些『不崩潰的』福爾賽特們的死滅和崩潰。這些福爾賽特們在約翰、赫爾賽、洛蒂的『薩格論福爾賽特們』裏面，描寫得非常之好；還有赫克、斯黎在他的小說『邁、邁、邁各種各樣的玫瑰』、梅克爾、亞倫在他的『綠帽子』以及許多其他的書裏，都描寫着。

從這些書裏，你可以得到一個非常之確定的感想：如果除開數量上很少的，在社會上沒有多大影響的『一部分婦女』——這部分婦女是羨慕着『社會工作』的，就是同丈夫一塊兒，竭力在鞏固着

那個根本動搖的『良好的舊秩序』——如果除開這部分婦女，那末，其餘代表資產階級家庭的全部婦女羣衆，很努力的在那裏幫着破壞『良好的舊秩序』呢。

她們『彷彿是在本能地』爲着自己的過去時代復仇，因爲教會和國家，把她們教育成『第二等人』，只用自己的肉體去給人享樂的人，而現在，就在這一種人裏面，教出了那種對於自己國家的命運，對於實際生活毫不關心的態度。而實際生活，對於資產階級的了解力，是越來越複雜了，而對於被壓迫羣衆的認識，卻越來越明白了，這個實際生活威脅着那『良好的舊秩序』，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悲劇的崩壞。亞蘭·卡爾特希爾在自己的書『爲什麼英國人失掉了印度』裏，指出了這個崩壞的主要原因之一：『印度人完全明白了西方文明的道德上的空虛』這裏，『西方』這個字也許要改做『英國』，而『道德上的空虛』必須改做『無能』。

大家知道的，印度人對於英國文明的懷疑態度，因爲英國的失業現象而更加厲害了。那個卡爾特希爾還說：

『人也不是上帝的，也不是國王的奴隸，同樣，他也不是什麼神聖的不變的法律的奴隸。』這樣說，其實就是放棄了以前的堅固的老障地。印度人，一定非常之有興趣的讀着這一位印度的英國行

政家的書。

自然，指出家庭的崩潰的，不止英國一國的文學，全歐洲的文學都是這樣。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之後，這個過程應當格外顯露了。文學上的表現，很結實的，越來越多的，證實那些男子的和女子的，同性戀愛的廣大發展，極多的刑事犯的紀錄，——因為嫉妒而犯罪的增多，虐殺兒童，越來越多的墮胎，離婚，以及其他種種家庭，社會的腐化崩潰的現象。

自然，資產階級婦女的階級本能還是活着的，在一切機會，只要她們覺得要來代替她們階級的新階級有些什麼行動反對着她們的利己主義，反對着她們的習慣和方便，那末，她們的階級本能就發作了。然而她們的階級的守舊主義表現得比較不激烈些，而且是「一陣一陣的」，至於她們的「虛無主義」，她們對於現實的漠不相關的態度，她們的渴望奢侈和感覺上的享樂，卻在經常不斷的表現着。這不會不加緊資產階級腐化的過程。可惜，腐爛的過程也會傳染，而且的確在傳染給健全的人，更可惜的是，歐洲無產階級還沒有充分估計到這種資產階級病態的傳染的可能。

「誰喜歡教訓——他就就喜歡智識；而誰要是討厭暴露——他就是個蠢貨。」

這是梭羅門說的，他是個皇帝和預言家，然而他居然預見了蘇聯的自我批評的必要和益處。

蘇聯的婦女，尤其是農村的婦女，應該很認真的想一想自己對於宗教和教會的態度。她們生活裏的艱難和苦痛，也『要感謝』教會的『神聖的』法律呢，教會的法律是在幾千年來暗示婦女，說必須要做奴隸地服務。教會是把婦女當作奴隸看待的，而無神論者的亞克拉莎夫說：

命運是有三副重擔。

第一副——是和奴隸結婚，

第二——是做奴隸兒子的母親，

第三——是服從奴隸直到進棺材。

亞克拉莎夫說這個話的時候，他是指着農奴制度講的，然而就在農奴制度廢除之後，農民仍舊是自己的破破爛爛的經濟的奴隸，是私有財產的奴隸，這私有財產是我們生活的一切不幸，痛苦和醜惡的基礎。在這私人經濟裏面，農民的老婆從不可追究的時代起，就在自己的肩膀上擔負着苦工似的勞動，直到現在還擔負着，不到時候就吞沒了她的力量。她同時又是洗衣服的，又是餵牲口的，又是烤麵包的，又是奶媽，又是織工，又是裁縫，又是種園地的，又是燒菜的，又是挑水的，又是打掃洗澡房的，——不容易數清她的『家庭責任』，這些責任簡直把她這個人降到家畜的地位，而且這個家畜

的價錢比馬還要便宜些，雖然馬所做的工作要比農民婦女多得多，連比都不能夠比。

然而現在，在她跟前展開了一種可能，可以脫離永久的苦工，可以成爲和男子同等的「第一等人」。男子向來是只承認自己是這樣的人的。她應該明白，私有財產是一條鎖鍊，她束縛着她的自由，無益的吞沒她的力量，不給她的理智發展，不給她的能力發展。——「撲滅着心靈」像一個農婦給我寫的。她應該明白，如果她自己認爲或者覺得比男人笨些，那末，這正因爲教會和資產階級的國家「撲滅了她的心靈」因爲誰也沒有想使她比男人聰明些。大家都利於有相反的情形。

能够把婦女從苦工似的生活裏救出來的只有社會主義，集體的勞動。工農政權很有成績的開始了根據集體的原則來改造生活。這件事情是極端困難的，——要使得幾千萬人明白舊式的生活對於他們是不利的，無意識的人類的自由理智完全可以保證輕鬆的，豐富的，有趣的生活的可能。這事情是艱難的：幾百年來，人被訓練得只會畜生似的過活，各個人只顧自己，只爲自己；大家還不大明白怎樣可以有別種生活。

不大明白，然而已經在建設着這種新的秩序了；蘇維埃的國家很快的建設着工廠，機器，一天一天的富有起來，再過幾年，就什麼也不缺少了。我們這裏，一切創造出來的東西，都是爲着大眾的，而不

是像別些國家裏似的，專門只爲着一些選擇出來的人。這種工作是要把人從奴隸制度裏面解放出來，婦女應該把自己所有的力量，把整個的心靈都放在這個工作上。而她，特別要好好的了解教會是她的古舊的，不肯放鬆的，最殘酷的仇敵。

論小孩子

一個女孩子從烏克蘭寄了這麼一封信（註一）給我：

「喂，你聽好，高爾基，你不會像老爹和爸爸那樣生氣，那樣咬自己的孩子，那樣打我們？你要是到蘇聯，也許會到基耶夫，那就離我們很近了，只有一百里，我要求爸爸放我到基耶夫去，假裝着去禱告上帝，也許我可以見見你。」

你說罷：人是多麼醜觀，多麼下賤，要是我是個窮人，人家也不奇怪我了，而現在我看，就算給我見見世界也好，我還沒有見過世界上的人呢，你是怎麼窮的呢？」

註一 這封信的原文是烏克蘭文的，標點符號大半是用錯的（以下幾封孩子的信都有這種「毛病」，可惜譯文裏已經不能夠保存這種真蹟了。）

不知道這個漢涅幾歲了，然而他同他那『老爹爹和爸爸』過活是不會甜蜜的。一定也是這樣痛苦的生活，使得維亞脫卡省的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寄了這麼一封信來：

『老爹爹高爾基，請你答復我一個問題；我同小朋友和孩子們爭論着「脫離」（註二）這個字是什麼意思。我說這意思是「離開木屋」，完全脫離鄉村生活，爲的要換一個另外的生活。但是大家都笑我空想，連先生都笑我。他是老人，我還可以原諒他，而自己的人也笑我，實在可氣。在鄉村裏生活真煩悶，我們這裏只有四個兒童團員，可是，什麼也不能做。大家不喜歡兒童團的團員。』

一個兒童通信員，安德留史卡，寫給我的信，也是關於這個煩悶生活的。在這種生活裏『什麼也不能做。』可惜我把他的第一封信遺失了，可是我記得安德萊的信裏面他是這樣訴苦的。父親禁止他讀書，還要打他，以致於他從家裏逃出來，又被捉回去，殘酷的痛打了一頓。他在信裏問我：怎麼辦呢？他要學習，他要做『有益的工作。』並且說，如果再打他，他要『燒房子』，而自己『逃出去做野孩子。』

註二 『脫離』在俄文是 *izbavitiia*，彷彿是俄文 *“siba”*（農民的木屋）加上 *“vistiia”* 似的，所以這女孩子有這般一種杜撰的解釋。

我寫了信給他，沒有勸他燒房子，可是，如果他沒有別的出路，還是逃到莫斯科來罷。我還寫了信給他的父親，但是我的信對於他的父親沒有發生什麼效力，只要看下面安德萊的來信就明白了。

「M. 高爾基，你好！

安德萊寫信給你，不要怕，你是知道我的，我已經寫給你幾封信，在所有的信裏面，都是寫的關於野孩子的問題。

現在我不想做野孩子了，我已經從自己的家裏逃了出來，離開了我的父親和母親。現在進了「巨人」兒童集體農場，關於這個農場，我想你在報上讀到過的。這個集體農場，離開我的家有八百俄里，至少。

現在，請你聽聽我怎樣到集體農場裏來的。我要學習——母親和父親不准我，爲了這個還打我，爲了做兒童通信員也打我。我對於父母沒有什麼捨不得了。我曉得，對於我還要不好呢。我時常同我的先生很要好。他給我出許多主意。但是，我的情形壞極了，我就決定要逃到什麼地方去，我告訴先生我要逃到「小朋友」雜誌那裏去。

我的先生沒有勸我，可是他給了我三個盧布，我還在父親那裏偷了三個盧布。

我跑到火車站，要買到莫斯科去的兒童車票，他們不給我，還說：你是從家裏逃出來的。我說我到諾沃舍白珂夫那裏去看朋友，他們就給了我到莫斯科的票子。走了，但是來查票了。發問題給我，幾歲？我說十歲。他們要帶我到 OGPU（政府保安局）去！我就哭起來，裝出小孩子的樣子。不叫我到 OGPU 去了。我高興了，當然，誰也沒有發覺我。我同野孩子交了朋友，但是後來就離開了，——覺得我將要變成混蛋。離開野孩子之後，就跑到「小朋友」的編輯那裏，——我出席兒童通信員大會的時候在她那裏住過的。耶卡乞爾·耶夫要把我送回去。我就恨起來，哭着自己的命運。我在莫斯科住了一個多月，後來那位女編輯送我進了兒童集體農場。

在集體農場的生活

我初到集體農場的時候，小孩子們怕我，避我，不過過了一個星期，他們就慣了，同我住在一起，很要好，還很高興。我進了一個共產青年學校，從前叫做襲察洛夫的，雖然已經在正月裏，但是我插進了五年級。先生們怕我，他們考問我，以為我不會知道什麼的。可是，來了一個好機會。出題目叫我們寫文章了。於是我們就寫了。讀起來，我的一篇算最好，先生走來問我，我就回答。第一個學期的考試到了。考罷，可以說我是全班的一個模範學生了，選舉委員會的時候，我也是候選人。

了。

關於我們的經濟

我們有六公畝田地，兩匹馬，一隻牛，四隻豬，很快就可以得到二十四隻兔子，十隻雞等等。但是，我們缺少一個農場的圖書館，你可以寄點什麼書給我們讀讀嗎？我們等着。

安德萊

從這封信裏面，可以看出這孩子說到自己的成績，有點兒自稱自讚，可是關於他的成績，青年學校的教員也給我證實了。我以為這孩子還有一件事可以自稱自讚的，因為他的確「脫離」了，克服了那種肉體上聯系着私有財產的力量，這種聯系在農村的小孩子裏很早就發展的，而且特別來得深刻。

不久以前，在一個外國報上，登載了這樣一件事實：

「在法國帕替埃爾地方附近，一個農民巴爾·普家裏，來了一個流浪人，他請求主人准他在草堆上過一個夜。

這個偶然跑來的客人，在第二天早上，要懇感謝他們的飲食和寄宿，自己提議在菜園裏和

幫他們工作。主人很願意的答應了他。後來，他做得累了，汗流滿臉的跑到廚房裏，就把放在桌子上的一瓶酒拿起來喝。這給那農民的一個6歲的（原註）兒子看見了，他就罵那個流浪人。那人沒有注意他這個小孩子，笑了笑，還是繼續喝他的酒。於是立刻就出了意外的事情。那孩子跑到鄰近門口一間房屋裏去，拿下掛在壁上的一支步鎗，自己裝好了子彈，悄悄的躲到門口去，幾乎是對準了那流浪人放了一鎗，子彈打中了他的心臟，這客人就這麼完全被打死了。

那個小兇手居然還這樣鎮靜，甚至於對着他的父母和跑來的工人們，都說那客人是自殺的。直到後來，他才把實在的情形告訴了憲兵。」

看罷，這樣的事情，比較像三個虛布，以及爲着要逃到可以學會「有益處的工作」的地方去，而想燒掉父母的房屋，都要嚴重得多呢。

十月革命的無可爭論的非常之好的成績之一，就是男女孩子們已經本能的感覺到：「現在看來已經可以過着更好的生活，如果還要過着像我們父親那樣的生活，那真是笨得很。」這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信裏的話。這孩子卻喫了很大的苦頭，因為他要想暗示他的父親和叔叔，說用馬鈴薯

原註 這裏大概是印錯的，應當是9歲，因爲6歲的孩子還舉不起步槍來——高爾基注。

餵牛可以得到豐富的牛奶，而父親不相信他，這位小改革家就去偷他叔父的馬鈴薯，暗暗地餵給牛。噢，牛奶真的好了起來，但是，叔父把這位改革家「在犯罪的地方」當場捉住了，就打了他一頓。這樣的小戲劇，在鄉村裏應該一天天的多起來了，鄉村裏「父與子」的矛盾一天天的劇烈起來，而且也應當劇烈起來了。孩子們非常之好的生長着。

還有十八個初級小學生的信：

「親愛的高爾基同志！

多謝你寄給我們的抄寫本和教科書，我們也送一點禮物給你：第三次的「工業化」公債票，這是出賣廢物得來的錢買的；再則，還寄上我們自己的照片——我們學校裏「集體化和收穫節」的展覽會上拍的。高爾基同志！我們有一個大問題請求你：爲了那些孤兒和貧兒，我們決定在學校裏開辦一個食堂，——最近這些孩子因爲家裏沒有東西喫，要不來上學了，——我們這區的地方機關沒有錢來維持，所以我們向你請求：請幫助我們的尊業，雖然少許寄些錢來，也好的。高爾基同志！我們知道懇求是不是好的，不過我們把你當同志一樣看待，希望你不要拒絕我們的請求。

請你寄張自己的照片給我們，而且要畫上你住的房屋。

我們本來想不寄公債票，而寄一雙滑冰鞋給你的，後來才記起了在意大利沒有冬天。
同志的敬禮！

利亞諾夫斯基等小學的學生。

唔，多麼聰明的好小鬼頭呵。

另外一個這樣的——西伯利亞，依爾庫斯克的小孩子寫了『關於我們學校的』點兒。

『我想——你一定知道革命以前的學校。新的學校完全不是那麼樣的了，在學校裏，我們可以勇敢的隨便提出什麼有興趣的問題。』

從蘇聯的別一個邊境——從南方——一個小通信員告訴我：

『一個身體很衰弱的老婆婆教我們讀書，她打着可笑的噴嚏，甚至於眼鏡都會掉下來。可是，她什麼都知道，像一個莫斯科的大學教授，隨你問什麼，她回答得都是剗剗的。她把你的信讀給我們聽，講解得非常之好。老爹爹，你自己寫封信給我們罷，我們讀着你的書呢。』

帶便的說罷，大學教授A.青格爾也說了。

『現代的學生對於書籍比從前的學生要敬重得多。』

還有些小通信員，住在北方離白湖三俄里的地方，他們向我『愉快的問候，』願意我『一切都好，』尤其是身體好，而在對於勞動者很有利益的工作裏，得到成功，』他們通知我：

『在我們這裏，有兒童團員一隊，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們的父母都允許的，因為有些父母很頑固的擁護着宗教。』

也有這樣的信：

『親愛的老爹爹高爾基！

我們嘴着父親把他合照的照片偷偷的寄給你。他不肯的。而我呢，非常之想把自己也寄給你。我們怎樣的想看見你本人呵。不僅只在照片上看看。當心，長壽些呀；請你替我們學校寫這麼一本書。你要是到了我們這裏，那才是過節呢。我們等着。

互互·和亞爾卡沙·蘇爾珂夫。』

有很多小孩子寫信給我。自然，這是我以為光榮的，而且我有這光榮的權利。我深信，在蘇聯不只有我一個文學家，就是別的文學家，也受着孩子們的同樣的注意呢。

可是，我更堅決的相信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不會有得到小孩子們這樣注意和同情的作家，像蘇維埃的小孩同情我們蘇維埃作家一樣。是的，在那裏沒有這樣的作家，而且也不會有，因為那裏還沒有社會革命所產生的小孩。那裏能夠寫出這樣的話來的小孩子，還不會有：

「親愛的老爹爹！

我們，全蘇聯兒童通信員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來到「我們的成績」雜誌的編輯部，爲的要參觀雜誌的工作，並且得到老同志們的經驗。

我們參觀了這個工作，答應我們的名譽兒童團員（註三）——編輯主任，供給這個雜誌一些材料，就是我們怎樣參加「四年之中完成五年計畫」的建設工作。」

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小孩子是另外一種派頭。譬如巴黎的白黨僑民報「最後消息」九月九日登載着紐約的一個新聞：

「帕德遜（紐約州）的四個孩子，在這一學年開始的時候，以「名人」的資格進了學校。

註三 「我們的成績」的編輯主任就是高爾基，他這六十多歲的老頭子是公舉出來的「名譽兒童」——這是那邊的一種風俗。

他們開了乘坐自行車的新紀錄，在 1985 小時之內跑過了 9581 英里。在這 1985 小時之內，他們繼續不斷的輪流着在自己的房屋周圍繞圈子，日夜不斷的一英里一英里的計算着。如果他們的父母不叫他們在學期開始的前一天停止乘車去休息，那末，這些小英雄還可以多跑些呢。」

六月裏，在同一個報上還記載了這樣一個奇怪的孩子：

「在書店的陳列部裏發現了一本新書，在雜色的封面上寫着：「胡佛總統的生活。」

這本書的著作者不久以前才滿十一歲，他的姓名是威廉·馬契。這位年青的總統傳記家，在序言裏說到他「成爲作家」的動機。他聽見有些作家賺了很多的錢，而威廉·馬契也需要錢，並且想發財，所以他就拿起筆來。他的結論使得實際主義的「洋鬼」（註四）佩服極了：「我請求書販子儘可能的把這部書多賣幾本，這樣可以幫助我積聚資本」……

在這本書裏，對於女人特別注意。十一歲的傳記家，很天真的說到胡佛在斯湯復爾德大學裏遇到他的未婚妻，以及他們之間的「浪漫史」和結婚。在這全段的敘述裏，充滿着一般性質

註四 「洋鬼」是 Yankee 的譯音，這是美國人的外號。

的議論關於女人的狡猾，關於男人在婚姻之中的作用等等。這本書有了很大的成功。」

我並不是主張肉刑的一派人，但是，假使有人把這位著作家打一頓，我決不反對。我認爲小孩子寫着底下這樣的話，倒着實要自然得多：

「你好！請你教會我著書。我已經寫了一些文章。我叫做古納爾。我快要到九歲了。請你告訴我，你寫小說不是寫自己的時候，難道你是爬到人家去偷聽了再寫的嗎？總之，你給我說罷：不是關於自己的書是怎樣寫的？」

現在我就把自己最後的一篇小說寄給你。

馬耶珂夫斯基

有一次，我的同志愛弟亞跑到我這裏來。這是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四日。他說，馬耶珂夫斯基自殺了，抬到醫院裏去了。救護車。

到了第二天，我在「工人的莫斯科」報上讀到了：「馬耶珂夫斯基的屍體停放在蘇維埃作家聯盟的俱樂部：莫斯科，沃洛夫斯基街，四號。」

我們當然是去的。

——到了。

——看着。

——有很多的人。

——站了隊伍。

——最後，走進了大廳。看一看。

——鼻子是紅的。而在馬耶珂夫斯基的腳旁邊站着青年團員的「名譽崗位」，在側面還站着一位畫家，在畫着馬耶珂夫斯基的像。完了。」

這——很發笑，但是，這完全是八歲的小孩子的天真的創作；而且可以深信，這樣的小孩子長到了十一歲，決不會議論着那些關於「女人的狡猾」，「男人在婚姻之中的作用等等。」很顯然的，他在「小朋友」的雜誌和報章上，可以找到發表自己作品的地方。

我們的小孩非常之喜歡文學工作，而且他們有自己的雜誌和自己的報紙，——在那裏，他們可以學習着敘述生活，描寫生活，這是很好的。不久以前，「農民報」出版了一本兒童文集「我們在「巨人」集體農場裏的生活。」這文集的編纂者是佛雪沃洛德·列別吉夫，就是那本寫得很有才能的

『北極的太陽』的作者。

在這本文集裏，小孩子做着詩和散文，敘述他們在「巨人」農場裏怎樣的生活。我現在從列別吉夫寫的這本書的序言裏，把很值得注意的幾行引在下面：

「寫這本書的是耶蘭村的兩個學校的學生：初級小學和青年學校。耶蘭是伊爾比茨區裏的一個很大的村莊。這地方的居民完全是種田的農民。寫這本書的小孩子，年齡在十二到十七歲之間，他們還記得國內戰爭。他們是早期的兒童時代，是在困苦的貧農和僱農的條件之下過去的。他們的父親是戰爭之後的傷兵，殘廢的。這些小孩子，從六至七歲起，就開始在鄉村中參加了農業經濟的工作。而且時常不是在自己的家裏，而是被富農雇去的。這些孩子們，還很記得東家對他們的虐待。自從驅逐白黨出了這個邊境之後——就是農民反對哥爾却克的遊擊戰爭之後，——最積極的農民就開始組織公社了。

把陳舊的木屋從鄉村裏搬出去，用了最後的力量，在離開私人經濟較遠的空地上，建設了新的房屋，——公社就這麼出現了。

公社裏的居民決計永遠回舊的關係隔斷：牲口，工具，都放到公共的經濟裏去，建設了公共

的食堂。小孩子用不着留在家裏了，可以放到幼稚園和託兒院去。

農場需要耕種汽機，可是公社沒有力量置備；各個農場相離又很遠，他們正在找着共同的領導。

一九二九年，耶蘭，貝卡洛，茲訥孟三個區域的公社和勞動互助社，開了聯席大會，決定了聯合起來組織一個集體農場，以克拉斯諾泊良區（紅田區）為中心。

整個集體化的紅田區就是這樣產生的。

這個區域裏還有好些私人經濟。一方面集體農場得到了耕種汽機，供給那些公社和勞動互助社，聘請了農科專家來整頓這個有組織的大農場，而另一方面，這「巨人」農場的角落裏還有外農在用犁耙耕種田地，——這些小農暫時還不能夠決定加入集體農場裏，他們以為「巨人」農場裏的農民財產是要失散的。

農民緊緊的抓住了自己的個人經濟，因為這是從他們的父親那裏繼承下來的，——這種經濟對於他們是習慣了的，也因為「巨人」農場裏還很少這樣的人，能夠給他們解釋新經濟的力量。

而貧農家裏和公社裏的孩子，卻到耶蘭青年學校裏來學習了。他們看見自己經濟裏的公社社員怎樣在同富農鬭爭，他們是在這個鬭爭之中教養出來的。

孩子們的生活並不豐富，——他們住在公寓裏，喫着大鍋裏燒出來的飯菜，食品是集體農場送來給他們的。他們的教科書很少，而可讀的書幾乎完全沒有。

孩子們初從農家出來，到處聽見一般文化和農村經濟的發達，他們願意知道，願意聽聽別地方，莫斯科，工廠建設等等的消息。他們問起到他們那邊去的同志普希金和屠爾格涅夫不是還活着。

他們除出列寧，史太林，卡里寧的名字之外，還聽到以上兩位的姓名。可是，讀到的書很少。有些孩子弄到了書裏撕下來的幾頁，他們就在這些紙張上讀着一些文學家。

總算從莫斯科去了幾位先生，在「巨人」裏開辦了兩個青年學校，一個集體農場的學徒學校；還有一個高級的農民大學，到這裏來學習的有一百五十個成年的集體農場的社員。

這個大學裏有一個青年先生，他的姓是觀察洛夫；一個女孩子卻以為他就是做「崩裂」和「沃白洛莫夫」那兩部小說的觀察洛夫，其實這位文學家早就死了。

這些孩子們關於在莫斯科做些什麼，關於他們所讀到的，聽到的那些人是不是還活着，都沒有一個清楚的概念。不過，他們知道在莫斯科和別的城市裏寫什麼，做什麼，都應當看作他們的**成功**，有利於公社的。

很明白的是——孩子們等待着完全的改變，要求先生教會他們新的生活。

我看見過一個小雇農來到「指南星」公社，他是被東家開銷了的。

關於他，公社什麼也不知道。他並不是公社社員的親戚，但是，在這裏每一個雇農都是自己人。立刻，叫那孩子到飯堂裏去喫了飯，就給他住在公社的房裏裏。他就同大家共同生活起來。不但如此，而且還派他到村裏去學習。於是這小孩子公社的共同生活裏，又增加了一個青年孩子。孩子們是這樣加入公社的：有些同着父親一起來的，另外一些是丟了父親來的，還有些是離開了東家跑來的，——總之，他們和舊的鄉村生活的聯繫完全斬斷了。也有這樣的情形：孩子們勸告父母去進公社，否則就恐嚇他們要脫離家庭。這本會上，孩子們就寫着一些頑固的老人爲着要在集體農場之外去過舊式的生活，就拋棄了一切親戚；還說到那些舊式的老太婆，她們還生活在故事裏面。什麼耕種汽機對於他們是「世界的末日」，「這是反基督的印章」，「巨

人」那裏，大部分的教堂被居民自己關閉了。他們把教堂改做俱樂部，居民已經不記得要敬神做禮拜也廢除了。

青年學校的學生就開始寫起這本書來。」

在這篇序言裏，有特別重要的價值的，自然是這兩句話：「孩子們勸告父母去進集體農場，否則就恐嚇他們要脫離家庭。」我個人從這些話裏，得出這樣的結論：孩子們開始證實和確定「社會主義蘇維埃聯盟」的名號裏的「社會主義的」字樣的意義。

其次，我認爲現在是組織一種特別的機關報的時候了：這種報紙應當告訴蘇聯所有的父母：在整個廣大的聯盟裏，孩子們怎樣在想着，怎樣在工作着。

古時候的格言：「雞蛋不能夠教雞」已經明顯的喪失了自己的那種陳腐和守舊的意義。第一，大家都是從雞蛋裏爬出來的，」而第二，說到小雞，牠們之中卻有很多是從老鷹窠裏飛出來的了，大多數受着了實際生活的嚴厲手腕的教養。他們受着生活的鍛鍊，而且積極的參加着新世界的建設事業。可以證明這種參加的事情很多，我只指出其中的一件事：一九三〇年的春天，就是革命的第十三個年頭，「貧民」農業實驗所和中央兒童農業站印行了一本在農業方面給兒童團，小學生，青

年實驗家，青年發明家的羣衆的實驗工作大綱：這個大綱組織蘇聯各地的各種各色的兒童工作——農業的化學化，新的植物的種植法，簡單的種植方案，菜園學，果園學，消滅植物的和其他的寄生蟲的方法。這「貧民」實驗所供給了 125000 種實驗材料給兒童園。實驗所的任務，是要像工廠作坊裏的「發明運動」一樣的規模，來開展蘇聯的「綠色發明運動」。（實際生活裏還沒有產生一個更適當的術語，——能夠確定這種運動的全部深刻的意義的字眼還沒有。）

「我們相信，蘇維埃國家可以在兒童團員，小學生，青年實驗家之中，得到幾十個，也許幾百個米楚林，都寧，畢爾彭克；他們所要給人類的，不僅是農業種植上的新方法，收穫的增加，而且還能夠發明新的植物和新的種類。他們要在田地裏，果園裏，菜園裏，舉行一個整個的革命。」

而且，這樣吸引兒童參加廣大的文化革命性質的積極工作，這並不是唯一的事實。還應該注意的，是兒童自己發起了這樣直接參加實際生活的事業。

彷彿這是常例——一般的父親總不很知道自己的孩子，我們這裏的父親，似乎比較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父親，要知道得多一些，多一些，但是，還沒有知道到應當知道的程度。因此，我再說一次，必須建立一種機關報，把孩子們的工作告訴父親們。

自然，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小孩子也相當的參加實際生活的事業——參加父親們的事業。

「——英國諾爾福克地方，在一次夏天，在選舉運動的時候，保守黨黨員庫克的兩歲的女兒，騎着一匹蘇格蘭的「泊尼」馬，在市集的日期出現在曠場上，她的小馬的衣披上寫着：

「請選舉我的爸爸。」

——從康杜斯來的消息說，一前十四歲的孩子，傑克·李却爾茨坐在樹枝上已經有一百四十小時了，他父親和母親無論怎樣也不能夠把他們的兒子從樹上拖下來。有幾十個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模仿了他的辦法，其中有幾個要超過李却爾茨的紀錄。這些「體育家」的父母弄得一點沒有辦法，只好站在樹底下鼓勵他們的勇氣。

——在紐·傑爾西，四個男孩子輪流乘坐一部自行車，已經有九天九夜了，他們聲明還要繼續下去，直等到自行車的輪子壞了為止。

——成年人並不比小孩子落後，有四個年青人，坐着汽車用倒退的走法，從聖·路易到紐約去，要想在二十六天之內走完這個路程。

——彷彿動物園裏的野獸也傳染了這種奇怪的新紀錄。至少報上的消息是這麼說，有一

個猴子用尾巴掛在樹上已經有三天了。

——紐約交易所破產風潮之後，一個七歲的密斯脫給自己的父親說：『如果你要像 G. H. 先生一樣的自殺，那末，你得先給我一百塊錢，使我能够開始自己的生意。』

我從白黨報紙上剪下的材料之中，可以引出三十件這種笑話似的事實，不過我以爲用不着再說下去了。那些白黨關於自己的小孩子也寫得很悲哀。

譬如說俄僑的女子幼稚園的情形罷：

『牆壁上掛着的圖畫是：大行皇帝（謝洛夫畫像的翻版）、保羅·亞歷山大洛維支大公、公爵夫人帕萊。這裏也就掛着郡主伊林納·保羅洛夫納的肖像，沉思的處女面容。中間是圓的銀鏡框，題着 1841—1869 字樣，亞歷山大第二皇朝的盛典，他和他的兒女；彼得堡，高加索，謝波斯託泊爾，而旁邊就是輝煌的宮殿。——一些灰黯的羣衆在聽着宣言書（註五）。彷彿『一切都還像樣』，然而女孩子們說的俄國話卻是這樣的：

註五 這大概是亞歷山大第二一八六一年頒布解放農奴的宣言書的景像。

「——知道嗎，她死了，把她埋葬好了，但是，突然的她又活了起來（註六）。」

「孩子們互相之間寧可說法國話：「俄國話總是那麼困難，簡直不懂。」法國的圖畫雜誌很通行。時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說話：「我 *ici*，你 *depechezvous*，給我 *sucre*, *s'il vous plait*」等等。俄文寫得通順的，幾乎一個也沒有。

前幾天就有一個小姑娘，已經是成年人了，她用沒有重音的俄國話問：「請你告訴我，我要寫「a」而「現在」在「a」字後面應當寫硬號（註七）嗎？」

「俄國話那麼可笑，怎麼這樣普通的女人名字「秀讓娜」在俄國話裏是稱呼男人的呢！——你這是從那裏聽來的？」

「怎麼呢，不久以前，不是一個秀讓娜救了俄國皇帝嗎？」

這所謂「秀讓娜」(Suzanna)者其實是一個著名的歌劇裏的英雄伊凡·蘇薩寧 (Ivan Sussanin)。

註六 俄文動詞「正在埋葬」和「埋葬好了」是不同的，而這些女孩子已經不知道這種差別了。

註七 俄文的著文法有所謂「硬號」，通常只用在子音後面，在「a」後面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用的。

「——照你的意見，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她們問。」

——照你們的呢？

「呵，很多，我們這裏，有人說：生活是爲了家庭，嫁人，教養孩子。也有人說是爲了上帝，爲了要做好事……可是我想起來這都不是的。生活應當爲了自己，爲了自己的快樂。」

這些女孩子把生活的經驗，以及書上讀到的一切，她們所完全不會了解的，都混淆在一起。——這位僑民作家就做了這樣一個結論。

但是，這樣的事，沒有像英國對付兒童的態度來得有趣味和有教訓。

「倫敦，七月十八日。」

昨天在衆議院裏出了一個極大的亂子，是這個機關裏從來沒有的，會議一開始，就有一位衆議員責問內務總長：九歲的孩子被法庭判決了打四鞭子，是不是真的？內務總長對於這個問題給了肯定的回答，但是他並不責備法庭的這種行爲。」

狄更斯的著名小說早就使我們知道，英國的小學生是受的怎樣的教育。狄更斯死於一八七〇年，至今已經過六十年了。但是，以前自由主義的「俄國紀錄」雜誌裏的著名記者，現在是我們的兇

狠的敵人史克洛夫斯基——狄沃納沃在巴黎的白黨報上記者以下的消息：

「在白洛謨萊——一個小小的隱匿的城市，從倫敦「維克多利亞」車站過去二十五分鐘的火車路程，那裏的警察審判處在審查着保護兒童會所提出來的一件案子。被告是一個「男女高等學校」的校長吉爾達·費倫夫人。這學校裏有十一個寄宿生，年齡從五歲起到八歲止。他們生了極厲害的皮膚病，病在頭部（應該是疥癬——高爾基注。）寄宿在費倫夫人學校裏的孩子們的父母，都是外省的律師，醫生和經紀人。這些人的收入並不多，而又要竭力的顧全「面子」。所謂「面子」的法典裏，有這麼一條規則，就是要把孩子送到私立的寄宿學校裏去學習。結果，就來了這位費倫夫人。她在一所宏大美麗，周圍有花園的房屋裏，設立了寄宿學校，這樣的房屋，使一般收入少的父母們能夠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誇口：「呵，我們的孩子在那裏面讀書呢。」這所房屋從前是屬於一個鄉紳的，他現在已經住不起這樣的房屋。可是，那位校長却在這裏「賺錢」了。所謂「賺錢」，當然是從孩子們的伙食上和學習上來剝削。一九三〇年，完全復活了狄更斯小說裏所描寫的風俗。費倫夫人的「高等」學校裏，孩子們穿得很壞，喫也喫不飽，而校長自己却穿得很講究，喫得很飽。在堂皇華麗的學校房屋裏，沒有校醫，因為一年多

沒有付錢給醫生，所以醫生也不再到學校裏來了。重病的孩子躺在那裏沒有人照料。「校長」沒有功夫，——她到跑馬場去了。而那些五歲到八歲的有病的孩子們，單獨的留在學校裏，饑餓的，但是，爲什麼這樣小的孩子，還應該養在家裏的孩子，要送到寄宿學校裏去呢？因爲孩子們在家裏妨礙願意「生活」的母親。這些外省律師，醫生的謙虛的妻小，也願意像倫敦有錢的太太們一樣的去跳舞呢。費倫夫人的案件不但證實了狄更斯的「斯契爾斯學校」（註八）還活着，而且那些爲着顧全「面子」或是其他原因而把孩子送進這種學校裏去的父母也還存在着。

很明顯的，這些市僧，抱定了「活一天算一天」的主義。抱着這種主義的人，對於長久和鞏固的生存可能，是已經不希望的了。「家庭」對於他們已經不再是國家的「基礎」。

就是這個狄沃納沃，在一個非常之混蛋的「今天」報上還寫了一篇小文章，論到英國學校裏的一種野蠻風俗，叫做「當差制」的。

「什麼叫做「當差制」呢？每一個小孩子進了英國的寄宿中等學校，在一個相當時期裏，

註八 就是赫爾曼的「當差外史」（商務印書館出版）

要受「班長」的支配，這種班長取得「一班之首」的地位，卻並非由於功課上的成績。「當差的」應該執行「班長」的命令，拿茶給他，替他跑腿，受他的差遣。如果「班長」的命令執行得不迅速，不正確，那末，「當差的」就要挨打。新學生在學校裏經過了一年，他自己也成爲「老頭子」那時候，又輪到他去支配別的新學生了。

比較軟化的肉刑，幾乎在每個英國學校裏都還維持着。中等學校和小學校都是一樣。有時候，這種肉刑的結果，發生悲劇。於是這類事件就鬧到公堂上去。父母們告發打他們兒女的先生，他們所抱怨的，卻並不是一般的肉刑制度，而僅僅只是責罰得太嚴厲了。雖然我可以說出好幾件關於學校裏打孩子的案子，但是，我記不起有一件判決詞是反對學校裏的體罰的。通常判決詞總是反對父母的，雖然有時候審判官也認爲責罰得太「厲害」了一些。

「當差制」是英國的老風俗，在學校裏很頑固的保持着，報紙上轟動一時的鬧了起來的時候，才委任了個調查委員會，從各方面去研究「當差制」，而得到以下這樣的說明：供給證據的證人之中，有些是絕對反對「當差制」的，他們引出奇特的野蠻的欺侮孩子的例子，但是，另外一些證人，卻說「當差制」是很好的，是一種制度，是教養品性所必須的。

在納爾遜地方（蘭開夏州），審判官和陪審員審着一件十四歲的小孩子自殺的案件，這孩子名字叫做傑弗里·費爾赫斯特，他是一個牧師的兒子。請着大概知道英國鄉村裏的神甫，通常是屬於高等階級的；平常，這種神甫要算是主子（lord）的小兒子，他每年可以有1800—2000金鎊的收入。傑弗里·費爾赫斯特在復活節的假期裏還是住在家裏的。他在學校裏，成績不但好，而且是刮刮叫的。當開學的前一天，這孩子應當離開家庭到學校裏去了。他在這學校裏的學習還是一九二九年九月才開始的。他在家裏的時候，一直很快活。那天他同父母告別之後，跑進了自己的房間。他的母親在夜裏十一點鐘再去看這孩子的時候，他已經死了，是自己吊死的。

——他是一個最有幸福的孩子，——他父親在公堂上說，——我能夠叫出一百個證人來證明這件事，傑弗里所在的地方，總是有笑聲的。他無論做什麼，都是帶着快樂的。這孩子時常最有愉快的情緒，誰也想不到他會自殺。

證人解釋這孩子的死的原因，說是完全因為他不願意回到學校裏去，以及他討厭那個「常差」制度。

每一個新學生在一禮拜之中要執行班長（就是學生的頭子）的二十個命令，而且所發的命令都是無可商量的。所謂當差制度就是要替班長服務。「當差的」是新學生，應當馴服的聽班長的使喚，跑來跑去，執行他的各種委託。如果班長的命令，他執行得不迅速，那末，他就要挨打；而且「當差的」一定要端茶，燒肉等等。已經死了的傑弗里不能夠充分迅速的執行班長的命令，因為他很用功，正在努力的準備着七月間的考試。有些「班長」對新學生非常野蠻。「指揮」傑弗里的一個孩子也是這樣的。

這樣說來，你相信傑弗里自殺的唯一原因，是學校裏「當差的」的職務威脅了他？——審判官問死人的父親。——是的。我深信是這樣的。——那證人回答。——這孩子在家庭裏完全是幸福的，他的學習又很好，沒有任何別的原因使他要自殺，除開那「班長」的奇怪的粗暴。

塞德堡學校的校長和幾個教員也做了證人。

那位校長是擁護「當差」制度的。照他說，這個制度不但在本身沒有害處，而且相反的，學校裏大家都「愛護」這種制度。「當差」簡直是英國教育制度所必需的。校長的解釋是——照我的意見——他繼續的說，——用紀律去教育這樣的孩子，並不是不好的。給校長這麼一說，

這問題簡直弄不明白了：如果「當差」制度這樣好，那末，傑弗里爲什麼自殺呢？大概那些陪審員並不完全同意校長的意見。他們判決了傑弗里死的原因。在判決書上說，這個孩子的死是因爲那個粗暴的「當差」制度。傑弗里的自殺引起了英國報紙的許多議論，但是，反對「當差」制度的論文，比擁護這種制度的要少得多。」

你們看罷，在僑民報紙上登載這樣的事實，他們是資產階級文化的崇拜者，是社會主義文化的狠毒的敵人，他們對於自己的祖國一天到晚的造謠，在祖國已經沒有他們的位置，而且不會有的了。他們在自己的報上，還登載着關於德國的孩子的這樣一個消息：

「柏林的一個小學校出了這麼一個題目給學生做文章：

「你所想像的天堂是怎樣的？」

要拒絕寫這篇文章是不行的。十歲到十一歲的可憐的小孩子，不管願意不願意，要絞盡腦汁去想：在將來的生活裏，等待着他們的是怎樣的幸福。

於是有些孩子就這樣寫：

「天堂是一個地方，那裏時常是靜悄悄的。鳥兒在樹枝上唱歌，明亮的太陽照耀着。誰到

了那個地方，再也不願意離開的了。上帝輪流的拜訪天堂的居民，同大家談話。

——在天空裏，可以玩，可以唱，可以跳舞，可以跑，要怎樣就怎樣。最好喫的東西，在桌子上堆着一大堆。我再也寫不出什麼了，因為這是再好沒有的了。大概在天堂裏是這樣的。

——天堂在天上，在雲的上面，人還不曉得怎樣可以飛進去。可是，我想有些飛機飛上去之後不見了，——也許是飛到天空裏去了罷，他們不願意講出來，因為怕別人去妨礙他們。

最後，班裏一個最小的學生，很簡單明瞭的說：

——「天堂裏什麼都有。」

他們回答得這樣巧妙，用不着再來解釋這裏的悲慘的意義了。

可以作為補充的，是「柏林交易所郵報」上的一些小孩子的話：

「小小的彼得很熱心的收集着芬尼（德國銅元），裝在撲滿裏；有人問他要用這些收集來的錢去買什麼，彼得回答說：

——「只要買麪包，我非常的想活得長久！」

在聖經班上，一位女教員鼓勵小孩子什麼也不要害怕，如果我們害怕起來，只要叫上帝好

了。孩子就把這個話告訴父母，自己還補充了一句：

——但是先生沒有告訴我，叫上帝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這個報的一個女讀者說，他們同着自己的小兒子弗里茨到影戲院裏去，那裏在表演着羅馬時代的馬戲院，兇猛的野獸正在喫着基督教徒。小孩子問這是什麼意思，母親就給他解釋，說以前有過這樣的時候，那些殘酷的人把基督教徒給老虎和獅子去咬死。弗里茨睜開了眼睛，出神的看着這個影片，並且說：「唔，那隻老虎多麼可憐，蹲在後面，沒有喫着呢。」

我們可以假定，這是呆笨的德國諷刺的標本，而並不是「生活裏的事實。」然而德國孩子過着困苦的生活，這件事實，在德國的文學裏一天多似一天的證實了。家庭生活困苦使孩子們惡化，——這就是十二年來德國所出版的幾十種書籍的題材。亞珂白·瓦塞爾曼的小說「家庭」大概是一九二六年出版的，特別明顯的描寫着資產階級社會裏的孩子的情緒。這部小說裏，一個著名的律師弗里德里赫·勞定的女兒對她父親說，整個的教育制度完全是虛偽的。她，十六歲的女孩子，不相信先生，不相信學校的利益。她覺得，「她一定要走過的那個門，正在她的面前關住了。」同她那樣年齡的人，大多數同樣的不滿意生活。他們要求着「新的，真正新的。她們無論如何也要創造一個幸

福些的，好的世界。她們要消滅一切舊的虛偽，一切陳腐了的法律。她時常覺得在這個世界裏。她向她的同思想的同伴和成年人形成了敵對的營壘，她和許多人一樣，在母親和父親的家庭裏走着，好像一個外國兵。」

自然，這一切都不很確定，但是這是一個騷動；一般的生活條件是這樣，這種騷動起來之後不見得會沒有效果的。至少，這種騷動更加要搖動『家庭』——市儈的國家基礎。

我想，這些記載，用七月廿三日從紐約來的這麼一個消息來結束，倒是很適當的：

「一些國會議員——屬於受着委任去調查共產主義者在美國的行動的委員會的——參觀了共產黨員辦的一個幼稚園。

國會議員一到那裏，孩子們就唱起國際歌來，噓他們，向他們罵着各種各樣的侮辱的字句。後來，在這野營裏的成年人，也跟着小孩子們齊聲唱起一隻歌來：

「我們恨死你們！滾你們的蛋罷；

滾到鬼那裏去，再也不要回轉罷……」

有幾個國會議員，竭力想把這個當做開玩笑，甚至於企圖答覆那一個責備政府敵視蘇聯

的演說者。

參觀的結果總算沒有什麼大亂子，然而這是全靠警察來幫助了議員們。」

在莫斯科舉行全蘇聯兒童團大檢閱的時候，一個看客問中央亞細亞的一隊兒童：

——你們是那一個民族？

他得到的回答是：

——我們是兒童團員。

這彷彿是一個笑話，然而這是的確的事實。跟着這個，另外一個看客低聲的說了這麼一句：

——呵，真正開始了消滅民族偏見的時候了。

這一個大結論，自然不是從那一個小小的字眼裏得出來的，而是從那全社會主義蘇維埃聯盟之中集合起來的四萬兒童的盛觀，——從這個「新的烏兒」的檢閱的空前盛觀裏得出來的。

這個驚人的盛觀，也就使中央亞細亞的孩子們忘記了自己種族的名稱，而回答了一個新的字

眼：

——兒童團員 (pioneers) 。

論智識份子

一 給美國的智識份子

你們寫着：『你或許會對於這封從海外寄來的和你素不相識的人的信件覺得驚異的吧。』不，你們的來信並不使我喫驚。像這樣的信件，我是時常接到的，至於你們說你們的信件是『唯一的』，這句話也不對，因為這兩三年來，從智識份子那裏傳來的哀求似的呼聲，已經是成爲一樁日常的事情了。

這是十分自然的。知識份子的機能，大體上，向來只限於粉飾布爾喬亞的可厭的存在，而在他們的生活的卑劣的糾紛中安慰那些有錢人。知識階層，原是資本家階級的嫖婦。它永遠忙着在布爾喬亞的厚重地沾滿着勞働大衆的鮮血的污舊的哲學和宗教的外衣上面補綴着一針針的白線。

在目前，知識份子仍然繼續着這項困難的然而並不值得稱贊的絕對沒有結果的工作，雖則他

們對於在來的事情也表現了一種近乎預言式的神眼。舉例來說吧，在各帝國主義開始瓜分中國之前，一位叫做斯賓格勒 (Spengler) 的德國人，在他的人與機器 (Man and the machine) 這部著作中說，十九世紀歐羅巴人把他們的技術知識分給『有色人種』那是一個錯誤。這一種見解，斯賓格勒又獲得了你們美國的著名作家房龍 (H. Van Loon) 的支持，他也同樣地以為黑色人種和黃色人種的獲得歐洲文化經驗的武裝，乃是歐洲布爾喬亞所犯的『世界七大失算』之一。

在目前，我們能够看到他們要補救這個錯誤的迫切。歐洲和美洲的資本家不惜以金錢和軍火供給中日兩國，幫助他們彼此殘殺，並派遣他們的海軍到遠東來。越是在最有利的時機內，當日本帝國主義的面前揮動他們的披甲的猛拳，就越好。然後，等大熊一旦被殺，他們就希望在他們之間共分牠的熊皮，分給這勇敢的野兔也是一份。

據個人的意見，我認為大熊是殺不掉的，因為斯賓格勒、房龍以及布爾喬亞的其他安慰者，他們雖則對於威脅着歐洲與美洲的『文化』的危險談論了許許多多，可是他們還有一件事情卻被忘記提出了。他們忘掉了印度、日本和中國決不真正是一個整體，而是分成階層的。他們也忘掉了反抗歐洲與美洲的自私的俗物思想的毒素的，是已被製成了一種健康的防毒劑，甚至現在還正在運

用着——卡爾和伊里奇的教義。

然而他們或許是並不忘掉這些；他們或許是爲了策略關係而故意隱瞞的吧；他們關於歐洲文化的威脅的驚呼，或許是因爲他們知道毒素的無力和防毒劑的強烈。

那些爲文化的死亡而哀哭的人們，逐漸地增多起來了。他們的喊聲也愈喊愈響了。幾個月以前，法國前任閣員凱勞（Caillaux）公然地喊着出文化的不穩。這是他的叫喊：

世界正經歷着過剩和互不信任的一幕悲劇了。

當成千成萬的人民缺乏糧食的時候，麥子偏不得不燒掉，成袋的咖啡偏不得不拋到海里去，這不是一幕悲劇是什麼？我們中間的不信任——它是早已引起了相當多的罪惡。它激成了戰爭，由戰勝國強訂了和平條約，而這只有到這種不信任消滅的時候，和平條件才有修正機會。如果我們不能勝利地重新建立彼此的信用，這文化的全部就將陷於危險，因爲各民族都難免不去推翻它們心目中認爲一切的災害所由造成的經濟制度了。

在那些今日公然地彼此張牙舞爪的強盜之間去講信用的可能性，那麼他若不是一個不誠的偽善者，便一定是一個極端的傻瓜。倘若這里「民族」這一個字是指着勞動者而說，那麼每一個正直的人就必須承認勞動者把一切災害都視為無理的資本主義制度對他們創造的價值所給的酬報這一點，是十分正當的。普洛列塔里亞更明顯地看出卡爾和恩格斯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的話，極端正確地指明了現代布爾喬亞犯：

它（指布爾喬亞犯）是不能夠統治了，因為它無力保證它的奴隸。在他為奴役狀態中的生存，又因為它不得不給勞動者以飼養自己而不是受其飼養的這種狀態了。社會已經不再能夠在這布爾喬亞犯之下過活，換過來說，布爾喬亞已經不再能夠和社會相容了。

不久以前，布爾喬亞的安慰者，爲了證明資本主義之經濟的高明和穩定，曾經採用了科學的立場。現在他們卻把科學從他們的欺詐中丟開了。二月十三日，在巴黎，正是這個凱勞，跟着斯賓格勒，在保羅·密洛珂夫（Paul Millukov）之流的大官，以及旁的幾個多烘先生的面前說：

技術的發達，在很多場合，造就了失業，把解雇工人的工資變做了拍賣家的剩餘紅利。

了。「無良心」的科學，沒有被良心所激發，只會造成人民的創傷。我們應該抑制科學才對。偉人對於科學的害處是無以復加的。他們闡明了許多學理的假設。這些東西，只有在他們闡明的那個當兒，才有意義，才是重要的。這些東西，比方說，卡爾的東西，在一八四八年或七十年代的時候，原是對的，可是在一九三二年，卻就完全錯誤。要是卡爾活在現在，寫起文章來，就會顯得不同了。

以這些話，布爾喬亞承認他們自身階層的智慧是無能而且破產了。他教訓他們去抑制科學，忘記了科學者曾經使他的階層維持了對世界和勤勞大眾的統治。「抑制科學」——那是什麼意思呢？否認研究科學的自由嗎？從前的布爾喬亞多麼英勇地而又勝利地鬪爭過，反對教會企圖抑制科學的自由。然而如今布爾喬亞的哲學，卻漸漸地變成中世紀的黑暗時代的一樣了——神學的奴隸。凱勞說得對：歐洲被卡爾所說的野蠻時代的回復這個預言嚇倒了，雖然他並不懂得卡爾的科學。真的，這是無可爭辯的，歐美的布爾喬亞，世界的主人們，一年比一年地更其愚妄，更其無智，更其野蠻了——連他們自己也感覺到這一層。

有回到野蠻時代的可能這個意見，是現代布爾喬亞的最摩登的思想。斯賓格勒、凱勞和旁的類似性質的『思想家』反映了成千個中間階層的心情。他們的恐怖是被一種階級崩潰的感覺，和勞動階層的革命意識的實際的生長所喚起來的。布爾喬亞不高興相信工人階層的這個革命的文化的发展，但是他們看到了這個，他們覺到了這個的。這是完全正當的過程。這是人類勞動經驗之必然的發展——這種經驗，布爾喬亞的歷史學者是只能學院式地去描寫的。

但正因為歷史也是一種科學，所以它也是必須抑制的，或者更乾脆些說——它的存在是必須被忘掉的。『忘掉歷史』，法國詩人兼學究保羅·哇勒萊 (Paul Valéry) 在他的著作現代生活批判 (Review of Contemporary Life) 裏面教訓着說。他十分嚴重地控告着歷史造成人類的愁苦的境遇。他說：使人回憶起過去的時候，歷史總是喚起了沒有結果的幻夢，而且剝奪了人們的和平。『人們』——這裏，當然是指布爾喬亞。顯然的，哇勒萊在這世界上不能注意到旁的人們了。這就是他所說的歷史，那歷史，布爾喬亞是曾經那麼誇耀而且那麼出色地記述過的。

歷史是頭腦的化學實驗室裏所造出的一切產物中的最危險的東西。歷史使人們沉

灑於夢幻裏。它陶醉人們。它使人們生出錯誤的回憶，誇大他們的印象，展開他們的舊的創痕，剝奪他們的和平，並且把他們投入壯烈和迫害的夢幻里。

在他所演的布爾喬亞的安慰者的任務里，他是非常急進的了。他知道布爾喬亞要和平地生活下去。爲着要過和平的生活，它認爲即使毀滅千百萬個人民也是正當的。自然，要毀滅幾千本書是容易的事，因爲正像世上其他一切東西一樣，圖書館也是在布爾喬亞的手中。歷史阻礙了人們過着和平的生活。打倒歷史吧。禁止歷史著作的發行。學校里不要教歷史。宣布對於過去的研究是社會地危險的，甚至於犯罪的。高興研究歷史的人，都得宣告爲非法，並且流徙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島上了。

我們可以指出，去安慰這些被惱了的強盜和劊子手是一種罪惡，但是我知道，那是不會感動什麼人的。那也許是種道德，即是，因爲無用而被排出於生活之外的什麼東西。更其重要的，就是指出在現代的生活裏面，知識的安慰者已經成了那『排中物』，它的存在是爲邏輯所排斥的。如果那個知識階層是布爾喬亞出身的，但他的社會地位卻是普洛列塔里亞的，那麼他似乎可以看到替一個定了死罪而且該受罪的階層去服務，是一件墮落的事情。那個階層，正是跟職業的強盜劊子手一樣地

該受死罪的。他開始看到這個，因為知道布爾喬亞再也不需要他的服務了。他開始常常聽到他的同一階層中的那些渴望幫助布爾喬亞的人們是怎樣地開始說起知識階層的沒出息來了。他開始看到布爾喬亞再也不向哲學家 and 「思想家」去「尋求安慰」了。他們是轉向着那些預言未來的江湖朋友了。歐洲的報章載滿了占星家，天宮圖的發明者，托鉢僧，筆法鑑識家，巫者以及旁的甚至比布爾喬亞更蠢的人們的廣告了。攝影和電影照相殺害了繪畫的藝術，而藝術家爲了免於餓死，遂以他的繪畫來交換蕃薯，麵包以及無用之中產階層的衣服來了。

藝術家再也用不着了。他們被范朋克 (D. Fairbanks)，羅克 (H. Lloyd) 以及旁的一些以多愁善感的卓別靈 (C. Chaplin) 爲首的騙子們代替去了，甚至古典音樂也被爵士 (Jazz) 音樂所代替了，至於斯湯達爾 (Stendhal)，巴爾札克 (Balzac)，迭更斯 (Dickens) 和佛羅培爾 (Flaubert)，則代以各式各樣的瓦拉斯 (Wallace) 了——他們會告訴你一個偵探怎樣地在守衛着那些大強盜和大屠殺的組織者的家私財產的時候。捉到了幾個小偷和刺客。在藝術的領域里，布爾喬亞只要收集一些郵票和電車票，或者高級一點，蒐集一些古老的傑作的做製品，就很滿足了。在科學的領域里，布爾喬亞高興找出各種更便宜的更完善的榨取勞動階層體力的方法，在布

爾喬亞，科學的值得存在，至多不過在於它能夠幫助他達到他的目的——調劑他的肚子的動作以及刺激他的性的衰弛。布爾喬亞不懂得科學的基本問題；人類之智力和體力的發達在資本主義的羈絆之下已經耗盡了。把惰性的物質變成能力，以及人類的機體的問題——這一切所能激起於布爾喬亞的興趣，正和它們所能激起於非洲野蠻人的那樣地微小了。

看到了這點，有些知識份子便開始理解到他們所曾經當作自己的任務的『文化的創造』他們的『自由思想和獨立意志』的結果，在現在再也不是他們的任務了，而文化已經不是資本主義世界裏面所必要的東西了。中國的事變，令人想起一九一四年勞凡（Lauvain）的大學和圖書館的被燬。昨天，他們聽到了上海同濟大學，海軍學校，水產學校，中國公學，醫科大學，農業專門學校和勞動大學，都被日本軍炮燬了。但這種野蠻行為，並沒有驚動任何人，正如沒有人為剋扣文化教育經費以增補軍備費用這回事所驚動的。一樣。

自然，一部分的歐美知識份子感覺到他們陷於『排中律』的境地了，而驚異起來——我們往哪里去呀？他們應該服務他們的習性——而跟着布爾喬亞反對普洛列塔里亞嗎？或者服從他們的良心——而跟着普洛列塔里亞去反對布爾喬亞嗎？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是情願繼續服務於資

本主義——這個主人，他覺得了他的僕人和安慰者的道德的柔軟性，而且看到了他的安慰工作的羸弱和無效，已經開始公然輕蔑他的安慰者和僕人，而且懷疑是否有這樣一種僕人存在的必要了。你們，斯密斯 (D. Smith) 和摩列孫 (F. Morrison) 呵，非常錯誤地把『文化意見之組織者』這個任務放在布爾喬亞的文學和新聞身上了。這個『組織者』是一個寄生蟲，牠企圖隱瞞醜態的混亂的現實，可是比蘆葦隱藏垃圾和腐物還要失敗。

這是不會言過其實的。歐美的出版物，孜孜地而且幾乎專一地，在從事着使讀者們的文化水準降低，雖則他們的文化水準在現在也儘够低下了。

那麼，近來教會方面在幹些什麼呢？第一，自然是做祈禱。約克 (York) 和坎特堡萊 (Canterbury) 的主教，他們最近曾經宣傳要擁護一個反蘇聯的十字軍——這兩位主教就是一部新穎的祈禱文的作者，那裏面，英國的偽善完全歸入了英國式的幽默。這是一件很悠久的事實，用主禱文 (Lord's Prayer) 的形式寫成的。他們就是那樣地請求他們的救主的：『願主早早完成——我們的政策以及信用和繁榮的再建。願主早早完成——一切組織未來印度政府的任務。願主早早完成——快要到來的軍縮會議和一切保障世界和平的事業。爲着商業，信用和互相親善的鞏固

——願主賜給我們日常的麵包，爲着各個階層從事公共幸福事業的合作——願主賜給我們日常的麪色。要是我們因爲民族的驕傲而犯了罪，以及不肯竭力服從別人，卻只以統治別人爲滿足的話——求主免了我們的罪過吧。要是我們在執行我們的事業上表現了妄自誇大的地方，以及把我們自己的利益和我們自己的階層利益放在別人的或別個階層的利益之上的話——求主免了我們的罪過吧。』

驚慌的店主們的典型的祈禱文！他們三反四覆地請求上帝饒恕他們的罪，可是他們一次也不答應停止作惡的——所以唯一的辦法就只有請求上帝『赦罪』了。

這就是基督徒會所達到了的最卑鄙而愚蠢的俗惡的深淵，但是牧師們是怎樣滑稽地把上帝降職了，叫做當了歐洲一切最好的店主的一切商業經營中的店主，頭目和縱人作惡者。但是單說英國的牧師們是不公平的，如果忘掉了意大利人已經組織了一個聖靈銀行（Bank of Holy Spirit）的話。這類的事實有幾百幾千，它們都只證明了一件事——教會是資本主義的奴僕，而且染了所有的足以毀滅它的一切的病症了。

你們知識份子們，文化的大師們，你們應該理解勞動階層在掌握政權之後，將給你們展開文化

發展之最廣大的可能性。

瞧一瞧歷史所給與俄羅斯知識階層的一個嚴重的教訓吧：他們不跟勞働階層在一塊兒走，以致現今在流氓中腐朽於他們無力的憤怒里。他們都快要死了，只留下了叛逆者的遺名。

布爾喬亞仇視文化，而且不能不仇視它——這是資本主義的實踐和布爾喬亞的現實所確定的真理。布爾喬亞反對蘇聯所提出的完全廢除軍備的提議——這事實的本身證明了資產階級在社會上是一種多麼危險的人呵。他們正在準備着新的全世界範圍的大屠殺。他們使蘇聯陷於疑慮的狀態，強迫蘇聯的勞働階層化了很多時間和物質去製造槍砲，以抵抗資本家。這些資本家，爲了企圖把這個大國家變成他們的殖民地 and 市場，正在組織進攻蘇聯。爲了抵禦這些資本家，蘇聯的人民被強迫地把那些原可用於人類之文化發展的精力和工具浪費掉了，因爲蘇聯的建設過程是有全人類的重要性的。

現在是你們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文化的大師們！你們究竟跟着誰走呢？跟着勞働的文化力量去創造新的生活式樣呢？還是爲了維持一個不負責任的強盜們的階層，一個從頭至尾地腐朽了，並且只有無能地繼續去起作用的階層而反對這個力量呢？

二 覆智識份子

你說：

「歐洲的許多知識份子開始感覺自己是沒有祖國的人，我們對於俄國生活的注意是在生長着，然而我們始終不明白：蘇維埃國裏究竟過怎樣的情形？」

蘇聯裏面，是在進行着一種鬥爭——勞働羣衆的理智地組織起來了的意志在反對自然界的自發力量，在反對人裏面的那種「自發性」，這種「自發性」按照它的本質，其實並不是別的，正是個性的本能的無政府主義，這是階級國家對於個性的幾百年來的壓迫所教養出來的。這個鬥爭就是蘇聯現在的現實的基本內容。誰要是真心願意了解以前的所謂俄國之中的文化革命過程的深刻意義，那就他只有把這個過程當做爲着文化的鬥爭，爲着文化創造的鬭爭看待，然後他才能够正確的了解它。

你們西方的人，對於蘇聯的各種民族抱定了那麼一種態度，這種態度，我不能够說它是合於自

以爲全世界所必須的文化的代表人的身份的，因爲那是商人對於買主，債主對於債戶的一種觀點。我們記得，俄皇的俄國借了你們的錢，向你們學習過思想；然而你們忘記了，這些借款給了你們的工業家和商人很多的利錢，而十九・二十世紀的俄國科學就形成了強有力的支流，匯合了整個歐洲的科學研究工作，現在，你們在藝術方面的創作已經這樣明顯的，悲哀的萎靡下去，你們已經靠着俄國藝術的力量——思想和形象——生活了。你們不會否認，俄國的音樂和文學，同科學一樣，早就成了整個文化世界的財產了。看來，這個民族在一世紀以內，就在精神的創造方面，達到了和歐洲許多世紀的成績同等的高度，這個民族，現在又得到了自由創造的可能，它似乎應當以歐洲智識份子方面，受着比現在更深切的注意和研究。

現在難道還不是你們極堅決的提出歐洲資產階級和蘇聯民衆生活目的的區別問題的時候嗎？要知道現在已經夠明白的了：歐洲的政治領袖，不是在替什麼「整個的民權」利益服務，而是在替資本家的許多集團的利益服務，這些資本家集團正在互相的敵視着。這是對於「民族」完全不負責任的商人之間的敵視，這種敵視造成了許多危害人類的罪惡，例如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歐洲戰爭；這種敵視使得各民族之間的互相不信任的「自發性」更加深入了，把歐洲變成了好

些武裝營壘，階隨着極大數量的民衆勞動，黃金和鉄去生產大批屠殺人類的器具；這種資本家之間的互相敵視，使得世界的經濟恐慌更加厲害，而經濟恐慌階隨着「民族」的物質力量，降低着智識力量的生長；這種野獸和商人的敵視，還在組織着第二次的世界大屠殺。問一問自己罷：這是爲着什麼？總之，如果你們真心要治好你們的難受的疑惑和對於生活的消極態度，那麼，給自己提出些關於社會秩序的極簡單的問題，不要給自己沉溺在一些空話裏面，而要認真的想一想資本主義存在的目的，說得確實些，是它的存在的罪惡。

你們智識主義者，「認爲文化是寶貴的，文化的全人類性的意義是無可爭論的。」然而在你們的眼前，資本主義在歐洲內部，每天不斷的毀壞着你們所寶貴的文化，而在殖民地上，用自己的不人道的，無恥的政策，毫無疑問的在創造着歐洲文化的敵軍。如果這個野獸的「文化」在黑種大陸和黃種大陸上教出了幾千同樣的野獸，那末，不要忘記那邊還有幾萬萬被掠奪者乞丐、印度人、中國人、安南人，在大砲前面低下了頭，但是，這並不是說，他們是在低頭崇拜歐洲的文化。他們也開始了解了在蘇聯建設着形式上意義上都是另外一種的文化。

「在東方生活着的，是異教徒和野蠻人，」——你們這樣說，並且爲着證實東方的野蠻化，你們

指出東方婦女的地位。我們就來談談野蠻人罷。

在歐洲“Frisco Halls”的舞臺上，表演着幾十個，幾百個赤身裸體的女人。當你們看來，這種大庭廣衆之間玩着女人的裸體的把戲，是不是應當引起歐洲智識份子的母親，妻小，姊妹的某種抗議呢？我並不是從『道德』的觀點來說這種無恥玩意的意義，而是從生物學的和社會衛生的利益上着想。對於我，這種下流的，惡劣的玩意兒——毫無疑問的是歐洲資產階級腐敗化和野蠻化的證據。我深信，男子和女子的同性戀愛的明顯而迅速的增加——可以用經濟，就是家庭生活的昂貴來解釋的，——同時，也就因為這種醜態的，在大庭廣衆之間對於女人的糟踐，而更加快起來。歐洲資產階級野蠻化的徵象太多了，你們也不配來說東方人的野蠻。加入了蘇聯的那些種族的農民，非常之好的學習着了解真正文化的價值，以及婦女在實際生活里的作用的極重要的意義。中國的一些已經建立了蘇維埃的省份裏面，工人和農民也了解這種價值。印度人也要了解的。我們這星球上的整個勞働民衆，都應當了解。他們的自由道路在什麼地方。在整個地球上，他們正在爲着這種自由而鬥爭呢。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里，起來越兇猛的發展着一種鬥爭，這是在爭奪着煤油，鐵，這是爲着要武裝

起來再來屠殺一次幾千百萬的羣衆，這鬭爭是爲着爭奪少數人在政治經濟上壓迫大多數人的權利。這種卑劣的，無恥的，罪惡的鬭爭，是一些爲着無意識的積聚金錢而追逐的，因而野蠻化了的人的小小集團所組織的；而世界上一切教會之中的最虛偽，最罪惡的基督教教會，卻在頌揚着這種鬭爭。歐洲智識階層所驕傲的，這樣寶貴的『人道主義』，被這種鬭爭完全殺死了，毀滅了。無論什麼時候，智識階層，還沒有這樣清楚的暴露自己的無力，這樣不識羞恥的暴露自己對於實際生活的冷淡態度，像他們在二十世紀所暴露出來的；而這二十世紀是充滿了如此之多的悲劇，在這世界上製造着指揮階級的無恥主義。在政治方面，極有威權的指揮着智識階層的情感和思想的，是一些投機份子，資本家集團的馴服的執行他們意志的人；那些資本家集團交易着一切有人收買的東西，結果，永久是做的民衆精力的交易。這里，我在『民衆』這個字眼的意義裏面，不僅包括工人和農民，還有小官吏，資本之下的『職員』軍隊，總之，智識階層也包括在內，——這個智識階層，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醜態的破爛衣服上面，始終還是很鮮明的補綻。

熱中的在口頭上尋找着所謂『全人類的』理想，各種言語不同的智識份子其實只在自己的

民族的階級的偏見和成見上，互相的看着。因此，鄰居的缺點和罪過要比優點對於他們的興趣大得多。他們這樣時常的互相攻打着，以至於不知道誰挨打了多些，或是誰挨打了少些，因此是誰更值得敬重些。資本主義暗示了他們互相的懷疑主義的不信任，而很巧妙的利用着這一點。

他們沒有了解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簡直沒有在自己裏面找着力量和願念，出來反對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二一年資本家的血腥的，掠奪的干涉。蘇聯的政府要是逮捕一個大學教授，帝制黨，陰謀家，他們就抗議了；然而他們的資本家強姦安南，印度，非洲的民衆的時候，他們是冷淡的。如果在蘇聯鎗斃四五十個極惡劣的罪犯，那他們就叫喊着『禽獸的兇惡』；而如果在印度，在安南，用大砲機關鎗屠殺幾千幾萬毫無過失的人，那就人道的智識份子謙虛的沉默了。他們始終還不能夠估量蘇聯的積極力量十三年來的工作結果。政治家在國會里的報紙上暗示他們，說蘇維埃政權的工作完全是要毀滅『舊世界』，他們就相信的確是這樣。

而在蘇聯裏面很快的發展着一種過程，就是勞働民衆取得全人類文化所創造的最好的和毫無爭論的價值，這些價值的取得和發展的過程。舊的世界自然是在毀壞着，因為必須從個性的智識力量的各種各式的限制之中，從階級的，民族的，教會的思想和迷信之中，把個性解放出來。蘇聯的文

化過程的基本目的，是要把全世界的人聯合成一個整個的人類。這個工作是人類歷史的整個過程所指出來的，所暗示的，這個工作是全世界的，不僅只是民族的『復生運動』(Ressuscite)的開始。關於這個，以前只有個人幻想着——康帕納拉(註一)、託馬斯·穆爾(註二)、桑·西蒙·傅立葉，那還是在工業技術方面沒有實現這種幻想的可能時候。現在，這些可能已經有了，烏託邦社會主義者的幻想有了科學上的基礎；而實現這種幻想的工作，已經有幾千百萬的羣衆在做着。再長大一輩人，單在一個蘇聯裏面，在這個戰場上的工作者，就將近要有二萬萬人了。

不願意或是沒有能力了解的時候，才要信仰。

小私有者的階級本能和情緒，階級社會的盲目的擁護者的哲學，使得智識主義者「信仰」在蘇聯的個性是被鎮壓的，被壓迫的，說工業化是用強迫勞動進行的，彷彿埃及的建築金字塔。這不但

註一 康帕納拉(Componella)是十五、六世紀間的意大利的一個僧侶，著有太陽城一部書，是最早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

註二 託馬斯·穆爾(Thomas More)是和康帕納拉同時的英國人，他著的烏託邦(Utopia)就是「烏託邦社會主義」得名的由來。

態之中，十分踴躍智識精力和批評思想的人才會把這種謠言當作真話。

肯定的打消這種「鎮壓個性」的傳說的，就是在實際生活的各方面：在藝術，科學，技術的各方面的人才，數量上增在迅速的增加。在整個民衆都參加着文化工作過程國家裏面，也不會有另外的情形。

在二千五百萬家的『私有經濟』之中，在這些被羅曼諾夫皇朝的專制制度和『土地資產階級』的壓迫所束縛的不大識字的和完全不識字的農民之中，現在已經有二千二百萬家明瞭了集體經濟的合理和對於他們的利益，這種工作的新的形式，要使得農民脫離他們的守舊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脫離小私有者的動物性的性質，而解放出來。這種新形式可以給農民許多自由的時間，他們可以利用這種自由去消滅自己的不大識字的情形。一九三一年，蘇聯裏面受着教育的有五千萬成年人和兒童，這一年要出版的書，有八萬萬本——總共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印刷頁』。人民的需要已經到了五十萬萬頁了，然而工廠還來不及製造這麼許多紙。智識的飢渴是在生長着。蘇聯十三年來組織了幾十個科學研究館，新開辦的大學，技術專門學校，所有這些學術機關都充滿着青年學生，而從工農羣衆之中不斷地提拔出成千成萬的傳達文化的青年。

資產階級的國家是否曾經提出過，並且會不會提出吸引全體勞動民衆來參加文化事業的呢？歷史對於這個簡單問題的答覆是否定的。資本主義的幫助勞動人民智識上的發展，只侷限於工業商業的成效所必須的，有利的範圍。對於資本主義，人的用處只不過當作多多少少是一種廉價的力量，當作現存制度的擁護者。資本主義沒有發展到，也不會發展到了解真正文化的目的和意義——是努力發展和積聚智識上的精力。爲着要使這種精力不斷的發展，並且盡可能的迅速幫助人類運用自然界的一切力量 and 一切供獻，那就必須解放體力上的精力的最大限度的數量，使它脫離資本家，野獸和勞動人類的寄生蟲的狹隘的，貪慾的利益之中的無意識的，無政府性的工作。資本主義的意識代表，完全不會想像到人的個性是智識精力的極巨大的儲蓄器。不管那一切口頭上的狡辯和掩飾，少數統治多數的那種政權的擁護者的意識形態，本質上其實是動物性的。

階級國家是照着動物園的模型構造的，在那里，一切禽獸都關鎖在鐵籠子里，——而在階級的國家裏面，這是些多多少少巧妙的構造着的思想的籠子，這些思想把人類分裂開來，使得他們對於利益統一的認識和真正全人類的統一文化的發展，差不多成爲不可能的。

我難道要否認在蘇聯裏面個性是受着限制的，自然不否認的。在蘇聯，個性的意志每一次都要

受着限制，只要這個性的意志是敵視的反對着羣衆的意志的，——羣衆已經認識了建設新式生活的權利，已經提出了這樣的目的，——這種目的，是個性甚至超越自然的天才的個性，所不能夠達到的。蘇聯工農的先鋒隊伍，向着自己的最高目的進行，英勇地在自己的道路上忍受着許多表面上的，日常生活里的不方便和障礙。

個性爭持着自己的假自由，自己所習慣的，幾百年來教養出來的『鐵籠子』的獨立。『封鎖着作家，記者，哲學家，官吏，以及資本制度機器上的其他一切磨得很光滑的小件頭的籠子，自然比較起農民的籠子來是還更方便些。農民的發臭的，醜陋的木屋，他的『私有經濟』使得他要經常不斷的自衛着，抵抗着自然界『自發』力量的壞脾氣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強暴，資本主義國家是在農民身上剝着七層皮呢。在卡拉白里亞，在巴瓦里亞，在匈牙利，在白萊塔尼亞，在非洲，農民的心理並沒有多大的區別。全地球上的農民，大致同樣的『無能爲力』，同樣的傳染着動物性的個人主義。在蘇聯，農民轉變到了集體的勞動，逐漸的消滅着這種土地奴隸的特殊心理，這種叫化子似的私產的永久俘虜的特殊心理。

個人主義是外來的，從階級社會方面來的對於人的壓迫的結果；個人主義，這是個性抵抗強暴

的無結果的企圖。然而要知道自我保衛並不是什麼別的，恰好是一種自我限制，因為在自我保衛的狀態之中，智識精力的生長過程就遲緩了。這種狀態對於社會和個性是同樣有害的。『民族』化費着幾十萬萬金錢武裝起來，去反對鄰近的民族，個性化費着自己的大多數的力量來自衛，去抵抗階級社會的強暴。『生活是鬭爭？』是的，然而這應當是人和人類反對自然界的自發力量的鬭爭，應當是爲着取得對於這些力量的權力的鬭爭。階級國家把這種偉大的鬭爭，變成了爲着占有人的體力上的精力，爲着剝削他們的極卑鄙醜惡的爭奪。十九·二十世紀的智識份子的個人主義和農民的個人主義，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而只有表現方式上的差別，智識份子的個人主義更花花綠綠些，更光滑些，然而同樣是動物性的，同樣是盲目的。智識份子站在民衆的鐵砧和國家的錘子之間；一般的說，他的地位自然是很危險的，很戲劇式的，因爲現實對於他，通常總是敵視的，因此，就時常發生一種觀念，就是智識份子的被壓俘的思想，把自己所處地位的條件的艱難和不方便，推廣到整個世界，而在主觀的世界感覺的結果，就出現了哲學上的悲觀主義，日常生活里的懷疑主義，以及其他的畸形思想。大家知道的，悲觀主義的家鄉是東方，尤其是印度，那里的卡斯特式的（註三）社會制度真正達到了狂妄的程度。

社會的階級制度的現實，束縛着個性發展的自由，因此，個性就到現實範圍之外去尋找自己的位置和安逸。譬如在上帝里去尋找。勞動民衆，尋找着自然界自發力量對於他們的有益的，或是有害的現象的解釋，『異教式的』（註四）美麗地，把這些現象變化了類似人類的形象，不過這些形象比任何一個個人都要更加強有力些。民衆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美德和罪過，都分配給自己的神道；沃林普斯山（Olympus）和亞斯迦爾德山（Asgard）上的許多『神』——其實是擴大了的人（註五）。吳爾康（Vulcan）和託爾（Thor）就是鐵匠，同隨便那一個鐵匠都是同樣的，他們不過更強些，可是還說不上更巧妙些。（註六）勞動民衆宗教創造簡直是藝術的創作，這裏面沒有神祕，而完全是現實主義的，並沒有脫離現實的，這里，很肯定的覺得到勞動行爲的影響，目的其實是在獎勵這種行爲。民衆的創作詩歌之中，也看得出這麼一種事實的認識，就是講到臨了，現實並不是神道所創造的而

註三 卡斯特（Casta）是印度的埃及的『階級』——『等級』的名稱，印度有婆羅門，貴族，平民，賤民四種，『卡斯特』是極端嚴格的等級制度和其他國家的等級制度都不相同，絕對的不准賤民『高升』，所以這里用音譯，以免混淆。

註四 『異教式的』是指非基督教，尤其是『古代希臘文化式的』說的。

註五 沃林普斯是希臘神道的『洞府』，亞斯迦爾德是挪威的『洞府』。

註六 吳爾康是希臘神話里的火神，託爾是挪威神話里的雷神。

是人的勞動精力所創造的。民衆是『異教徒』甚至基督教變成了固定的國教之後一千五百年，在農民的觀念里，上帝仍舊是古代的那種神道；基督、馬東娜、聖徒都在這世上走着，干涉着人的勞動生活，像古代希臘和斯肯狄納維亞的神道一樣。

個人主義是在『私有經濟』的基礎上發生的。民族一層層的堆積着，建設了一個集體；而個人因爲某種原因分裂出去，脫離集體，也就是脫離那種不斷創造的現實，就製造了自己的唯一的上帝，理智所不能達到的，神祕的上帝，他的任務——就是辯護個人的獨立和權力的權利。這里，必須要有神祕，因爲如果用理智，就不能夠解釋個性的自我權力的權利，不能夠解釋『自我專制』。個人主義便得自己的上帝有了全知，全能，超越理智的性質，這就是單獨的個人所想要有的一些性質，然而這些性質卻只有在集體勞動所創造的現實之中才會發展。這種現實，永久落在人的理智之後，永久只在理智之下，要知道創造現實的理智雖然很慢的，卻在不斷的完善起來。如果不是這樣，那麼，現實就自然可以使人滿意；而滿意的狀態，卻是消極的狀態。現實是人的「理智的意志」的無窮盡的力量所創造的，這現實的發展決沒有停止的時候。而神祕的個人主義上帝，卻永久是不動的，沒有行動的，在創造工作上，是死的，他也不會是別的樣子，因爲他反映着創造工作上的個人主義的內部的無力。

每一個識字的人，都知道個人主義者的宗教玄學思想的無結果的動搖歷史。我們現在，這些「精神觀察的」動搖的無力，暴露得無可爭論的清楚了；個人主義者的哲學的完全破產，已經顯露。然而個人主義者，仍舊在無結果的尋找着生活的「謎」的答覆，他不在勞動的現實里去找，這種現實卻是各方面發展着的，而且像革命似的迅速，——他反而在所謂「自己的」「我」的內心」里去尋找這些答覆。個人主義者繼續保存着乞丐似的「私有經濟」，不願意使得生活豐富而有效果。他只在爲看自我保衛，而「自我深入」，他不是在生活，而是在藏躲，他那種「精神觀察的行爲」很像聖經上的一個英雄——沃難（註七）。

馴服地服從着資本主義國家的暗示，歐美的智識份子——文學家，政治家，經濟學家，以前的社會主義者而現在的投機家，像甘地那一類的幻想家，——自覺的或是不自覺的擁護着資產階級的階級制度的基礎，這種制度確定地阻礙着全人類文化過程的前進運動。——在這過程里，勞動民衆的創造新的現實的意志的積極作用，一天的擴大起來了。智識份子自以爲擁護着「民權主義」，雖然民權主義已經證明了，而且還在繼續證明着自己的無力。他們擁護「言論自由」，雖然報紙抓在

資本家手里，而只能夠替他們的無政府性的，不人道的，罪惡的利益服務。智識份子替自己的敵人做工，要知道東家永久是夥計的敵人，而『階級合作』的思想是天真的無意識，像羊子同狼講交情一樣。歐美的智識份子是在替自己的敵人做工，這種情形特別明顯的，不識羞恥的暴露出來——只要看他們對付蘇聯工農羣衆所開始的文化革命過程的那種態度。這個過程的發展，是在歐洲資產階級的極端敵視的空氣裏面，是在他們的強盜性的攻擊蘇聯的威嚇之下。這兩個條件的壓迫，差不多完全可以解釋一切消極性質的事實，而蘇聯工農的敵人卻最喜歡特別着重的指摘這些事實。

特別熱心和惡毒的指摘蘇維埃現實之中的這些消極現象的，是政客化的俄國僑民，歐洲資產階級報紙的報告人。他們這些僑民是誰？大多數是政治上的失敗人物，虛榮心重的小人，然而卻是些『大希望』的人。他們之中有些要想做馬薩里克（註八），有些要想做白里昂（註九）。有些——邱吉爾（註一〇），還有許多要想做福特（註一一），而所有這些人的共同的特色，卻是用了『不中用的手段』。

註八 馬薩里克 (Masaryk) —— 前捷克總統，已死。
註九 白里昂 (Bryan) —— 法國以前的內閣總理。
註一〇 邱吉爾 (Churchill) —— 英國以前的外交總長。
註一一 福特 (H. Ford) —— 美國的汽車大王。

想去奪取指揮的地位。我很熟悉他們的道德上和智識上的渺小，這是他們在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第一次革命之後就暴露了的，之後，他們每天在國會里表現了自己的無才，而到了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這種無才就暴露到了極點，他們還算是「反對專制的戰士」呢，自然，他們始終是擁護強國主義的。他們做了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上的自我認識的組織者，得到了一些名聲：總之，他們是市儈的意識代表。有這麼一句俗話，叫做「沒有魚的時候——蝦也要算魚了。」他們在俄國的實際生活里，就起了蝦的作用，他們儘在往後跳。這是智識階層在革命時代的通常的作用。然而他們的可恥的作用，不僅限於政治上經常的「改換路標」（註一二）和忘記「安尼把洛夫的宣誓。」從一九一七年起，他們服侍俄國的煤油工業家，紡織工業家，磨坊老闆和地主，同俄皇時代所剩下來的一些將軍在一起，而那些將軍卻在輕蔑他們，認為他們是叛徒，是俄皇的敵人。在俄國歷史上，他們所留下來的紀念，卻是做了俄國民衆的叛徒。在四年之中，他們進行着叛變，把「自己的」民衆出賣給你們的資本家，歐洲的智識份子先生們，呵！他們幫助狄尼庚，哥爾卻克，符朗格爾，猶乾尼

註一二

一九〇七年俄國文人後梅「參加」革命，就出了一本本子，叫做「路標」；一九二一年有一些文人轉變了，贊成「蘇維埃革命，就出了一種雜誌，叫做「改換路標」；後來，又翻印重新「革命」這屆是高爾基反對他們的。

失，以及其他的職業的殺人兇犯，幫助他們破壞自己國家的經濟，而那時候俄國的經濟已經被那個全歐洲的恥辱的四年大屠殺所搗毀了的。歐洲資本家和俄皇的將軍們，得着這些被輕蔑的人物的幫助，屠殺了蘇聯的幾十萬工農，燒燬了幾百個鄉村和哥薩克的田莊，破壞了鐵路，炸斷了橋梁，毀壞了一切可以毀壞的東西，爲着要完全消滅自己國家的力量，而把它賣給歐洲的資本家。問問他們：爲着什麼他們屠殺了民衆，破壞了民衆的經濟？他們會不識羞恥的回答你們，說是：「爲着民衆的利益，」而不說起爲什麼「民衆」把他們從自己國家里趕了出去。

從一九二六年起，他們幫助了無數次的反對工農政權的陰謀的組織。他們當然否認參加了這些罪案，雖然那些陰謀罪犯——他們的朋友——已經承認了曾經用「關於蘇維埃工作的，完全虛偽的消息」報告過他們的報紙，自然，陰謀家方面又是受着這些賣國賊的報紙的指導的。

歐洲的先生們，你們的人道主義，因爲四十八個淫虐專家，飢荒的組織者，受到了應當受的死刑的處罰，而激動起來了，這很奇怪！爲什麼，在你們的城市里差不多每天警察都在屠殺毫無罪過的工人，你們倒並不憤激那四十八個壞蛋，比杜塞爾多爾夫地方的淫虐專家區爾騰（Erdt）就是那個被判決過九次死刑的脚色，還要可惡。我不知道蘇維埃政府沒有把這些陰謀家公開審判的動機，然而

我猜得着的：有些犯罪手段的惡劣對於敵人，是太得意的，而把惡劣手段教給敵人，那就未免太天真了。順便的說：如果我是德國的公民，我是要反對公開審判那個區爾滕的，因為階級社會製造了，而且還在製造着很多很多的淫虐專家，我就不知道有什麼理由，可以辯護公開宣傳淫虐主義而提高罪犯的技術程度的必要。再則，我還要請教請教：為什麼大學教授 S. F. 柏拉圖諾夫，那樣一個帝制主義者，被捕了，歐洲的智識份子就出來擁護『個人自由』，然而如果這個個人是康姆主義者，你們就漠不相關了。

如果你們願意知道俄國僑民兇惡到什麼程度，可以讀一讀爲着反對蘇聯民衆而籌款的募捐宣言，這宣言印在巴黎的僑民帝制黨的機關報『復生』上面。

領導這個極下流的把戲的，是『大主教大人安東尼，俄國國外正教教會西諾德教區主席。』看罷，這就是這個狂妄傢伙的原文：

『我用上帝所給我的權力，讚美每一個反對紅魔政權的武器，凡是在暴動隊里或是單獨

註一三

區爾滕案件大概出在一四三一年初，好像中國報也曾經載過，有一個人專門引誘青年女子結婚，結婚之後不久，就把她們謀害，他一共殺死十一個女人，然後才破案。作者這里所說的，不知道是否這件案子。

復仇的個人，爲着這個俄國事業和基督事業而喪身的人，我都赦免他們的罪孽。首先，我讚美「俄國真理全民兄弟會」的一切武器和戰鬥。這兄弟會，用言論和行動，爲着上帝和俄國，實行着堅決的反對紅魔的鬭爭，已經不少年了。上帝的仁慈要降給每一個加入這個兄弟會或者幫助兄弟會的人。

大主教安東尼

很明顯的，這個大主教，基督教會的首領，是在讚美着對於民衆自由的壓迫和恐怖行動。你們難道不覺得，這樣的宣言，教會里的人對於屠殺的這種讚美，——那種教會中人顯然是兇惡得變成了白癡了，——在「文化國家」的京城里是不大合式嗎？你們難道不以為你們應當對這位「大人」叫一聲「噓」，「滾蛋」嗎？這個俄國神甫的野蠻行爲，不但是俄國僑民兇惡化的徵象，而且是歐洲智識主義者對於社會道德和社會衛生問題的極端可恥的冷淡態度的徵象，是不是？而你們還要說「東方的野蠻」！

你們相信俄國僑民的報告，自然，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然而我懷疑這是你們的權利我懷疑，因爲你們明顯的不理會對方的——工農政權方面的——報告。蘇維埃的報紙不遮蓋現實的消

極現象，蘇維埃報紙是建立在極嚴格的自我批評的原則之上的，它們沒有什麼垃圾是怕『拿出木屋』去的（註一四）。蘇維埃報紙是在幾百千萬羣衆之中工作着，這還是些不大識字的人，也不能夠怪他們不大識字；然而正直的人應當記着，不大識字的人是很容易做錯誤的。此外，還要知道，僑民報紙所靠它生活和安慰的那些謠言和誹謗，大多數還是根據蘇維埃的自我批評的事實而製造出來的。

我個人在莫斯科，在列寧格拉的報紙上和集會上，對自我批評的過大會經提出過抗議。我知道國外的僑民怎樣貪心的，怎樣熱烈的抓着一切，只要可以稍微滿足一下他們反對蘇聯工農的那種病態的惡毒心思。不久以前，我在蘇維埃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這是關於白萊謨（註一五）的書的，因為這本書出版的時候，被一個老的，可是不緻細的，不大通的文學家弄壞了。於是僑民報紙『槽』報的編輯，約瑟夫·赫森，很蠢的，兇惡得可笑的老頭子，立刻就發表了一篇社論，滑稽的高興着，說是：『甚至於高爾基都批評蘇維埃政權了！』他很知道我向來不客氣的要當面說真話，只要有人工作

註一四 俄國俗話：『拉取不要拿出木屋去』——等於中國文式語『家醜不可外揚』。

註一五 大概是 Alfred Edmund Bromm (1839-1884)，德國人，主要的著作是“*Illustrirtes Thierleben*”。

得不緻細，不忠實，總之是不好。然而他不能夠不添上許多謠言，像任何一個僑民「政治家」一樣。

有一種特別的真實。這種真實只能夠做厭世主義者精神上的食糧，做懷疑主義者精神上的食糧，他們的懷疑是由於愚蠢，再則，做冷淡的人的精神上的食糧，爲的要辯護自己的冷淡。這是陳舊的，腐爛的，喘氣的『真實』，這是給豬吃的碗腳。這種真實，在蘇聯裏面正在被新文化的建設者的先遣隊伍克服着，消滅着。我看得很清楚，我很知道這種真實妨礙着正直的人的工作。然而我反對用這種真實去餵養，去安慰那些很公平地被歷史消滅了的人。

你們問：「在工農之中有沒有人不滿意的？引起他們的不滿意的是什麼？」不滿意的人自然是有的；如果十三年的工作的結果，就已經使得一萬萬六千萬人在一切需要和願望方面都完完全全滿足了，那才是非常奇特的事情。不滿意的原因，正在於十三年的工作，政權機關還不能夠滿足勞動民衆的迅速生長的文化需要。不夠的多得很，也就有不少人咕嚕着，抱怨着。這些抱怨可以說是可笑的，因爲這是太早了，太不加考慮了，然而我不說這些抱怨是可笑的，因爲這些抱怨裏面很肯定的包含着對於政府力量的確信，以爲政府能夠滿足國內的一切需要。自然，不滿意的，甚至積極反對着蘇維埃政府的工作的，還有一部份富裕的農民，他們以爲革命應當使他們變成大地主，而把貧民交給

他們支配，放在他們的掌握裏面。自然，這一部份的農民反對集體化，贊成個人經濟，雇用勞動等等，而這些都不可避免地要引導到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復活的。然而這部份農民的把戲已經失敗了，他們的抵抗集體經濟是無希望的，不過由於情性罷了。

工農羣衆的最積極的隊伍是不抱怨的，他們工作着。他們很知道，政權是他們自己，他們所缺少的，所需要的一切，只能夠靠他們自己的精力去取得滿足。正是這種對於自己能力和權力的認識，引起了那些社會主義競賽，衝鋒隊運動之類的現象，以及其他勞動興奮，勞動的英雄主義的無可爭論的徵象。這種認識的力量，使得許多企業里的五年計畫在兩年半之內就完成了。

工人懂得最主要的，是他應當明白政權是在他們手里。在資產階級的國家裏面，法律是在上層，在國會里製造出來的，而且是爲着鞏固指揮階級的政權而製造的。蘇聯的立法，卻是產生在下層機關的，在鄉村蘇維埃里，在工廠作坊委員會里，考察一下任何一個法令的進程，就很容易懂得每一個法令的目的——不但是滿足勞動羣衆的真正需要，而且是他們文化程度增高的明白的證據。

蘇聯的全體工農羣衆逐漸的開始了解，他們的物質生活的豐富和文化發展的過程，被歐美資本家故意的，敵視的阻礙着。這種了解，自然很可以幫助他們政治上的自我認識和對於自己力量的

認識的增長。

如果歐美的智識份子不聽那些說鬼話的叛徒，而認真的，正直的想一想蘇聯裏面現在所開展着的過程的歷史意義，那末，他們就可以懂得這個過程的意義——是一萬萬六千萬民衆在取得全人類文化的無可爭論的價值；他們也就可以懂得，這些民衆不但是在爲着自己工作，而且是在爲着全人類工作，是在表現給全人類看：理智地組織起來了的生活意志能够創造出這樣的奇蹟。

說到臨了，必須問一問：歐美的智識主義要不要新的全世界的屠殺，這種屠殺是要減少他們的數目而使得他們更加無力，更加野蠻化的？蘇聯的工農羣衆不要戰爭，他們要建設「平等的人」的國家。然而如果有人來進攻蘇聯的工農羣衆，那末，他們一定全體起來抵抗，像一個整個兒集體，他們一定會勝利，因爲歷史也在爲着他們工作呢。

論 仇 敵

——如果敵人不投降，那就要消滅他

工農先進隊伍的精力，被馬克斯、列寧的學說組織着，領導了蘇聯的勞動民衆去達到這樣的目
的，這目的的意義可以用三個簡單的字眼表現出來：創造新的世界。在蘇聯，甚至於兒童團的小孩子
也懂得爲着創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條件，就必須：使得在個人的掌握和腰包之中沒有積聚鉅大財
富的可能，這種財富到處都是從工農的血汗裏擠出來的；要消滅人與人之間的階級分裂，消滅少數
人剝削多數人的勞動創造精力的一切可能；要暴露宗教和民族偏見的惡毒的詭騙，這種偏見使人
互相不了解，互相隔膜；要從勞動者的生活裏，掃除那幾百年的奴隸制度所教養出來的野蠻和醜惡
的日常生活中的習慣；要消滅一切——凡是阻礙勞動民衆認識自己的生活利益的一致的，一切使
得這種認識不能夠發展，使得資本家能夠製造屠殺，把幾百萬勞動者送上戰場去互相殘殺的——

這種戰爭的根本目的永久是一樣：就是鞏固資本家的掠奪權利，鞏固他們的無意識的壓榨的貪慾，鞏固他們對於勞動者的政權。

最後結算起來，這就是：創造對於大眾，對於每一個個人，發展自己力量和才能的自由條件，創造對於大眾都是平等的，達到那種高度的可能，現在能夠達到這種高度的，卻只有例外的，所謂「偉大的人物」，還要枉費許多多餘的精力。

這是幻想，浪漫諦克？不是的，這是現實。農的敵人，才把這種羣衆建設新世界的運動叫做幻想；浪漫諦克，這種人——像不久以前寫信給我的那個「俄國女人」一樣，——他們代表着「有教育的，歐化思想的一個薄薄的階層」，他們像她所寫那樣，深信：

「理智——是少數人的特產，不能夠在羣衆裏去找理智的。」「文化——是少數有很大的天才的人所創造的。」

那「俄國女人」的這些話，很粗魯的，可是很正確的表現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全部意義和整個兒的窮乏，表現了資產階級思想所能夠對抗無產階級羣衆的精神上的復活的一切。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精神上的復活——這是無可爭論的現實。蘇聯的工人階級，走在各國無產者的頭裏，非常

之好證實着這個現實。他們對自己提出了巨大的任務，他們的集中的精力很有成效的在解決着這種任務。解決之中的困難是很大的，然而只要你要——你就能夠！十三年的工人專政，工人階級，以前差不多是沒有武裝的，沒有鞋襪的，沒有衣服的，飢餓的工人階級，把歐洲資本家所武裝得很好的白黨軍隊從自己國內趕了出去，把干涉主義者的軍隊趕了出去。

十三年來建設着自己的國家，雖然有少數忠實，誠懇，真心替工人階級服務的專門家，然而也有許多卑劣的叛徒，他們非常之可惡的使得自己的同伴丟臉，甚至於使得科學的本身都丟臉，在世界資產階級憎恨的空氣裏，在「機械的公民」的毒蛇似的噓氣裏，這些「機械的公民」幸災樂禍的指摘着一切小錯誤，缺點和罪過，這種條件的艱難和可怕，連工人階級自己都還沒有清楚的概念，——在這樣的地獄似的條件裏工作着，工人階級發展了，非常之奇妙的動員着真正革命的，創造神奇的精力。

只有工人和黨的英雄的勇敢，——黨是表現工人的理智的，表現革命羣衆的理智的，——只有這種勇敢，才能夠在現在這種不利的條件裏，實行這樣的功績，例如，按照 1929—30 年的計劃，要提高工業生產百分之二十二，而事實上達到了一百分之二十五；集體農場應當擴大到二千萬公畝，

而事實上達到了三千六百萬公畝。同時，化費着自己的力量在建設工業，領導農村的改造，工人階級和農民還從自己的羣衆裏，不斷的提拔出幾百幾千的天才的負責人員，衝鋒隊員，工人通信員，作家，發明家，以及一般的——新的，自己的智識力量。

在國內，極狡猾的敵人在組織饑荒來反對我們，富農用恐怖手段對付集體農場的農民，暗殺，放火，各種各樣的卑劣手段，——一切活完了歷史所給的時期的人物，都在反對我們，這使得我們有權利認爲我們還在國內戰爭的狀態之中。這裏就有一個自然的結論：如果敵人不投降，——那就要消滅他。

在國外，反對蘇聯的創造工作的——有歐洲的資本。牠也已經活完了自己的時期，而註定要滅亡的了。然而牠還想要，也還有些力量來抵抗，不可避免的命運。牠和在蘇聯內部實行着害蟲政策的叛徒聯繫着，而這些叛徒儘在用自己的下流手段，幫助牠那強盜似的陰謀。

班加賽，1914—18年歐洲屠殺的著名的組織者之一，綽號就叫做「班加賽——戰爭」的，這個人幾乎斷送了法國資本家的玩意兒，還有以前的社會主義者白里昂，著名的酒鬼毗爾肯赫德動員，以及資本的其餘的忠實奴才，正在準備着基督教會的教主所讚美的對於蘇聯的強盜式的進攻。

我們是生活在同世界的整個資產階級戰爭的條件之中。這使得工人階級一定要積極的準備自衛，準備擁護他們爲着自己所已經建設的一切，爲着教育各國的無產者，而在這十三年之中建設新世界的英勇犧牲的工作。

工人階級和農民應當武裝起來，記住着，紅軍的強大的力量已經勝利的打通過一次世界資本主義的襲擊，那時候自己還是沒有武裝的，飢餓的，沒有鞋襪的，沒有衣服的，自己的指導同志，還是不很知道軍事行動的狡猾的。現在我們有了紅軍，這種軍隊裏的每一個戰士都都知道他們將要爲着什麼而作戰。

如果歐洲資本家，因爲恐懼着不可避免的將來而完全發了瘋，居然敢於把自己的工人農民派出來反對我們，那末，必須用言論和行動這樣的打擊那些蠢笨的頭腦，使得這個打擊變成對於資本的腦殼的最後一個打擊，而把牠送進墳墓裏去，這憤甚是歷史完全按照着時刻給牠掘好了的。

論 叛 徒

當須要說明太別致的現象的時候，總要把牠同更普通些的，更明白些的某種東西去比較，就是要尋找「類似物」。然而叛徒卻是階級國家的天性的那麼特別而可惡的產物，簡直沒有什麼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同叛徒比較。我想，同叛徒去比較，甚至於要侮辱了傷寒症的發子。

在叛徒之中，耶穌諾·亞瑞甫 (Ejvo Avel) 算是特別出名的了，他是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這黨的「戰鬪團」的領導者，維克多·柴爾諾夫，波里斯·薩文珂夫，以及這個政黨的其他領袖的私人的好朋友，這個政黨在自己的歷史上，給了那個猶大（註一）——亞瑞甫那麼巨大的地位。像大多數的英雄一樣，他也是「吹大了的」，其實，他是一個神奇古怪地「簡單的入」。他自己也

註一 猶大是由亞耶穌基督的叛徒。

很了解自已天性的奇妙的簡單，而在自己寫給柏林市警察總監的字條裏，對於他同黨的朋友給他畫上的「偉大領袖的背光」(註二)提出過抗議。可以假定他的抗議不但是出於自衛的動機，而且是很誠懇的。一九二六年國家出版局出版的厄尼古拉耶夫斯基的「亞瑞甫的結局」可以證實我關於亞瑞甫的「誠懇」的意見，是有很結實的理由的。

還是在一八九三年，亞瑞甫就自覺的，經過了考慮的選定了叛徒的職業，決定了自己要做好細的工作，當作自己的「生活的道路」，「生活的方法」，而一直不變的走着這條道路，直到碰住為止。碰住了，搖動了，然而沒有跌倒，而是從政治，從革命方面跳到旁邊去，舒服的，安寧的躺到富麗的市僧窩兒裏，陪着一個「奢華的女人」。這是個公主式的娼妓；她在一九〇四年，安慰過契里爾·羅曼諾夫的「戰鬪生涯」，「在滿洲的戰場上」，在他的專車裏，契里爾·羅曼諾夫，就是那個現在在國外自稱為皇帝的，或者又給自己加上了什麼別的響亮的官銜。亞瑞甫同這個咖啡戲院裏的「奢華的女人」，還是在他當着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的時候認識的。

註 11

「背光」(Gloria)是神像頭背後的光圈——佛像也有的一——這裏是說革命前亞瑞甫過在柏林時候的事情。那時社會革命黨還把牠當做領袖。

他是個胖胖的，厚嘴唇，情感主義的人。在寫給妍頭的信裏，他自稱爲「你的唯一的兔子」，「你的小爸爸」。他給她寫得那麼動情：「我怎樣地想要你在這裏一塊兒洗澡呵。」「你是我的唯一的親近的人，這麼親近，以致於我感覺不到我們之間的任何區別，什麼地方是你，什麼地方是我——我也不知道了，這不是一句空話。」

「我想，這裏可以相信這個猶大，——他在這裏所講的，的確不是一句空話，雖然同維克多·柴爾諾夫和黨裏的其他中央委員有過多年的友誼之後，似乎也很難感覺不到自己和娼妓之間的「任何區別」。然而就是在市僧之中，也可以碰見同隨便那一個髒水坑同樣深沉的性格。」

亞瑞甫很幸運的避開了自己的革命朋友和警察朋友，開始過那種「美麗生活」，那就是理想地教養出來的市僧，從普通的商店老板直到總長和王公大臣的生活的特色。他玩着紙牌，玩着交易所的玩意，給自己的妍頭買些金剛鑽和銀碗盞，同她去洗洗海水浴，總之是旅行旅行，——有幸福地活着。他錢是有的，——黨的經費他是毫無監督的化費的，爲着絞死的人警察也很大量的付給他價錢的。

一九一五年，柏林警察把他關在監獄裏去了，他在那裏讀着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施·史替爾納

爾的著作，「唯一的人和他的私產」這是一部可以叫做市儈個人主義的福音經的書；他讀着龍白洛左的「天才和瘋狂」亞爾策巴塞夫的「沙寧」，然而比讀書更勤快的是「幹着交易所的投資」那個「奢華的女人」說他「一般的不大喜歡讀書」。坐在監獄裏，他記起了上帝也是爲着市儈的方便而造出來的，就在給那個「奢華的」傢伙的信裏面寫：「上帝應當給我力量。靠着上帝的幫助，我可以忍受一切。」

而且，可能的是他一生一世都信仰上帝的；也許，這是他的立場和工作的一種雜誌性所用得着的：必須要說服自己——在革命黨人和警察，在忠實的人和下流的人之上，還有第三種人存在着，對於這第三種人，那兩方面都是同樣的沒有分別。上帝的所以造出來，本來就不是要使得人偉大起來，而是要使一切人在上帝而前平等地認識自己的渺小。正因爲這個目的，「教會裏的偉大的神甫」宗教裁判官和獨裁者要用「火和劍」來堅定上帝的存在；正因爲這個目的，我們現代的憎惡人類者之中的愛上帝的人，也要來堅定上帝的存在。

然而也可以這樣想：亞瑞甫，這個職業的猶大，感覺不到革命黨人和警察之間的任何區別：這一些在打死省長和總長，那一些在打死幾百個忠實的、英雄情緒的青年。猶大在兩方面的營壘裏都有

朋友，他們相信了他的組織層級的異乎尋常的本領；而他，爲着要賺些錢來過『美麗的生活』，就向
右背叛左邊，向左背叛右邊，向右出賣左邊，向左出賣右邊。這個兩面三刀的工作用不着任何意識上
的遮蓋，任何理論和辯護的理由。亞瑞甫沒有辯護，他簡單的向左邊說：

『你們還要什麼？我幫助了你們殺死你們的仇敵。』同樣的他對他右邊的朋友說。藝術家，職業
上傾向於想像的人，可以把亞瑞甫描寫成一個深沉的，甚至於悲劇式的個性，這種個性信仰叛徒事
業是自己的歷史任務，因爲自己憎惡人類，所以就有這樣的信仰，因爲復仇性的願意消滅人，不管他
是誰。在腐爛的市儈之中，什麼都是可能的，這種對於人，對於生活的態度——絕望了的人的態度
——也是可能的。

不久以前，"Neno Freie Presse"（新自由報）的記者，在布哈萊斯特認識了一個小小的宗
派的代表，這個宗派進行着很厲害的宣傳，而在居民之中有了相當的影響。這個宗派的信徒自稱爲
『克里斯倩』（註三）。他們的學說非常之可以表示我們時代的特色。

『克里斯倩』的宗派是發生在美國的。那裏，他們有幾千信徒。這『克里斯倩』的公社在倫敦

註三 就是 "Christian" —— 基督教徒的意思，因爲恐怕和普通的「基督教徒」混淆，所以聯做這四個字。

和巴黎也有。這宗派的學說，登載在底下的法文的印刷品——他們的綱領裏面：

「我們應當竭力使人類死完。我們所謂生活，其實只是幻象；而我們的最高目的應當是死。我們的第一等的責任，因此，就是幫助人類的死絕。本宗派的信徒不過性的生活，而且應當儘可能的使得別人也沒有小孩子。我們應當儘可能的喫得少些。我們越喫得少，我們的生活越壞，我們就越快的和死接近。我們不得已在死之前還要過的這些日子，應當貢獻給禱告。要高聲的誦讀聖經和讚美詩。「克里斯精」不吸煙，不喝酒精品。他們不和人見面，過着孤獨的生活，而準備着死。」

那個維也納的報館記者，同這宗派的一個指導者愛倫·克洛茨談了話，她給他說：

「我們走到了事物的盡頭。我們覺得一切發明，一切救濟人類的學說，都是枉然的。社會主義，素食主義，自然主義，以及其他的救濟人類的萬應靈藥，都是無意識的，胡鬧的。法西斯主義也不能夠給什麼。我們知道，在我們現在，許多不信仰的人又回到宗教方面來了。然而這也是無用的。一切都是幻象和欺騙。我們深信，人是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也做不成功的人。應當消滅。自殺卻不能夠解決問題，因為大批的自殺是要發生震動的，反而要使活的人產生求生的意志。不行，應當慢慢的死，使地球都變成沙漠，而地球上的人絕種。」

然而這種病得要死的人的哲學，對於被稱爲『偉大的好細』的耶穌·亞瑞甫，也是不對勁的；要誘惑他這一類的人，這種哲學是沒有用的。藝術家碰見這種惡劣材料，也是一無辦法，因爲那個『奢華的女人』關於他的生活的結局的公開的表白，已經把這個藝術材料弄壞了，無可救藥的了。

在猶大——亞瑞甫的形象裏面，很明顯的有點兒像公牛的地方：公牛在屠場上的責任，就是引誘自己的公牛同志到屠夫的屠刀下去。總而言之，耶穌·亞瑞甫是個典型的，甚至於很簡單化的市儈。他像這一種半人類的一切屬員一樣，有本領爲着個人的舒服而背叛一切和一切人，出賣一切和一切人。極有才能的『簡單主義』的諷刺畫家沃拉甫·古爾白朗遜畫了一張完全正確的亞瑞甫的肖像：臉是胖胖的，厚嘴唇，像豬似的毫不關心的小眼睛。在這個胖胖的嘴臉上，應當再加上那個沒有精采的聲音，和那種永久向着下面的什麼地方，向着自己的腳底下講話的神氣。

『一切都是相對的。』卑鄙醜惡——也是一樣。亞瑞甫的工作範圍比較得是狹小的，規模並不大。有人問列沃尼德·安德列耶夫他關於亞瑞甫事件的意見怎麼樣？這位作家的回答是：『一點兒也不懂，不知是怎樣的一件家務事情。』

現代的叛徒——別謝多夫斯基，德米特里耶夫斯基，以及其他的（註四）——工作的規模要大得多，他們所背叛的不是個人，不是幾個團體，而是企圖背叛工人階級。自然，他們的企圖不能夠給什麼特別有力的效果，除非是暫時的，不長久的，又使白黨僑民的喘着氣的希望活潑一下。我自然不把別謝多夫斯基們去比猶大——亞瑞甫那種智力上滯鈍的，不通的，各方面都很有限量的傢伙；他們比他還要渺小得多，還要卑鄙齷齪。他們自然是些磨練過的頭腦的人，有很發展的謊騙的本領，只要用得着，也會並不那麼壞的假裝着『民衆』的誠實的朋友。他們大家都是那麼一班智識階層的典型，這種智識階層是有自己的『歷史』的——癡癡地從右邊到左邊，又從左派到右派的搖盪的歷史，定期重復的放棄『半世紀來的平民智識份子的傳統，首先就是拒絕替被壓迫階級服務——這是在社會生活上，而在私人生活上，是拒絕責任心的命令。』——V.V. 沃洛夫斯基關於『叛徒』的實質是這樣說法的。

不久以前，叛徒之中的一個，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發表了自己的『懺悔』，而在這篇文章裏承認了：『我們是奴隸：我們需要先生，領袖，預言家。』這倒是對的。他們很甘心的跟着隨便什麼領袖爬，所

註四 別謝多夫斯基等是一九二九至三〇年蘇聯駐在外國的使領機關裏的一些叛徒。

希望於每一個領袖的，也永久是一樣；也許，這個領袖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之下，會擴大一些「市儈式的幸福」罷。

八十年代的初期，在警察靠着迭加耶夫們的幫助撲滅了民意黨（註五）之後，他們這些「前革命黨人」就「聰明了起來」，開始宣傳爲着個人的道德上的完成起見應當放棄革命事業，他們說：「只有個人的道德上的完成能夠改變社會制度。」一九〇五——〇六年革命之後，他們在「路標」集裏，由彼得·史特魯維領頭，——這史特魯維以前是馬克斯主義者，而現在是帝制主義者，然而對於自己倒是忠實的，仍舊是那麼一個空談家，他一生一世都是這麼一個傢伙，——開始給「賢哲的歐洲市儈」唱讚美歌和祈禱文，也宣傳了道德上的完成，宣傳了回到宗教去，回到教會去。

在我們這時代，「過去的人」很明白的看出了：工農政權簡直不算擴大市儈式的幸福的範圍，完全是認真的決計要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而且一點兒不懷疑各國無產階級還要來模倣自己的榜樣，——在我們這時代，「過去的人」又來說起「聖經的真理」和底下這些話了：

「宣示的真理，並不在於恐嚇和強暴所保障的死法律裏，而在人的上帝式的自由意志裏，

註五 民意黨 (Narodnaya Vola) 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俄國革命黨。

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模樣造出來的，然而要達到這個最高自由，就應當在『最後的，最偉大的鬭爭』裏衝出去，而首先要洒脫哲學的魔術和蜘蛛網式的結構的羈勒，爲着要看見那『最重要的』，而達到智識的源頭。科學建設在比花剛石還要堅固的基礎上，也應當這樣建設；然而形式上的真理，却要在上帝式的自由意志的世界裏去求得，在那裏，天主『在一無所有之上維繫着大地』。在這上帝式的自由意志的世界裏，存在的成爲不存在的；而經驗的真理，我們在這裏受着時間限制，爲着日常的需要而求得的，不會成爲永久的，不變的真理——必然的。然而能够走到誓約之地的，只有那樣的人，就是不回顧的走着，不摸索腳底下的基地，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也不問爲着什麼。』

你們看罷——這是很陳舊的歌曲，而且歌得很沒有才能。說『到誓約之地去』，就是到市僧式的幸福那裏去，應當要『不回顧的走着』，『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不問爲着什麼』，這是他們撒謊的。他們向來就只知道應當爬到『什麼地方去，爲着什麼』，他們在十月之後立刻就懂得了這個，當時，他們對工人政府實行怠工，當時，他們去服侍狄尼庚，哥爾卻克，符朗格爾們，以及各種各式的匪徒，破壞我們國家經濟的匪徒；他們在工人階級勝利之後，暗暗的爬到工人政黨裏來，來替蘇維埃

服務的時候，也是知道『到什麼地方去，爲着什麼』的，——他們的爬來，是爲着要做僭探，去安慰那些政客化的僑民，而且爲着他們以前的主人的利益，用各種方法來妨害我們。

最特色的是，在一切大事件裏的叛徒，總是用同樣的關於『個人的道德上的完成』的說話，來掩蓋他們的叛變，用同樣的必須回到宗教，教會裏去的說話，來掩蓋他們的叛變。這在我們這個時候是特別來得出色，我們現在，只有聾子和瞎子，才會不見教會已經明顯的，無恥的，暴露了自己的最下流的階級實質，暴露了自己對於銀行家和工廠主的奴隸式的，奴才式的關係；似乎教會還從來沒有這樣完全的赤裸裸的顯露過自己的『祕密的祕密』。

這些『過去的人』奇妙地不愛乾淨，他們的記憶力奇妙的薄弱。他們曾經『誠懇的，熱烈的』氣憤着基督教會的主教把一個基督教徒列夫·託爾斯泰開除了出去，這難道很久了嗎；而我已經聽見他們現在都在靈感地吻着主教的手了，有一個僑民文學家就在大庭廣衆之間幹了這麼一套把戲。一九〇六年之後，安納託里·卡爾斯基就做了些公開的色情狂的小說，詩人羅斯拉夫列夫歌頌了猶大，米哈伊爾·亞爾策巴塞夫在小說『沙寧』裏面，讚美着，頌揚着十足的，妄自尊大的賤貨，而彼得·史特魯維在『俄國思想』上發表了『希臘正教的神學論』，在『路標』集裏還給歐洲的

市僧唱了讚美歌和祈禱文，——十月革命之後的僑民也是一樣，連『讚美歌』和『尿道發炎症』之間的區別，就算是聲音上的區別罷，他們也沒有能力分辨的了。

看罷，他們現在又在歡迎『第三次的僑民』那些小騙子了，他們那麼興奮，彷彿芝加哥的匪徒跑來幫助他們的渺小了。似乎，只有約瑟夫·赫森，無恥惡毒得可笑的一個小報的編輯，倒覺得別謝多夫斯基是在胡說，而指出他的書裏面『有許多不明白的，沒講到底的地方』，必須詳細的解釋，別謝多夫斯基究竟——

『信仰着什麼，希望了什麼；什麼使得他燒燬他所崇拜的，而崇拜他所要燒燬的。』
解釋其實是用不着的。別謝多夫斯基自己公開的敘述了自己：

『資產者的兒子，估衣商人的兒子；以前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國防派，後來是立憲民權黨，右派社會革命黨，到布爾塞維克政變的時候，已經成了左派社會革命黨。』

後來，爬來給工人階級服務，而現在做了工人階級的叛徒。這裏，我可以引證一下聖經：『狗回到了自己的狗窩裏去了。』而那個約瑟夫·赫森——也是最腐化的，最滑稽的人物中的一個，他們坐在『巴比倫的河岸』上，做自己的下流性格的俘虜。他簡直像耶利米（卅六）一樣的寫着：

「唉，現在不止一個英國政府在給紅色的莫斯科講交情呢。」——他悲哀的寫着。——「歐洲不會也不肯抵抗布爾塞維克。不會自己維持自己，自我保存的，感覺的削弱，也許，甚至於是對自我維持的權利的認識的削弱。」——歐洲對於布爾塞維克，對於自己的殖民地，對於自己本身，難道不是喫着這些苦頭嗎？在自己去叫了美國人，日本人，印度人，黑人，來把自己打碎了之後，在「自己給自己造成了那麼一個歷史的糾葛，」就是在最好的情形之中，在這幾十年以內也是跳不出去的了；——這樣之後，還只說歐洲聯合起來反對美國的關稅政策，保護自己的錢口袋，——那不是可憐的呼號嗎？」

赫森寫得好。可是，不會相信他就能幫助歐洲。在他的報上，那個小叛徒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發表了自己的「懺悔」——一篇很蠢笨的文章。有一部份還是關於我的。引證出來：

「……有一個人，我們把他儘可能的理想化了。我們忘記了：這個人是個什麼出身。各方面都寫信給他，——這是啞吧奴隸寫給他的。從深刻的心靈裏，用眼淚，用血寫給他，敘述自己的生，活，請求他的回音，請求他給個意思，怎麼辦。我們的時代——是個信條的時代。我們需要先生，領

註六 耶利米 (Jeremi or Jeremia)，聖經舊約裏的先言家。

袖，預言家。除開他，還有誰能夠出來說話，擁護他所終生擁護的——似乎是這樣罷——擁護人的個性呢？而他答覆了。我們讀着他的文章，真是莫名其妙。他極粗魯的，極不可憐的，把伸給他的手推開了，他向着打開在他面前的心靈唾罵了。從那時候起，他對於我們已經是不存在的了。我們詛咒了他。」

這樣的人，完全沒有幽默的感覺。「詛咒了！唔，怎麼能夠寫出，甚至於印出這樣的昏話：『詛咒了？』要是一個蠢貨，或是白萊陽式的美國人，或是主教，那才會在二十世紀的下半期來詛咒什麼人？貴族派頭的特色是：『我們忘記了這個人是個什麼出身。』這些可憐的無聊話裏面，有一點是對的，就是我在三十年前就寫了這種『過去的人』，然而我沒有擁護他們，我不過表現了他們。現在，我又要來寫別謝多夫斯基，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等等『過去的人』了，這些人，自然比我在三十年前所寫的那些，還要有害些。說最後一批的『過去的人』寫了些痛哭流涕的信給我，也是對的，然而說他們請求我給他們什麼意見，那就沒有這麼一回事；沒有的，這是他們——他們之中的最無恥的，最不通的——倒給我說了一些意見；在這些出主意的顧問之中，也有那樣的人，——如果他們就在我的左近——我簡直國痛打他們一頓。跳到了『沒有埋葬的死人的墳場』上去，跳到了『過去的人』那

裏去這些小小的，可是很惡劣的叛徒，自然要引起白黨僑民的『無事可做的政治家』的注意和贊成，這種注意對於他們簡直是必須的；而那些『政治家』無聊的愚蠢的造謠，誣蔑蘇聯的工人人民衆和他們的領袖，已經有十年了。被歷史壓碎了，因為俄國的現實生活就是沒有他們參加也在非常之好的進行着，他們就恨毒起來了，尤其因為甚至於歐美的資本家——也『痛心嫉首的』——承認了蘇維埃國家的無可爭論的建設成績，他們就更加恨毒了，這些腐敗的僑民，自然很高興的聽着『第三次僑民』的誹謗誑騙的空談。然而聽是聽着，已經不相信了。這是感覺得到的，不相信了。

因為惰性的關係，因為習慣的關係，他們還在自己的報紙上，互相的安慰着：俄國的民衆快要來叫我們了，快要來叫我們了！看罷，民衆方面要派出四萬代表來，他們來給我們說，像古時候對『瓦里亞格人』（註七）說的一樣：

『我們的土地，因為農工的勞動，現在是更富饒了，更豐富了；請你們來做國王罷，來占有這些土地罷。』

註七 俄國古代歷史的傳說：當時『民衆』沒有國王，就派代表去請求『瓦里亞格』人來統治；其實這些瓦里亞格不過是些武士，做當時商人的保鏢的（像前幾年中國四川軍閥的『陝南隊』一樣）；等到武士攫取了政權，就造出這樣的『俄國空想』來，說是『民衆』去請他們來統治的。

那時候——他們夢見了——他們用強盜奴僕的資格駕臨了，因為家庭裏的秩序，總是奴僕管理的，而在資產階級的國家裏面——就是在各方面的，法律化的掠奪裏面——總是那一部份的智識階層來服務，來辯護的，這種智識階層永久宣傳着「道德上的完成」而規定些宗教，民族，階級的信條。

然而所有這些，都是「幻想」和「夢想」。誰也不會來叫你們到什麼地方去。現實是悲哀的，無希望的。不久以前，他們之中的一個，醫治好了自己的「智識階層病」，在工廠裏做着工，用這樣的話描寫了這個現實：「我們的生活怎麼樣？很壞。大家都罵够了，互相憎惡着，誰也不相信誰。青年非常的困難，他們差不多不知道家鄉，俄國話也忘記了。而老輩的僑民，越來越得勁的給歐洲資產階級唱着自己的「國歌」——「我呀，不幸的老板娘呀，你可憐可憐罷。」這個「國歌」是一隻小調，叫做「Buhai」，美國人已經把他編進了狐步舞的音樂裏去了。資產階級，自然是又響又啞，他們自己也是那麼艱難地生活着。」

論 文 化

我覺得對於工人階級，頗會這樣一種關於文化的觀點是有些益處的。

一切稱為文化的都是從自我保護的本能裏發生出來的，都是人在反對自然界的「後援」的鬥爭過程裏的勞動所創造出來的文化——這是人要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理智的力量去創造「第二個自然界」的結果。

第一個自然界——是無組織的。自然力量間的混亂狀態，這些力量賞賜給人一些地震，洪水，颶風，旱災，不可忍受的炎熱和同樣的寒冷。第二個自然界，無意識的浪濤替自己的力量在造成那些產生疾病的微生物——黴菌，在造成極有害的蟲豸——蚊子，蠍子，蒼蠅，這些東西會把傷寒症，瘧疾等等毒質傳達到人的血裏去，牠在造成無數的有害而無益的植物和草類，浪費掉那些營養人類的穀

類和果實所需要的健全的滋養料，而去繁殖寄生蟲。可以說，自然界根本就沒有造出什麼有益於人的機體的穀類，而現在我們所喫的穀類——原始人是逐漸的訓練着自己的機體，經過長期的苦痛和許多人的死亡，方才喫慣的。暗示這個的，有這樣一件事實，就是歐洲人最初用番薯做食品的時候，引起過很痛苦的病症，這不但是——一種番薯有這樣的性質。在所有這些對於人敵視而無益的寄生蟲之中，自然界也造出了他——人——然而也同樣造成了這麼一種野獸，和其他的野獸一樣。

這一種野獸原來是最感覺得身體上的苦痛的，固然，他發展自己的自我保護的能力也就比其他的野獸來得更加快，更加細膩，更加多方面。自然保護的本能，教會了他在植物和草類之中分辨出對於他有益的穀類，果實，知藥草，訓練動物，穿起獸皮來，住在洞裏去，想出打獵的武器，自衛的武器，以及減輕勞動的石頭工具。

人的發明力逐漸的，慢慢的發展起來，觀察着鳥卵或是果殼怎樣浮在水面上，他就造出船來，用魚刺來做針，等等。這些發明，我們現在稱為最簡單的，原始的發明，卻是創造「第二個自然界」的最初嘗試的步驟，牠們在人裏面驚醒了飢餓和性慾的本能之外的認識「第一個自然界」的本能——引起了自然科學的萌芽：計算，測量，輕重，以及自我認識的本能，從這裏發生了宗教和精神觀察的——

思考的——哲學。

科學是文化的基礎，是主要的力量，創造那『第二個自然界』的；而『第二個自然界』正是文化。

宗教和精神觀察的哲學，照我看來，應當算是屬於藝術的創造的，這是人企圖把自己的經驗，自己的感情和幻想化成形象，把自己的感想形成思想的一種藝術。人把自己的最好的願望，自己關於全知，全能的幻想，自己要克服『第一個自然界』的敵視人的自發力量的要求化成了神道（上帝）的形象。

對於工人階級，這樣一種見解應當是特別接近的，特別明白的，就是說：在這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人的理智，想像，意志的力量創造出來的，別種創造文化的力量是沒有的。

用粗澀的一塊塊燒煉過的泥土，工人會建築出非常之好的房屋，『文化之宮』，城市。從一些不成形的一塊塊鑽石裏，他造成了，而且還在造成着『第一個自然界』裏所沒有的一切東西——鐵，鐵路橋，解剖器具，蒸汽機的發動機，印刷機器等等——他用自己的理智使得鋼鐵也有了精神。

學者，觀察着，研究着一切存在在『第一個自然界』裏的現象，教人用這『第一個』的力量去創

造「第二個」教人關心自己的健康，延長自己的生命。藝術家觀察着人的內心世界——心理，表現給人看他的偉大和卑劣，他的理智的力量，稱他的獸性的力量。

三個人是創造文化的學者，藝術家和工人。先進的工人階級，像我們蘇維埃的這種工人階級，應當知道沒有一種勞動是沒有文化意義的，對於勞動的愛情越看越加——那末，文化也就越高，而且如果工人階級很好的明白科學，藝術，勞動的左右全局的意義，那末，他們對於舊世界的完全一般的勝利，也要來得更加快些。

我覺得，在這樣一種對於文化的了解裏面，也就建立着新道德的基礎，這種新道德應當把工人階級武裝起來，去實行堅決的鬭爭，反對還保存在工人之中的舊世界的恥辱的遺產的一切，——反對懶惰，酗酒，殘忍，反對那種趕緊要弄好自己和人的市僧式的安逸生活，而損害他的階級的偉大，英勇的任務的小傾向。

論文化、哲學、戀愛及死亡

——答——覆——

這篇文章——是我對於這一年來各種各樣的人寄給我的信的盡了我的力量的答覆。回答每一封信，我是沒有體力上的可能。對於反猶太派，反革命者，以及一般混蛋的信，我不回答，也不再回答了。我看，只有那些青年人，他們因為文化程度的不夠，因為沒有組織好的日常生活的觸動和激勵引起了皮膚上的癢，他們對於現在的現實，提出太高的要求，現實還不能夠滿足這些要求呢，——只有這樣的青年，才值得答覆。

我想，他們並不是壞人，然而那種一定要『好的』生活，而且一定要『爲着自己』的生活的渴望，使他們變成了盲目的；他們不看見，也不了解，現在蘇聯所發展着的歷史過程，正是向着建設『好的生活』的方向很快的發展的。然而，假使寫信給我的人，永久站在那種不大通的，不負責任的，個人的

主義的『批評主義』的溼滑的，爛泥坑似的基地上，冒着沉沒到耳朵邊的危險，假使他們在自己裏面找不到離開這個死地的意志的力量，——那末，我想，『好的生活』輪不到他們，也根本不是爲他們的。

一切種種道理，都是從一些考察研究所得來的，小小的，簡單的真理積聚起來的。然而，在沒有寬恕的鬭爭裏面，在爲着生命，爲着『自己的個性』的恐懼裏面，自我保存的本能使得人不能不『狡猾地講道理』。因此，人就用狡猾字句的垃圾和灰塵掩蔽了簡單真理的光明。於是就有必要來掃清真理上的垃圾，提醒一切種種真理是怎樣產生的。

人類文化是一種生物學的現象，牠表現着，理解着，鼓勵着人要求生活的意志，——這是一種盲目的意志，凡是生物都有的：植物，蟲豸，禽獸。人開始創造自己的文化，是從他感覺到自己比別種野獸更弱的動物那時候起的。這種『脆弱』的感覺，使得他的自我保存的本能更快的，更有效力的發展起來。正是在人的自我保衛的本能的基礎上，發展了他的最寶貴的能力——考察的能力。這種能力，連螞蟻，烏鴉，老虎也是有的；然而人考察着，比較着，把考察的能力發達到了更有價值的——努力

要去認識生活的一切現象。後來，認識達到了純正科學的高度，而在我們現在，這種認識已經下所變成本能，已經變成了人的一種生物學上的，有機的特性，像他的笑和段落分明的善惡一樣。

以前這麼說着：「愛情和飢餓管理着世界，」所謂「愛情」是說的傳種的要求，所謂「飢餓」是說的肉體上的飢餓；然而現在，我們已經有權利說到第三種的本能——認識的本能，智識上的飢餓。

考察，照牠的本質和結果來說，是在反對自然界的鬭爭之中的主要的工具和正確的方法這是人的文化發達的主要基礎。

火會燃燒；要感覺火的益處是容易的，而學會取得火的方法，卻要難得多。人看見樹木的磨擦也會發生熱度，就學會了取火的方法。人就用磨擦去取火——這方法我們直到現在還用着，擦着火柴蠟燭，後來的油燈，是怎樣發明的呢？人晾着他所打死的動物的肚腔，遇見了晚上的黑暗，就用一塊樹木插在肉裏面，那裏是有許多脂肪的。人就看見那樹木吸收着燒熔了的脂肪，燃燒得更加明亮，更加長久些，用着這樣的「燈盞」，人過了幾千年，甚至於現在已經有了電燈，也還要用牠。

人考察了果子的或是鳥蛋的殼怎樣浮在水面上，就發明了船。後來，人做到了，使鋼鐵做的鉅大

的船隻，能夠在水上浮動。人看見風吹倒的樹木的根會掘起泥土和石塊來，就懂得了槓桿的意義，這是後來的機器的基礎。人考察着蜘蛛的結網，學會了織布，很可能的人把獸皮縫起來，遮蓋自己的身體，抵抗寒冷，是學的鳥——有些鳥會用樹葉縫自己的窠兒。現在這樣強有力的武裝着的人的一切東西，都是這樣發見的。

我們的生活還要輕鬆些，我們之間的關係還要好些，如果人知道了，記好了，這世界上除開人的意志和理智沒有別的創造力量。以為在人之外，另外存在着什麼別的理智力量的那種概念，是從自然界的原始性的混亂之中發生出來的，那時候的理智還只武裝着極渺小的經驗，因此，牠自己也是很渺小的。在那時候，如果有一塊石頭從山上脫了下來而往下滾，那末，人不懂得這是什麼力量在使得石頭轉動起來，他以為在這地上和天上引起各種各式運動的力量，都是他不能夠了解的。他被一些自然界現象恐嚇着，又被另外一些現象愛撫着，他就把他所不解的一切都當做神道，甚至於把死也當做神道，——而死卻是停止一切眼睛所看得見的運動的力量。

有幾個寫信給我的人發議論，說到「最主要的一題目：說到愛情和死亡，他們尤其不放心的就是死亡，」這是攔住了一切活的道路的。

我很接近的知道二十多個並不這麼笨的人，他們以為關於死亡的思索，會使他們更聰明起來。他們引起了我的各種不同的情緒，然而我公開的說，對於哲學家最不冤枉的是可惜一下那樣的時間，那時間——是額角碰在石牆上而從眼睛裏冒出了火星，他們卻要用這些火星去照徹夜的黑暗，就這樣無結果的枉費在這種企圖上的時間。

我覺得，向着這方面努力於「精神觀察的工作的熱情」會使得「認識能力」滯鈍起來，而把「精神觀察者」引導到黑暗的角落裏去，在那裏，青年的哲學家出於自己的意料之外的，「精神上」得到這麼一個結論：「寫完了，而覺得，這不是我，共產青年團員，馬克斯主義者所寫的，而鬼知道是誰寫的。」

我想，「講哲學」不應當那麼「精神觀察地」，而應當緩細的觀察，不要照着書本，而要依據直接經驗的事實，運用現實的極豐富的材料，在這現實裏面，正在發展着「我們這世紀的偉大事業」——建設着「新的世界」，而且應當知道並且記得，這個現實是要縮短歷史所規定給牠的期限的，而在那所謂「哲學」方面，卻早就預先準備了許多東西，正要來阻礙「我們這世紀的偉大事業」的發展。

如果青年人只在想着：過了五十年，他們將要從地面上走到地底裏去，『到那世界空間的黑暗和寒冷裏去，』或是『到不知什麼地方去』——像他們所寫的——那末，這就是說，這種人已經離開了生活。而生活是妒忌得很的，對於不做事的人是不肯寬恕的，所以，青年人不應當覺得侮辱，如果生活打着他們的後腦，把他們推到玄學的荒地上去。生活——不管人的罪過所造成的那些表面上的畸形——始終是生物學地健康的，充滿着熱血的，牠要求強壯的，勇敢的，能夠營養牠的人，而手淫家和空談家，牠是要毫無寬恕的掃光的。

我以為，在一切『估量人的相互關係和世界的哲學系統』之中，最好的，最正確的一個，正是還沒有存在的，可是正在建設着的那一個。這系統是個什麼樣的——我不知道，而猜想牠——也不是我的事情。

關於『愛情』，我不來講了。可是，我要說，在性慾方面——在我看起來——青年往往放任那麼樣的胡鬧，過一個時期，這些胡鬧者要出很大的代價呢。我很誠懇的願意那嚴厲的報復期限，對於胡鬧的愚妄和羞恥的報復，儘可能的快些來到罷。

順便的說說狗。狗對於人的友誼的情感，倒是很有益處的，可以學習一下，然而在其餘的方面，人

卻不應當模倣這個四脚朋友。

像我們這世界的一切現象一樣，死亡也是應當研究的一個事實。科學越來越注意的，越來越堅決的研究着這個事實。研究，這意思就是——占有。

死亡對於生活也有牠的功績，——死亡消滅着一切做完了的，活過了的，無結果地異墜着這土地的。有人可以說，死亡也不饒赦小孩子，這卻是還沒有發展的力量，牠還時常殺死一些成年人也是沒有來得及做完自己的力量。時常，天賦很好的，對社會很有價值的人，在青年時代就死了，而無聊的傢伙和空談家，一直活到非常之老的時候，鸚鵡就要活到一百歲以上。所有這些——也的確是這樣的。然而這些可悲的事實，牠們的原因並不是什麼「死亡的盲目，自發，不可克服的力量」，而是社會經濟性質的不健全和惡劣的條件。社會上有價值的人的早死的原因，通常總是體力上的過份疲乏，而這是那種對於人的關係的結果，那就是野獸似的「老板式的」對於人的關係，只把人當做勞動力看待，只想趕快的「利用」這個勞動力，唯恐怕給別的老板利用了去。大家知道的，成千成萬的工人和職員，不到時候就衰弱了，滅亡了，這是由於無恥的，下流的，而且時常是無意識的緊張的剝削他

們的力量。

人因為霍亂，傷寒，瘧疾，肺癆，鼠疫等等而死亡。然而要知道，在「文化的國家」裏，並不一定要在着引起這些疾病的微生蟲呵。並不一定要在那些非常美麗的大都市的周圍，緊緊的擁上一個骯髒的市郊的圈子，使那裏的房屋塞滿了許多人，像塞滿了垃圾的地洞一樣。奢華的旅館在社會上並沒有很好的醫院那麼重要。重複這些最粗淺的真理，實在很不好意思，然而看來對於不大「識字」的人，這是必要的。

資本家的「文化」政權的擁護者和贊助人，不能夠不自己說服自己，說如果虱子咬屁股，那味道並不是虱子不好，也不是屁股不好，而是「自然界的公律。」不對，不好的正是市僧的屁股，這種屁股坐慣了很安靜，很舒服，很軟和的地方，——要知道正是市僧的屁股造出了，保存着那些條件：放在虱子，臭蟲，窮困，醜觀，不識字，迷信，偏見的存在，以及勞動貧民世界所病痛的一切，這個勞動貧民世界正在爲着市僧屁股的舒服而不斷的工作着。

看罷，蘇聯還只剛剛開始改良兒童教育和母性保護的社會條件，兒童的死亡率立刻就降低了，並且還儘在降低着。而工人的健康更加堅固了，因爲有放假制度，「休養所」等等。

大家知道的，「文化的國家」寬洪大量的浪費着金錢在生產鎗械，大砲，飛機，坦克車，炸藥，瓦斯，以及一切屠殺羣衆的東西。殺人的價值越來越昂貴了，吞沒着幾萬噸的金子，這都是工人製造出來的，用種種的形式徵收衆人，那邊收集起來的，而那些人，就因為這個要被鎗殺，炸死，毒死，沉死在海底裏。

大砲，炸彈，機關鎗，子彈，以及這種奇烈的屠殺等來的其他東西的工廠主，準備着將來的國際大屠殺，他們和歐洲中世紀的黨族，決定了掠奪富裕的東方，準備去佔領耶路撒冷，而「解放天主的檳榔」的，是同樣的熱心，自然還要更加結實，更加精密。區別只有這點：對於現代的「沒有恐懼」不受寬赦的武士，「腳踏機冷」是在許多銀行所集中的都市街道上，而「天主的檳榔」卻在保險箱裏。

看罷——這是籌着死亡的工作，那些非常之感覺到蘇聯生活的不舒服的青年人——其實這生活還只是剛才開始在新的形式裏建設起來——應當把自己的注意自己對於哲學的傾向放在這一方面來。我覺得，許多青年對於個人的不舒服，侮辱，不幸的感覺發展得太痛楚了。這是不好的徵象，這是生活能力發展得太微弱的徵象。生活要求強壯，純潔，忍耐的火。

死亡，消滅着那些沒有把自己的力量完全用盡在事業裏的人，這還並不這麼有害——這裏，人可以限制死亡的力量和工作，如果他們更注意的，更謹慎的互相照顧着，如果更大量些化費一些經費來保護健康，注意衛生，消毒，和研究疾病的原因。科學戰勝了疹疾，霍亂，喉痧，鼠疫，——傳染病，因為這種疾病，是可以過早的死掉成千成萬的人的。醫生一天天的更加有經驗起來，成為反對死亡的更勝利的戰士。

死亡的害處，卻在於牠暗示人對於牠的恐懼，使得有些人浪費自己的寶貴的力量去「精神觀察地」研究哲學的「死亡祕密」。然而哲學連芥末也沒有想出來，而芥末和蓖麻油在反對死亡的鬭爭裏，比赫本豪爾或是E.哈特曼的哲學要有益得多。

死亡的害處，是在於因為對牠恐懼，所以人的想像就造出什麼上帝，什麼「那一邊的世界」以及那種愚笨的空想，像天堂和地獄。然而我們早就達到了這樣的程度：我們這些「會死的」人——鑛學工程師，鑛工，鐵匠，比地底下的火神，奧爾康還要巧妙，而電學技師比猶辟特以前的雷電的主神還要有能力，對於生活還要有益處。

「那一邊的世界」是在我們感情的黑暗區域裏，這種感情和原始人類的情感比較起來，其實

並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為死的恐懼統治着這些情感，同時還有「傳種本能」的混亂的工作，那傳種本能的無理性的行動也是死的恐懼所激動的。假使「那一邊的世界」是存在在宇宙的某個地方，那末，我們一定也要發見牠的，先組織好太陽系之內的各個星球之間的交通，再弄好各個世界之間的交通。然而這可以不必十分心急，先關心着這個地球上的生活的良好建設罷。

還用得着說嗎——「天堂」是巫祝和「教會神父」的很蠢笨的空想，這種空想的作用是要對於在這世界裏受着地獄似的痛苦的人，給一個肥皂泡似的希望，說是在別的地方去休息休息，這算是報償。此外，還計算着，對於上天的天堂幸福的幻想，可以在窮人的眼光裏，稍微掩蔽一下，甚至於完全撲滅那富人在地上的生活的華麗而誘惑的光彩。

死亡的害處，是在於宗教建築在對於牠的恐懼之上。在原始人類的自覺生活的初期，宗教的創造是他們的一種嘗試，要想組織自然界現象的混亂形態，而把這些現象變成類人的神道的形象，——這是民衆的創作，裏面並沒有絲毫恐嚇，而有一定的社會利益的意義，幫助思想，幻想，想像的發展，直到現在，還沒有喪失一種「藝術」創作的價值。

巫祝和教會中人，消滅了藝術性的宗教的創作，而從民衆的宗教概念裏造出了愚笨的，恐嚇的

道德系統。他們用這個手段很久的阻礙了思想，宇宙認識，幻想，想像的自由發展。

對於文化的發達，特別有恐嚇影響的就是基督教，牠把古代人所造出來的類人的神道都變成了仙魔，而使這些仙魔充塞了全世界。基督教產生了成千成萬的信徒，他們因為恐懼着仙魔的力量，統對人宣傳脫離世界，傳染給人一些黯淡的陰慘的迷信；而誰的思想是反抗這種狂妄的禁慾主義和教會的畸形的壓迫的，他們就認為他是仙魔的俘虜，異端，夫道不道，妖魔，而把他活活的在柴堆上燒死。除開基督教之外，沒有一個宗教想到製定那種『神聖的宗教裁判』這種制度差不多延長到七百年，在柴堆上燒死的，就不止十萬『異端』和『妖魔』，而還有幾十萬受了此較輕的刑罰。不管基督教的那樣著名的『人道主義』這種宗教裁判制度，在西班牙 1800 直到年才被拿破崙所廢止，而在意大利——是在 1808 年，然而在這之後還有入來企圖恢復這種制度呢。基督教反對科學的那種狂妄的，沒有寬恕的鬭爭，是歐洲歷史上的最可恥的現象，這種鬭爭直到我們現在還沒有充分完全的，明白的敘述過。教會所賞賜給文明人的道德上的野蠻化，最可以看得出的就是這樣的事實，在帝國主義鬭爭的那幾年，基督教徒的德國人禱告着：『上帝，懲罰英國罷！』對着同一個上帝，禱告着同樣的事實的，是英國人。法國人，俄國人，禱告那個『博愛的上帝』，請他幫助殺人的事業。

我希望，對於這些寫信給我的人，關於他們所說的宗教的「價值」，宗教的「必要」，「宗教是生活道德的基礎」，以及是「安慰」的問題，我回答得已經十分確定的了。至於「安慰」那末，我深信人的理智的勞動，最能夠完全的安慰人。

總之，我們這世界裏的一切其實是很簡單的，一切任務和祕密，只有人的勞動和創造，人的意志和理智的力量能夠解決。

一切複雜起來，模糊起來，都是由於一班聰明人要「狡猾的講道理」，這些聰明人要辯護可恥的現實，而使人和牠調和。

現在正是這種時候了：我們應當承認除開人的理智，在這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別的理智力量，我們這地上的世界，以及我們關於宇宙的一切概念，都只是由我們的理智組織起來的，而且正在組織着。還在理智影響之外的有：冰山的流動，狂風，地震，旱災，走不過的大泥潭，龐大的森林，不生產的沙漠，野獸，毒蛇，寄生蟲——在人之外存在着的，只有混亂和無限制的空間，充滿着一團糟的星球，這一團糟之中，人的理智和他的認識本能，也安置了，並且還在安置着整齊的秩序，同樣的有成效，像人在自己地球上安置着秩序一樣：他在這裏，使得泥潭乾燥，灌溉着沙漠，在山上鑿出道路來，打死兇惡的

野獸和寄生蟲，像個主人似的『整理着』自己的地球。

也許，我們也不這麼樣了解自然界力量的本質，然而我們已經不再服從這些力量，而在統治着這些力量，而牠們馴服地替我們服務。假使這還不能夠安慰那些悲觀主義者，那末，能夠安慰他們的，就只有他們對於文化力量的不信任的情感，他們對於生活的厭惡的邏輯上，實踐上的結論了。文化史告訴我們，人的勞動所造成的智識，由科學積聚起來，還儘在生長，越來越深刻，廣泛，尖銳，而是我們的認識能力和創造力量的將來的無窮發展的出發點。因此，爲着要很快的，很有成效的發展文化起見，我們應當好好的去知道文化的歷史。

我所回答的這些寫信給我的人，很不知道過去，或是完全不知道，或是不願意知道，——這個不願意知道很確定的表示要求生活的意志的極度衰落。那些說『過去的人生活得輕鬆些，自由些』的，說『託爾斯泰否認文化是對的』，說『書籍只會製造驕傲』的，說『郭果里從自我批評開始，而終究回到了上帝跟前』的，——所有這些人，都不是正軌的，都不是健康的人，照我的觀點看起來，這一類的人，似乎是在多起來，也許是因為他們的埋怨越來越病態了，越來越高聲了。所有這些埋怨都

表示個人主義的癡癡的抽搐，而且在尼日涅迭維茨克的一個農民或是市民的信裏，很確當的說出來：『我看，在集體農場裏面，沒有我的自由心靈的自由，與其到那裏去，還不如去做流浪人。』

這個人其實並沒有『自由的心靈』也決不會有，因為人從古以來就在反對人的鬭爭裏生活，而不是在反對自然界而贊助人。這並不是新鮮的，而且是很簡單的思想，然而有些思想的表面上的天真，不過證明牠們的堅實的真理。人在反對着人，經常的緊張着，用盡一切力量和才能自衛着，內心裏是不能夠像應當自由的那麼自由的。社會條件，使得人只能夠有三種立場：壓迫者，被壓迫者，或是不可調和的調和者，——這樣的社會條件必須消滅。

一切都要消滅，凡是這樣或是那樣——在物體上的障礙形式裏，從自然界方面，從國家的階級結構方面，或是從『思想的』強暴方面，例如社會的強暴，——來阻礙人的力量，才能的自由發展的，阻礙文化過程的發展的，都應當消滅。工人階級很有成效的開始了這個事業，正因為這個事業開始了，所以引起了個人主義的臨死的癡癡。

不能夠否認，個人的行動在科學，技術，藝術方面，曾經給了，並且還在給着光榮的成績，只要這種行動完全合於指揮階級——資產階級——的『傳統』趣味，利益的趨勢，而且正在迎合這種趨勢，

那末，以前固然給了光榮的成績，以後還會給的。

然而每一次，只要個性是反對着全世界的市僧主義的利益、習慣、思想、傳統」的，那末，他在「環境」之中就找不着自己的地位，——這種「個性」就要被驅逐，被監禁在牢獄裏，被燒死在柴堆上。受着蘇格拉底和加里萊沃（註一）的命運的，有幾十個，幾百個個性，他們企圖要動搖日常生活和思想的穩定基礎。在對於不肯諂媚的人，因此也就是不合用的人的這種迫害裏面，世界的市僧完全公開的暴露了那個可惡的兩面心靈的全部底細，那種兩面心靈對於他們是完全必要的，這是他們的自衛的手段，鞏固自己對於世界的統治的手段。

大家知道的，照他們的思想，感覺的本質上來說，市僧是深刻的個人主義的。他們也不會是別樣的，因為他們的個人主義是「私有財產的神聖制度」所造成的，這制度是市僧社會的根本基礎。市僧的一切種種哲學，目的都在於鞏固和辯護這個基礎，彷彿這是唯一的，把人引導到「博愛、平等、自由」引導到「全世界的階級合作」的基礎。

註一

加里萊沃 (Galileo) 是意大利古代的 Galileo Galilei 著名學者、數學家 and 物理學家，他證明了哥白尼的學說——地球繞日而轉的學說。當他被宗教裁判的時候，受着非刑敲打，而他的叫喊着的回答，仍舊是說：「一定是這是轉動的」（說地球）。

這種哲學的虛偽被馬克斯的學說明確的暴露了。被那麼許多事實證明了。例如 1914—18 年的歐洲大戰，法西斯主義，而法西斯主義是因為歐洲工人階級組織得不充分，是因為工人階級還受着市僧主義影響的很厲害的毒，所以發生的，所以還存在着。

市僧的個人主義的兩面心靈和虛偽，在牠對於個性的態度上，是完全明顯的。市僧主義用死刑消滅各個個別的個性，一般的還在阻礙個性的力量和才能的正軌發展，而使得牠畸形化。個性在階級國家之中的生長，受着各種限制，像民族利益和階級利益的壓迫的複雜系統，宗教哲學和「法律」觀念的系統。這種系統的目的是要發展人的「社會動物」的本性，而所得的恰好相反：大多數人的確被牠教成了少數人的家庭動物，而那少數感覺很強的人，卻很容易的得到了壓迫大多數人的方法和手段。

「強者」的積極性，主要的是表現在兇惡的積聚資本的過程裏，那就是合法化的掠奪，此外，還表現在反對社會的犯罪裏，這卻是法律所要追究的，就是些小小的偷盜，匪徒的行爲，以及性慾上的放縱，——這可以對於精力給一個廣大的出路，而那些精力正在沒有別的用處，不能夠用別種方法去化費的時候。

在比較脆弱的人，階級壓迫的複雜系統的壓力，影響着他們的感覺，影響着他們的「下意識」，就引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情緒和對於生活的恐懼，使他們像我們的原始人類的祖宗一樣的想法，而原始人類是一切種種神道和宗教的創造者，這就是使他們以為在人之外，存在着什麼敵視人的，不可克服的「事實的力量。」對於事實的崇拜使人成爲消極的。

在另外一些人，被生活裏的矛盾所震動的感覺阻礙了，蒙蔽了意識的生長，然而這倒並不妨礙這些人以爲他們的「意識已經決定了實質。」——這樣的「精神情緒」使得人和現實的分離更加深入，使他成爲無政府主義者，而讓他說出這種惡毒的蠢話：

「從十五歲起，實際生活這樣的耍着我，彷彿貓兒耍老鼠一樣，而現在，我憎惡一切教育的人，我比他們聰明些，我很後悔在戰場上不顧惜自己的拿了鎗桿擁護過他們。」

這是已在無結果的「擁護自己」的鬭爭裏野蠻化了的人的叫喊。

資本主義的階級的國家制度，把人分做壓迫者和不可調和的調和者，——這是早就無可爭論地證明了的，再來說起也是多餘的了。然而，還是要說一說，因爲有許多青年人，趕緊要在生活裏占據他們的舒服的位置，大概不懂得這種趕緊的慌亂，會使得他們回到過去時代——回到那

個悲劇的馬戲院，在那馬戲院的舞臺上，資本主義的現實是那麽無恥的在表現着，在那馬戲院裏，調和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是在扮演着抒情詩性的小丑。

著名的數學家愛因斯坦，全世界都承認他是個天才的人物，他想來是懂得現代的現實的。看罷他在英文報「Sunday Dispatch」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在這文章裏，對於布爾塞維克主義有這樣的估量：

「布爾塞維克主義是奇妙的實驗。社會革命會走到共產主義的方向去，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布爾塞維克的試驗是值得做的。」

新時代歷史的主要潮流，是反對着個人主義而要在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原則上來改造生活。這不是「布爾塞維克的空想」，這是全人類的文化發展的自然的邏輯上的結果。布爾塞維克是歷史所產生的，他們是歷史的「合法的」孩子，歷史創造了他們，教育了他們，把他們放到了第一等的地位，做工農羣衆的組織者和領袖。

「過去」很充分地肯定的告訴我們：動物性的，畜生似的個人主義，是小私有經濟的基礎，這曾經是，而且現在還是發生寄生蟲和野獸的惡毒的腐爛的基地，那些寄生蟲和野獸，因為瘋狂了的發

財的熱情，而兇惡得不堪，他們會爲着自己的利益，在戰爭裏消滅幾千萬的工農，而且每天用過份的勞動，喫不飽，飢餓，疾病，在消滅着幾萬工農。

符拉狄米爾·伊里支的天才和他的同志的精力所創造的黨——工人階級的腦筋——擔負了空前鉅大的困難的工作：他們是在建設着真正平等的人的社會主義社會。

他們以前和現在工作的條件是這樣的：

活的材料，照自己的天性來講是有才能的，然而是不大識字的，或是簡直不識字的，非常之不文化的，被羅曼諾夫皇朝的專制制度和畸形的不文化的俄國資本主義所無政府主義化得非常厲害的：

農民——占着全國人民的百分之八十五，——幾百年來被教訓得「在斧背上磨大麥，」在草鞋裏喝酸菜湯，」被叫化子似的日常生活，苦役似的工作壓迫着，迷信的，酗酒的，被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內戰爭弄得完全破產了的農民，他們甚至於現在，在受了城市的革命影響十年之後，大多數還是保存着小私產者的心理，瞎老鼠的心理；

非常之會發議論的，一百年以來儘在解決着「社會道德」問題的，沒有自由的智識階層，他們

用消極的怠工來迎接十月，或是手裏拿着鎗桿來積極的反抗，而一部分直到現在還在用『言論和行動』反對着蘇維埃政權，有意的無意的在實行着害蟲政策；

許多外省小城市裏的小市僧，這是資本的最馴服的奴才軍隊，這些強盜軍隊慣於用騙子的手段剝削工農的；

叫化子似的設備的工廠和作坊，而且被國內戰爭破壞了一半；完全沒有製造機器的工廠；

受着外國資本的支配，該着非常之豐富的原料，而資本家只要趕快搜括幾百萬的財富，卻沒有學會開發這些原料，他們寧可掠奪和出賣民衆的財富；

非常之廣大的國家，而非非常之少的鐵路，橋樑炸斷了，車輛弄破了，又沒有汽車道。

在所有這些之外，還有世界資本階級的積穢，不斷，真正的憎恨。

這只是很不完全的一篇遺產的賬目，工人階級和牠的黨所接受的艱難困苦的遺產的賬目。

此外，還有這麼一種人，他們昨天的生活是那麼安寧和舒服，以致於今天的文化成績只會在他們所稱爲『心靈』的那個器官裏，引起一種狐狸的，或是狼的仇恨心。他們也許要舒服得多，如果新的現實比現在這情形還要壞一百分之一百，因為對於他們是『越壞就越好』，也有那樣的人，他們的

被「過去」磨練得那麼光滑，以致於「現在的」事實只在他們舌頭的皮膚上滑過去，不碰着他們的精神，也不碰着他們的心。

最後，還要加上很大一批蠢才，爛貨，「破爛傢伙」兩面心靈的「無產階級的朋友」以及牠的許多其他的寄生蟲。

在這樣的條件和這樣的人的嚴密包圍之中，在古代的泥土，骯髒，腐爛的爛泥坑的基地上，蘇維埃政權發展了工作，這種工作的成效是明顯的，無可爭論的，奇妙之至的。

「我們的實際生活越來越殘酷了，——有這麼『兩個人』用這樣的話向我寫出了許多人的抱怨。這些是很不知道過去的人的話，但是，這情形是可能的，因為黨一定應當極堅決的行動，牠也的確是在堅決的行動，這種堅決性，對於被敵人包圍着的軍隊的領袖是必須的，——這個領袖堅決的相信：這軍隊的戰士有力量可以打碎敵人。」

不知因為什麼奇怪的原因，大多數寫信給我的人的意見，責罵和抱怨都是不大通的。要用年青來解釋這種不通也是不行：兒童團員還要年青些，可是他們的社會上的「通順」似乎在感

覺上也比這些二十歲以外的人要強些，有些時候，覺得這一個或是那一個抱怨的傢伙故意在「裝傻瓜。」例如：

「工人應當首先在自己裏面取消階級心理。」

換句話說，就是工人階級應當在意識上解除武裝。這蠢得來連奇怪都不用奇怪的了。最可注意的是，寫信給我的人，一個也不說起工人階級還必須取消市儈的習慣、趣味、拋棄市儈的心理，這種心理在工人也還是有的。

最時常的抱怨是在高等學校裏找不着位置。「不准我們去學習，」——他們寫。

這不十分對的。比較對些是要說，連工人的兒女也還不是大家都有進高等學校的可能，而使得他們大家都能够學習，這是必要的。這個必要的理由，是在於有一種危險：別些階級的兒女，進過了高等學校，會用「智識份子」的資格來加入實際生活，然後，照着祖父和父親的榜樣，來幹那種調和「不可調和」的「好事業。」又來解決「社會道德」的問題，總之是去「幻想起來。」想一想如果人都「是聰明的，良善的，」那是多麼好呵。這還算是好的，而也許可以壞得多呢。寫信給我的人應當懂得，他們是生活在戰爭時期，在戰場上，在戰鬥的時候，來要求「仁慈」是偽善的，蠢笨的。

等到世界上一個奴隸也不剩，一個被打敗的人也沒有的時候，人大概就會理想地好的了；然而爲着要沒有被打敗的人和奴隸起見——就必須毫無顧惜的鬭爭，反對那些慣於靠奴隸勞動生活的人。

說人應當良善，溫和——這樣勸告了兩千多年了。人道主義的宣傳早就暴露了自己的完完全全的無力。十九世紀末期，文化的歐洲的基督教徒，極端佩服的歡迎了弗里德里赫·尼采，他倒是真誠的憎惡一切種種的人道主義，認爲這是指揮階級衰弱的表現。

「溫和的人是有幸福的，因爲他們把遺產留給土地。」——福音經上這樣說。馬克·士溫認爲這是說的英國資本家，他們的確在全世界各國裏面都血腥的，沉重的「留下了遺產」。不行。還是不要說起人道主義好些，有着現存的資本主義，牠正在十分關心的準備着全世界的大屠殺呢。而且「戰爭產生着英雄」，而「英雄裝飾着人類。」是的，1914—18年的戰爭產生了真正的戰爭英雄，各國的投機家——「大傢伙」，「暴發戶」，「鉅人」，「鯊魚」——那麼神奇古怪的裝飾了人類。這些人，從工農的血汗裏吸取了鉅大的財富，很安心的繼續管理着工人羣衆的力量和意志，爲着更加鞏固自己的政權起見，組織着法西斯主義，「陳舊的，中世紀式的，對於勞動者的壓迫方式；而工人階級

『人道地』忍受着這一切，冒着暫時回到血腥的中世紀式的黑暗裏去的危險。

如果寫信給我的人，以及一般蘇維埃公民，忽然一天早晨醒過來，深信工人階級的事業的確是『我們這世紀的偉大事業』，如果他們能夠客觀的估量蘇聯工人的意志所已經建設的，以及正在建設的一切，——那末，這些公民會覺得自己是更健康的人。一定的，這可以給他們一種力量去工作，『不是爲着恐懼，而是爲着良心。』

然而見解的形成不是在夢裏，而是在嚴厲的清醒之中。這個清醒將要逐漸好意的對待那些人，這種人本來除開自己之外，在生活裏是什麼也不看見，什麼也不覺得的，他們不會觀察，不願意學習，完全不知道過去，不能夠了解現在的極高貴的價值，不覺得工人創造的根本意義，工人們的最理智，最健全的精神——弄到臨了——正是向着人的完全解放而努力的。

卡爾·馬克斯把一切『真理』歸納到一個具體的真實，這是工人階級——新的歷史力量——所應當來實現的。卡爾·馬克斯說：

『對於人，最高的存在就是人自己，因此：使得人成爲屈服的，奴隸化的，被侮辱的一切關係，一切條件都必須消滅。』

論真實的教育

一九三三年六月，蘇聯的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完成。這是一個極大的工程：從沃訥慈湖起，到白海邊為止，總共有二百二十七公里，沿路建築了許多鉅大的水利工程：十九座「水閘」；十五座隄岸；十二處「落水坡」；四十九處「水壩」；三十三條小運河。白波運河的完成使蘇聯北部的物產：森林、漁業、礦產等等，立刻可以開發，立刻可以從北部轉運到列寧城區域。而這一個工程是很艱難的，中間大都是高山。岩石，要打山洞，要築水門汀的隄岸，要發明好些水利工程上的新方法；所有這些工程在二十個月之間完全完成了。而且承辦這次工程的，是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勞動營」——就是許多刑事犯、反革命犯的勞動實習營。白波運河建築委員會能够在幾個月之內教育這些罪犯，使他們覺得爲着新生活的建設勞動是他們的唯一出路；他

們之中，有反革命的工程師，有賭徒，有流氓，而在白波運河完成的時候，他們有許多得到了紅旗勳章，列寧勳章，其中 Iskov 人完全赦罪，Osobin 人減刑，而 Osos 人取銷以前的判決。高爾基這篇論文就是爲着這件事做的譯者誌。

現在，我們先引一篇『職業流氓』加洛茨京的文章，作爲參攷：

幸而沒有逃走

『人家給我說，要我到卡列里亞去開什麼運河，我立刻就決定了——逃走！』

逃走是我的專門學問。我是時常從勞動營，預審處，監獄裏逃走的。逃出來了，把真姓名隱藏起來，搶掠一陣，再被捕吧。於是乎再逃走，又換一次新的姓名。這是做慣了的事情！

因此，很高興的走吧。你們送我去吧，我想，我可反正一樣是要逃走的！

走到了。看了看。從這里逃走倒不是容易的。路遠得很！

我決定等幾天再逃。而做工，自然沒有想做。我來搬灰桶沒有這麼回事！

立刻就把我「放到」EDB（嚴密管理連）裏去了。唔，EDB就EDB，我反正是一樣！甚至於更好些：這里各人喫各人的……

有一次，我們的教育主任魏託施北京到EDB裏來了。他一來說說開了，勸我們組織一個「集體」自己申明願意做突擊隊。自然，大家立刻就笑了他，罵了他。罵得來，沒有什麼再厲害的話了！要是別人，也許立刻就逃走了，他可不走，儘在說着：

——不願意嗎？他說——不願意自己組織「集體」也好。那末，你們加入別的「集體」吧。

倒像不是一樣的！

——突擊隊員，這樣也有，那樣也有，——魏託施北京接着說——他們受着優待，加工錢，飯食也好些，還受人敬重……

我聽着，心上想：他一定在撒謊。想來誘惑我們，叫我們去做工罷了。後來，我忽然想了想，我去試試看看別的營裏是個什麼生活。並非大家都在EDB裏坐着。

我走到教育主任跟前說：

——好吧，把我的名字寫在『集體』名單裏。不過，你瞧着，你要是撒謊……

加入了集體。大家那麼問我，試我，羞我。只能夠答應他們一塊兒做工吧。

於是做起工來。給了我一套新的制服。飯食再好也沒有！我就狠狠的賺工錢了，給了我第一名的口糧。我做到了百分之二百！

自己也說不出來：在這『集體』裏我變了個什麼樣子。似乎換了個人，起勁得什麼都忘記了，儘要做，儘要開運河。那次徵求補充短工的猛進隊（在分水小運河那邊）我就自己去報了名。回來，得了個突擊隊的徽章。我完全同「過去」割斷了關係。我很驕傲了這個徽章，現在還是驕傲着，無論如何也不離開牠的了。而這徽章是要入永久做突擊隊員的！

我現在是個自由的公民。我很快活。幸而那時候沒有逃走。因為在這里，在這白海建築工程的地方，我找着了生活裏的立足點！

提前釋放的 P.A. 加洛茨基。

我們這時代資產階級的所謂『人道主義』——也就是仁愛主義文化的虛偽，完完全全，無可

爭論的，極無恥的暴露了。社會世界的一切現象，都是人的生活行動所造成的，這種生活行動的力量，也就在暴露着一些現象的，反人道的意義，那是人道主義派的花言巧語和所謂『法律』所隱蔽着的。在我們這時代，只有白癡和『拿筆桿的騙子』才會說：仁愛同私自利——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和『靈魂』——可以並存。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實際上差不多完全只表現於造醫院——這是人的機體的修理工場。大家知道的，越是寶貴的當心着材料，那末，這材料也就越發不會破毀，越發有用處。對於人，這個剝削的材料。這個勞動力，那私自自利的資產階級卻總是那麼白癡式的，絕不可惜的態度，而且反對着他們自己的規律——很不『經濟』的。醫院並沒有表示，也不會表示：統治階級關心着保護勞動民衆的健康，要想造成這樣的條件，可以預防勞動民衆的疾病，預防精力的浪費和早期的死亡。醫治破毀了的人的支出，資產階級可以用製造無數的醫藥材料，器械，丸散等等的收入來抵消，而且還可以賺一百倍的錢。疾病對於商人是發財的法門。

對於掃除文盲，消滅『民衆』的愚昧，資產階級也算是關心的，但是，牠僅只要製造些識字的奴隸和資產階級統治的擁護者。自然，牠一定會再減少『牠所耗費』的教育文化經費，如果技術上可以用鋼鐵製造奴隸，警察，各種各式的小職員。之後，牠大概還要叫自己的技術家，用洋鐵皮去製造宗

教哲學的神甫。如果在這樣的神甫裏面，放進幾張銀行家和尊敬的軍事工業家演唱的留聲片子，——那末，這比活的神甫要便宜得多：牠不會要求什麼，而且禁用。繼續發展着這種便宜的事情，還可以用橡樹或是蘇皮做些議員出來，叫他們坐在國會裏，要他們說什麼就會說什麼，而用不着喫飯。於是那些不安份的小人物，像工人和農民之類，可以大大的減少，也許——因為實在無用——簡直用一種什麼人道的辦法，把他們完全消燬。

上面所說的，聽起來似乎是一種悲慘的幻想，假使我們不知道製造鋼鐵奴隸——robot——的企圖已經開始了，而且有幾次的試驗很有成績；不久以前歐洲的報紙上說，紐約公演了鋼鐵警察的試驗，而在一個什麼地方，想出了，並且製造了一個機器僕役，用電氣做原動力的，甚至於也有點喜歡偷東西的脾氣。

一切都有可能。資產階級的世界不但虛偽，而且心理上是有病態的。牠的報紙——是謊騙，謠言，醜態的暴幕和淫虐症的故事的來源——時常敘述着超越一切悲慘幻想的事情。例如，有一家報紙這樣記載着：

『美國的瘋人的數量，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多。』

這個數目還在不斷的增加，政府方面焦慮着克服這種民族危險的關爭。

有一個著名的心理病學家計算了：如果心理病的發展照現在這種速度繼續下去，那末，過了七十五年，美國全體人民的一半都要坐在瘋人院裏，而其餘的一半應當來養活他們。這悲慘的預言即使有點兒誇大，那末，至少，最近十年來心理病增多的數目字，很明顯的指示着驚人的現狀。

在十八州裏，從 1921 年到 1931 年，心理病者增加了兩倍。

1931 年，紐約支出了 47,000,000 美金，爲着養活 73,000 瘋人；比較起 1921 年來，這是增加了 350%。

在馬薩諸賽州，稅收的五分之一是用來養活瘋子的。』

越來越多的——越來越平淡無奇的——記載着自殺的增多，尤其是德國，那邊的熟練的智識份子真正的沒有出路；自殺者之中，有大學教授，律師，審判官，戲劇家，醫生，——這些人，都是資產階級化費了很多的經費栽培出來的。從我的觀點上來看，自殺是很合理的行爲，這是個性的自我審判，他認識了自己的行動或是不行動的罪惡。在德國的人，自殺是因爲行動已經不可能的了，不行動就要

窮困，屈辱，餓死。

暴露資產階級世界的病態的事實，簡直數不清，同時，越來越明顯的表演着資產階級思想的無力，全世界商人的智識能力的窮乏。資產階級的生活——是一條無意義的罪惡的鏈條；最大的罪惡。在前一世紀的三十年，四十八年，七十一，年，做過了；而在這一世紀，商人們也已經做了一些『事業』，正在籌備着的全世界大屠殺，應當使得 1914—18 年的屠殺黯然無色。

從波羅的海岸到太平洋，從北冰洋到後高加索和帕米爾山麓，卻在幹着偉大的，絕妙的，全世界所需要的事業，這就是用集體勞動的真實來教育人。我再請讀者注意白海——波羅的海運河的建設，這又是一件事實，極明顯的證明着我們的教育制度的成功。蘇聯的敵人說，社會罪犯的勞動是強迫的。這自然完全是說謊，這是階級仇恨的盲目的謊騙，這些人必須這樣或是那樣的糟蹋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這個國家使得他們恐懼。再則，這就是資本主義奴才的冷血的造謠誣蔑，爲着一塊麵包，他們就來造謠，胡說。這些奴才很知道：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被判決的，監獄裏的囚犯都必須要做強迫的勞動，而且也是那麼不人道的——像十月之前沙皇的俄國所執行的苦役一樣，引起着資

產階級人道主義者的廉價的習慣的，偽善的憤慨。這些奴才並不愚蠢到這種地步，以致於不懂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對待「罪犯」的態度根本不同。資產階級認為自己所製造出來的破壞法律者，都是無可救藥的，牠堅決的永久的把罪犯從自己的社會裏趕出去，而有些，像在美國，簡直因此專門化起來。資產階級的懲罰就是復仇。

對於無產階級的審判廳，罪犯是資產階級的產物，而且，大多數的工人階級的仇敵，是因為他們愚蠢，誤解。無產階級的獨裁者，只在這些敵人的階級本能表現得特別惡劣和反人道，只在他們的確是「人樣的禽獸」的時候，才消滅極少數無可救藥的；而同時，無產階級獨裁者，很有成效的重新教育着許多社會危險份子，改造他們的性格，表現着好些對於社會有價值的才能。在這十五年來，我們「政治保衛局」的移殖地和公社裏，教育出來了幾千高等的熟練工人，大概，農學專家，醫生，工程師，技術家就不止一百，這都是以前的流浪兒童和「法律破壞者」。在資產階級的國家裏，這種事實是不可能的，恰好相反，那裏爲着小小的——比較起大資產階級的行動來，這的確是小小的——犯法，而使得像著名的文學家○亨利那樣有才能的人，也埋沒在監獄裏。很可能的，如果沙皇政府不殺掉革命家尼古拉·啓巴爾赤支，那也許俄國比歐洲早發明飛機二十年呢。

在白波運河的建設裏，好幾萬各種各樣的社會危險份子，敵視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人，參加了工作。這許多人之中，大半是盜賊，『富農』——生了根的私有主義者，農民羣衆的剝削者。這里，值得提起一下：所謂富農，就是那些『喫公社者』，辣朱華耶夫們，郭魯帕耶夫們，以前的自由主義，平民主義，民權主義的出版界和文學界，那麼鮮明的，那麼能幹的，帶着那樣的『公民的憤慨』描寫了的。而現在，『前任的』民權主義者，僑居在國外，卻儘在吵鬧着，叫喊着——像失掉了主人的狗似的——哀悼着這些富農和『喫公社者』的命運，這就是他們向革列伯·烏斯彭斯基，薩勒特柯夫——史赤德林，以及其他極忠實的人生教師，學習着憎惡，而沒有學會的。國外的一切種種『喫公社者』，一塊兒來參加對於工農羣衆的剝削。沒有能夠，也永久不會能夠的了，因為富農還會變成工作人員，而他們，這些僑民，很快就要死盡死絕了。

在白波運河的建設裏，怎樣發展了重新教育社會危險份子的過程，怎樣使他們變成對於社會有益的份子，用了怎樣的方法對着這些各種各色的法律破壞者，害蟲，敵人的隊伍說了：必須開闢一條運河，聯絡白海和波羅的海。

你們應當造成二百二十七公里的一條水路，你們要在森林裏，池沼裏去做工，要轟炸岩石，改變過於峻急的河流，用『水閘』的方法，把水升高到一百零三公尺。要做泥土工程，要掘起二千萬立方公尺的泥土，要撥掉一千萬立方公尺的土地。我們需要在最短期間做完這個工作。你們可以得到很好的飲食，很好的衣服，鞋襪，住宅，你們將要有俱樂部 and 電影場，此外，政府暫時不能夠答應你們什麼了。你們的工作，可以證明你們應當得着什麼。

這些將來的戰勝自然界，組織自然界力量的戰士的隊伍是很複雜的自然，他們的情緒也是很不一致的。在『政治保衛局』的勞動改正營裏，教授着文字和政治常識。人總是聰明的，蠢笨極難得是天生的『才能』。這時常是資產階級的階級強暴的結果。這幾萬人之中，找着了不少懂得要他們去做的工作的偉大的國家意義。體力上健康的人，慣於克服抵抗的，想要『表現一下自己』了。卡列里亞的瘋狂的河流和池沼，田地和森林，都堆滿了石塊，這都是流冰的『自發的工作』——這里，有的是鬪爭的對象。有些人，也就模糊的猜到了人同人鬪爭的無意識，這是資產階級式的日常生活條件硬套在頭上來的一種鬪爭；他們猜到了替資本主義做工的無意識，這總是在製造窮困的。這個隊伍裏，有判決了十年監禁的『害蟲』。其中有一個，年紀已經有六十歲了，當審問他的時候，他說：『如

果外國的干涉者來了，我立刻就要幫助他們。」在過去，他做過許多困難的技術工作，得到了偉大的聲名和財產。他自己說：「我的生活好極了，就只沒有喝過鳥奶。」他被判決了十年，在營裏坐了兩年，而 1933 年春天他在自己的自傳裏寫了：「在卡列里亞的森林裏，在技術人員的棚舍裏，我懂得了真正的工作是什麼……技術家是什麼，如果他後面有着工人羣衆，堅決的，充滿着精力的，知道自己努力的目的……」

「我雖然老了，可是，還是不會發許多哲學議論，在野營裏，用勞動來重新教育——這是非常之健全的，非常之美麗的思想。至於這思想的實際應用，那不用我來說，請我們這邊的兩千突擊隊員來說吧，他們都很早的提前釋放了。」

像他這樣的工程師還有好幾個，他們在工作之中表現了「極端的自我犧牲精神和精力」，其中有一個，隊長對他的批語是：「在工作之中積極的勤懇和堅決。社會工作方面也盡量的表現了自己。雖然是殘廢的（少一隻腳），卻到處去巡視，到處用政治上尖銳的有意義的演說和自己的工作的榜樣，提高當地野營裏的工作人員的熱忱和建議，使得他們超過原定的生產計畫，訓練着新的幹部。」

自然，這些勞動英雄都提前釋放了。然而在這之前，他們差不多有五百天儘在一堆幾萬個「社會危險份子」之中鑽來鑽去，而且那些人都知道這些工程師是「反字號裏的」。可是，雖然是些「反字號裏的」，工作卻非常認真。這種事實不會不引起那些人的奇怪，即使那些是很遲鈍的人，而奇怪就要引起「爲什麼這樣」的疑問。對於這個問題，那些用自己的行動引起這種疑問的人答覆了，而在這里工作的，總共不過幾十個「可怕的赤克斯蒂」（註一）也答覆了。

富農怎麼工作的呢？例如波德林的第一區裏有一隊，三十二個富農。在五月下旬，他們的工作超過了一切紀錄——做到了生產計畫的百分之250，他們的工作是搬運軟土。甚至於在換班的來了之後，這一隊還是不肯放手。弄得這區的區長要下令調開他們。

「第一號命令的責任隊」大半是富農。他們在第六區裏做着岩石地面的工作。他們執行了一百分之120—150的計畫。爲了生產工作的高度紀錄，他們得着了獎賞，上了「紅版」。

這樣的生產隊有幾十隊。這同自然界的自發力量鬪爭的集體勞動，在野營的工作之中，怎樣影響了那些生根的私有主義者呢？富農向來自以爲是鄉村之中的最好的人物，是鄉下人之中的「貴

註一 『赤克斯蒂』——Tchokster，「非常委員」的意思，以前蘇聯的「政治保衛局」的名稱叫做「非常委員會」。

族，「他不但會剝削別人的勞動，而且自己也是田地裏的很好的工作人員。他這個掠奪者，自己覺得比他所掠奪的人要聰明些，勇敢些。他慣於輕視那些流氓，懶鬼，他向來以爲：如果你窮，那末，可見你笨，你不好。而這裏，他這樣自尊自貴的驕傲的人，卻看見那些流氓，懶鬼，小偷以及一切種種亂七八糟的，無政府主義化的老百姓，居然會工作得比他還好。在他的眼前，以前的流氓，流浪人，法律破壞者——他這個私有主義者的憎惡所極端痛恨的人，居然成了熟練工人，隊長，勞動的組織員，而且有些已經在領導着他的工作。——這主要的是因爲他們比他這位『老板』鄉下的土皇帝，更好的了解了勞動的技術。這不會不打擊着富農的『心靈』，這引起了他的好勝心，而使得他同他所輕視的，他所痛恨的人競賽起來。

這些人之中有好幾百拒絕工作，申明：『無論你們拿我們怎樣吧，我們反正是不工作的了！』他們從早到晚在棚舍裏的床上翻來倒去，弄得齷齪得不堪，甚至於掃一掃地也不肯。亂唱些歌曲，用自已杜做的紙牌賭錢，互相的打架。有時候，他們煩悶得發瘋起來，就拆壞床坑，打碎玻璃。這樣的『暴動』之後，『可怕的赤克斯蒂』之中的什麼人自然要跑到他們那裏去。同志們警告他：『瞧着，小心些，他們會打死你的。』『不要緊』——他說，就爬進了這些兩腳黃蜂和牛虻的窠裏去了。他們迎着他辱

罵，吹口哨，向他叫喊著：『不用來勸告，我們不做工！』

於是開始所謂『強迫』——關於這『強迫』，整個資產階級，一切商人，為首的是基督的羅馬天主教會的爵士和王公，宣傳著『愛人』，為着要從人身上得到些『義捐』的，——他們都那麼兇狠的，那麼欺誑的，大聲疾呼的叫喊着。而事實上，對於這些被階級社會所無政府化的人的『強迫』，不過是極簡單的使得他們認識一下真實——這是可怕的真實，他們這些人都是這個真實的犧牲。

——怎麼樣，孩子們，你們不肯做工呀？『反字號的』也在做工，那些比你們壞，比你們更有害的人，也在做工，而你們一定要喫白食，喫工人和農民，蘇維埃國家的主人的麵包，你們願意像老鼠，黃鼠狼似的做寄生蟲嗎？你們都很年輕，你們的生活遠大得很，用點心想想吧：為什麼你們挑選了這條破壞法律，犯罪的道路？

他們之中，很少人想過『為什麼』的問題。這里，強迫他們研究這個問題了。這問題很感動了一些人；同這樣的人單獨的談話，教育他們，使他們變成『真實』的宣傳者，鼓動忠實的勞動。過不了多久，那些不怕最高的刑罰——死刑——的人，卻害怕自己的名字寫上『黑板』了。害怕『新治報』上把他描寫成一隻『水淋鷄』了。（註二）

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的輿論，用着這種「強迫」方法，很到了怎樣的結果呢？不管是誰寫的小的一兩篇文章，決不能夠完全的報告白，波運河建築裏所做到的成績。這要寫一本書才行，現在這書已經在着手編輯。而我這篇文章的結論是：教育出來了大批的熟練工人的隊伍，懂得水利工程技術的；這隊伍可以去做莫斯科——沃爾加運河，BAM，喀默森堤壩的工作，以及我們國家所需要的其他的鉅大工程。

從「罪犯世界」裏，吸引了造成了幾百個有才能的人，例如以前的一個女賊，現在成了很有才幹的彫刻家。

幾萬個以前的法律破壞者恢復了公民權，或是縮短了懲罰期間。
這充分美麗的，懇切的證明着：用真實來教育是多麼有益處，可以給多麼好的結果。

註二——蘇聯每一個工廠，或是建築委員會，都有自己的小報，這「新報」就是白波運河建築委員會的機關報；這種小報上時常登載工作的成就，批評管理委員會和工作人員的缺點，討論工作改良的方法，再則，每一個工廠都有「紅板」和「黑板」，工作好的寫上「紅板」，壞的就寫上「黑板」。

論文藝及其他

曾經有一件講到關於一個小孩的有趣味而且真實的故事。他坐在路傍一隻箱子頂上叫喊着。一個過路者問他道：

「你爲什麼叫喊的？你可是失掉了你的媽媽和爸爸嗎？」

「不。」

「那麼有什麼事苦惱了你嗎？」

「也沒有。」

「你可是餓了嗎？」

「也不是。」

「渴了嗎？」

「更不是。」

「那麼你究竟要什麼呢？」

「我，就只要叫喊吧了。」

在我參加着一次作家和批評家共同舉行的喧雜的大會的時候，這孩子突然重現在我的腦里來了。我雖然細心地傾聽着他們的話，可終究不能了解他們所討論的是些什麼。

興奮的情緒更使一些演說家提出了許多最奇特的意見來。

「普洛層級既然在社會創造方面跑在我們這些創作家的前面了，那麼我們就沒事可做了，而這樣的文學也就成爲不中用的東西了。」

這些話也許含有諷刺的意味的吧，或許是『出於興奮和憤激』的吧；因此，如果他們之所以興奮的理由是不值一究的話，那就根本用不着再提它們了。

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究竟爲什麼那樣地叫喊？他們所需要的是究竟些什麼呢？現在，誰也不能像煞有介事地哭喪着臉說，文學還是落後於現實了。文學是時常緊跟在生活的覺醒之中，它時常

「記錄着事實」把事實概括化，綜合化。從來就沒有人要求作家去做一個預言家而預言將來的！

尤其在現在，更已經提出了使藝術和現實更密切聯繫的問題，和文學滲入時代精神——這精神的本質就是社會革命——的問題了。

會場上有一個青年作家，很適當地講到了由勞働層級的意志和心理所創造的新的現實的這一種美和力。還有一個人，雖然遭受了嚴酷而並不公正的批評的委曲，竟也坦然地說一個作家是不應當對批評抱着恐懼心的；並且說，任何人如果承認他自己作品的歷史價值，一旦受到批評時，即使那評語是嚴酷到怎樣的程度，也總不該無端地生氣。

然而這兩篇演說，卻都沒有受得他們所應得的人們的注意。它們並沒有感動了聽衆，這人說是因為它太悲憤了，那人又說是因為它太性急了。實際上，這兩個演說家都已觸及了作家們正達到了應該忠實地善意地加以討論的問題。可是，恰恰相反的，相繼而來的好幾種演說，都只顯然地發放了許多作家們的個人的職業上的敵意和舉不足道的動機。

我曾經在三四十年前聽過這一類的詞句上的爭論，那時「文化支持者」(Kulturnaegor)

——後來他們變成爲「卡代特」(Kadeta)——即立憲民主派的縮寫，俄國大革命前的一個布爾喬

亞自由政黨——譯者）而現在差不多已變成『黑百人團』——和民粹派（Narodniks）的殘餘份子爭辯，同時，民粹派又和青年卡爾主義者鬧架。

我以為當時的『討論』廣泛地注入了感情和火氣，或許是由於太偏於個人的，因為年青的和年老的兩代正在互關時期。年老的一代堅決地相信着真確的『個人任務』——以為創造歷史是知識層級的職業的任務——而在另一方面，卡爾主義者則反抗着後者作為『人民運命的裁判者』似的行動權利，並且主張堅決地相信普洛政權——由歷史所創造，所養育出來，以消滅資本主義的陳腐的，罪惡的，和俗流的世界，而建立起勞動大眾的一種自由的國際的弟兄一般的情誼。

那些被斥為一切都已經完了的人們所呈現的憤激，暴怒，和歇斯迭里是十分自然的——正如今日那些即使屈膝跪求也是不會獲得回國准許的白俄僑民的憤怒和哀號一樣地自然的。

現在，人類種族已經體驗了的最重要的革命——無可避免地會獲得全世界的地盤的一種勝利的革命——所創造的，接續到戰鬥前線的人們，正在把這主張實踐着。一種對付舊世界的抗鬧，已經開始了——反抗整個的舊世界和它的制度。這次反抗的領袖，就是武裝着一種結晶化的，科學觀念的普洛列塔里亞的有力前衛。這次反抗，是由那與時俱進的數量愈多的，力量愈強的一個層級所

領導着。

我們必須記着，十月革命之前，一個革命者的訓練，是在十七歲到二十歲之間的年齡剛才開始，而現在呢，它已經在兒童團員和『十月兒童』（October's）的年齡之間就開始了。（凡已達學齡的兒童的共產黨的團體叫做兒童團。未達學齡的兒童，叫做『十月兒童』——譯者。）這一件無可爭辯的事實，保證着蘇聯的兒童已經走上一條沒有退路的坦途。後退的路就是滅亡的路。路是關閉了。

資本主義的世界會把我們捲入戰爭的漩渦；它也會暫時地阻礙我們新社會的建設工作。然而資本主義決沒有能力去把歷史過程開一個倒車，這是資本主義自身所舖設了的，在它本質上就無可逃避的歷史過程。資本主義連組織一個整個集團所必要的力量和觀念也沒有。這一個集團早已是由於勞動層級的精力和自然的寶藏的不容情的，無限制的，不負責任的長期榨取而分化得不可調和了。

普洛層級具有組織上的和文化上的力量十分鮮明的一種觀念，這已無展開討論的必要。我們只須記牢這一件事實：就是說，這個觀念概括着整個的歷史意義，而歷史也必然地把這個觀念銘刻

在全世界的勞働者們的心上。

有人或許以為在這些條件之下，一個作家要十分清楚地認識他的工作的意義和他應取的工作方向。

我覺得某些作家的哀號，並不是特殊地對付某一個人，而是在對付歷史，因為歷史奪掉了他們想在世界的鬭爭之外找一個中心地帶的可能性；這些作家便以為他是在文藝的或政治的批評界里被人攻擊了。其實他是錯誤了；因為如果他們當真被攻擊的話，那麼攻擊他的，是歷史，特別是古代的歷史。他拗執地抗議着指導個人的創造力的革命權。他有時當整個勞働層級創造着奇蹟的時候，也抗議；當普洛青年完成鉅大工程的時候，也抗議；當着幾千年來一向生活在具有他自己的土地小計劃的希望中的蒼老的個人主義者農民明白着不做奴隸而做一個熟練工人或一個耕田藝術家時候，也抗議。

這樣的一個作家，總以為文藝是他個人的事情。有時，還有些無知者們加強他們這種思想。最近有一個傻瓜會對一個作家說：『寫作是你個人的事，跟我是不生關係的。』這是有害的廢話。

文藝決不是司湯達爾 (Stendhal) 或託爾斯泰那樣的人的個人事情；它往往植根於一個時

代，一個國家和一個層級。我們自有古希臘、古羅馬的文藝，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期的文藝，伊利沙白時期的文藝，頹廢派或象徵派的文藝，但從來沒有人說愛斯吉勒士的文藝，沙士比亞的文藝，但丁的文藝等等，雖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俄國，作家的類型的可驚的多樣，我們還是說文藝是一種反映整個時代的戲劇，悲喜劇和小說，而不說某一個特定作家如普式庚、果戈理或列士訶夫或契訶夫的文藝的。

現在，我們可以比從前更高興地說：目前風行的蘇聯文學已是一種集體的工作。從來沒有一個作家像現在蘇聯作家那樣對於讀者的興味那樣濃厚而又那樣接近大眾，更從來沒有一個作家被文藝的大眾那樣崇高的欣賞過。這一種欣賞是最自然不過的，因為大眾看見自己怎樣去創造這個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自己又怎樣地被反映着。

當然，寫「舊俄」比較容易得多，不但是因為它已經遼遠，因而容易用文字和意象去描寫它，卻也因為它對於一部分作家的心靈特別的接近和親熱，尤其是那輩對於過去抱着很渺茫的見解，而祇是錯誤的，以為過去的生命是比現在更太平而快活的一些人。

我們要注意我們最偉大的作家是應當熱心地學習和研究。我們這些拿筆桿子的藝術家，現在

已到了決定一個最基本而最簡單的問題的時候。

在奉侍「藝術」以外，是否還可以忠實地奉侍革命呢？當垂死的層級有力地掙扎，非人地無意識要保留它所習慣着的主要地位，同時當另一層級，正努力進行着工作以奪取前者的地位，和創造力雖未被試練而能帶來人類的普遍再生的一種力量一起生長着，工作着的時候，我們能否在層級鬭爭中採取中立的態度呢？

也許有人要問：那麼我們真是爲了這時代的革命要求而犧牲自己嗎？提出這種問題來，是很可笑的；但是我還是回答說：「是的。」我們必須重新教育自己，使奉侍社會革命成爲每個誠實人所負的工作，並且把它作爲個人樂趣的來源。因爲「鬭爭的快樂是很大的」

一個人不應當輕易的爲一己而犧牲，更不應當做得使一般的人都相信有天才的人是祇能爲舊世界的惡勢力而犧牲的。

我必須再指出一些事實，它們在某程度之下擾亂，恐嚇，更時常侵犯作家，因而使他們拒絕現實，便他們站在屋頂高處狂喊一陣。

在從前的市集中，最普通的一種娛樂是試驗氣力，叫做「攻打土爾其人頭。」把從樹幹上鋸下

來的木頭塗上了很粗的油漆，裝在一個連住一隻鐵盤的彈簧上。誰要試試他的臂力的，就可以拿起一根木鎚去打那個木人頭上。這一擊既把木人頭打了下去，碰到了彈簧，他的臂力就記錄在一隻計算表上了。這一種遊戲，最重要的是握木鎚的手法，所以得勝的人不一定氣力最大的人，倒是那些握慣木鎚的鐵匠，泥水匠之類。

批評家對於創作家的態度，時常像一個運動家對於這種木人頭一樣。我當然不必再去說批評家是怎樣的用了可憐的模樣，在創作家的頭上試驗他們氣力的話；因為我也不願給敵人什麼機會去譏笑我們批評家的大意，缺乏知識，以及他們的愚蠢。我們的批評家也許在意識上確是很完備的，但是要用簡單明朗的話把辯證法的唯物論利用到藝術的問題上去，就有東西把它們阻礙了。他們引用着卡爾·恩格斯、普列哈諾夫和伊里奇的話，但是他們把這些話埋葬在囉嗦的泥沼里，把引來的話的真意義反使掩掉了。關於文藝和關於作家所應該說的話，倒沒有清楚地說出來；並且時常有抱同一種意識的批評家對於一個作家提出絕對不同的要求的。本來，批評家間的矛盾，是很平常的事，所可悲的，是因為批評家對於最重要的一個問題——觀察人生現象的方法的立場不同，所以這種矛盾反使繼續增長。現在的批評家是時常不去教育作家，而祇在攻擊作家，不說組織經驗的方法，而

祇講作者的政治色彩了。

但是假如非把作家的經驗系統地組織起來，如非使他的情感和他的知慧互相調和，政治主張對於這種青年作家只像是一種硬裝上去的東西，他可以把它很機械地丟開，它們就高聳在空中的。朵勃洛盧博夫 (Dobrolubov)，契爾尼綏夫斯基 (Chernyshevsky) 和普列哈諾夫 都是教育作家的。但是我們的批評家的方法和語調，卻只能使我們疑惑他們這種引經據典的手段，究有多少使人信服的能力呵。

個人主義的傾向和集團的利益在批評家之間發展得和作家之間同樣地迅速，這種利益問題反掩蓋了文藝的重大問題：就是文學在革命的文化工作中，倒是最肥沃的一塊土地。也許就爲了它的高超，所以有許多不幸的事情倒發生在我們中間了。

內鬨和分裂，佔據去了批評家們許多的時間和精力，所以當一個真的異端人出現在他們中間，他們有好久時光偵察不出來，直到他走到了極端。才大聲疾呼地把他清除出去。他的徒弟們便當衆的懺悔他們參與了這種異端，而那個可憐的異端者呢，被人家打得青一塊黑一塊的就腫脹成爲「一個理想的殉教者」了。

本來對於我們的批評家，製造殉教者是他們應當做的事情。可惜到現在已經有了多少異端者的懺悔！常常一個異端者並沒有什麼「理想」，就爲了唯一的慾望要去取悅於那個有權力者，所以就生活下去了。

有一件事情是這樣的：有某一個教授，作家兼批評家的，把很平凡的作家捧得和偉大的作家一樣高。雖然對於聽他演講的青年是很有害處的，嚴肅的批評家卻一點也沒有注意到他的行動。現在他自己「在最後幾個月裏，才承認他的幾個錯誤了。」所可惜的是他並沒有看到他所有的錯誤。一句俄國的俗話說得好：「話說了就收不回來的。」這個教授所犯的錯誤還要遺留下繼續戕害青年的。像這一件事情，我們的批評家就沒有替我們青年作家保護周到。

批評家們的讀書，是走馬看花的，他們好像祇找機會去和作家爲難，去打倒他。這就是我所謂對於別人作品所持的一種偏狹歪曲的態度。我絕對的相信這種態度祇能產生仇恨，挑撥作家，像是把黃沙放進機器去一樣。

關於文學在文化上和教育工作上的重要性，它作爲歷史的伴路者的任務，它對於近代生活的批評的態度，在我們批評家手里是很輕視的。雖然我們時常說到寫到關於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戲劇的

層級內容說得也很多，寫得也很多，但是我們並沒有說過關於技巧上的方法：這種方法假如我們要介紹我們偉大的現實之中的一部分東西到現代文學里去，倒是必得用到的。

此外，在我上面所講過的那個大會里，有一個演說的人很公平的說我們的畫家祇是像攝作品的描摹現實而已，這種風格是牽強而沒有生命的。有許多人便說：『這句話是不對的。』其實這句話說得很對。除了特出的幾種之外，我們繪畫上和文學上的作品祇不過暫時成功的試驗品而已。雖然我們中間有不可否認的天才，可是他們還有能力可以把我們現實中最特出的東西作一種綜合的表現；我們的現實的創造者和英雄，便是在發揮創造力的每個纖維質的集體工人。

我們的現實是紀念碑性的，值得畫大幅的畫，用意像把它概括起來的，我們的批評家應當質問自己能否幫助作家，作家能否利用他所專長的技巧和方法去創造這種概括的和綜合的東西。並且要問我們是否適宜於找尋一種聯合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第三種東西，使我們可以把這英雄性的時代，表現在更觸目的色彩，更高超而動人的音調中去呢？

一切所依存的這種勞動，時常是打開人生的祕密的鑰匙；而在今日的蘇聯，它已經不僅使新生活符合於神的挑戰者赫克里斯（Heracles）和普羅梅安斯（Prometheus）的英勇業績的古代

傳說，並且甚至比它更優勝。勞働就是我們的現實之真實的英雄！即使在勞働層級的『宗教』創造中——這時是帶有一種純粹地藝術的性質的——也保留着勞働的明晰的烙印。勞働者的神們，只是理想化的勞働者：伏爾康（Vulcan）和妥爾（Thor）就是鐵匠；海培（Hebe）就是一個優秀的廚子；狄亞娜（Diana）就是一個成功的獵女；華娜莫伊寧（Wanamoinen）就是一個音樂家等等。

我們必須承認而且記着：勞働大眾的創造藝術並不會消失。它並不會在那發明了一個神祕的上帝以證明他自身存在是合理的萬能個人之下的幾世紀來的奴隸勞働所毀滅。我們必須認識：勞働大眾創造文藝的能力是正在而且必須保衛它自己，因為革命已經不僅在社會上和物質上而且在情感上和智能上解放了人類。

舉例來說吧，我們就看到了列寧格勒的式樣古舊而且設備簡陋的伊池霍爾斯克製造廠（Leningrad Works）所雇用的勞働者，已經由他們的空空的手建造起一架鍊鐵爐。不錯，那是在外國的管理之下造成的，可是我們必定不能忘掉，創立新的事物的心欲是從勞働層級自身的隊伍中爆射出來的。現在正是到了我們學習去站在勞働大眾的創造精力的這種表現的高處的時候，也正是到了

我們學習着去把這種精力在詩和散文裏面綜合起來的時候了。文藝一定要瞭解它的任務，是在激發更大的精力。

我們的國內，正有着成千的發明家，突擊隊，勞働者，充塞於執行者的職位上面——從勞働大眾中間跳出來的男男女女，在昨天還是文盲，落後的，怯弱的，對他們（或她們）自身的運命表示冷淡的，而且耐心地担受着他們不知管束的一種生活的重負。一大隊的非凡的個人，已經從我們的人民的骨肉之中起來了。這『五年計劃』不僅是建設了巨大的工廠，而且創造了具有驚人的精力的人民。成百的這樣的新人已經佔有着負責任的職位，和那些曾以半生的光陰學習過怎樣在『地下』監獄，流放，和地牢之中工作的勞働層級的老戰士並肩地實行鬪爭。

作家和批評家們一定不可忘記：他們正活着在這些人們的中間，而且他們之中成千的人們也已獻身於文藝，佔有着文化革命的前線的戰壕。五年內，勞働者將不必因着空手去建造一個鍊鐵爐而耗費他們的精力，而他們之中的幾百人還將轉移到把最近的過去總結在藝術形式里的工作。當他們把我們的現在的生活，目前的工作，學者式的無益的文字的論爭，集中於我們個人關係的糾紛，以及我們賴以繁榮的無限的平庸的空話研究時，他們大抵是要吃驚的。

我絕對地相信：我們的普洛大眾，我們國內的自由的新勞動者，將很快地發掘一切的藝術形態；我們將快要親見集體藝術的新形式的創造。這是我們分內的事，我們應該伸出一隻給他們以助力的手。

許多重要的複雜的問題襲上我們的作家和批評家們，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要避免那知識份子個人主義者之羣所走過的道路，就是使這喧擾之羣趨於破裂和完全破產狀態中去的道路。

作家和批評家們一定要獲取一種為勞動大眾的利益集體地工作的方法。生活的意義就是侍奉革命。在我們的時代，它不能有什麼別的意義。革命所要求的，是一切真實人以及一切感覺着而且理覺着勞動者所擔負的事業的偉大性的人們的弟兄般的結合。我們是被信任着，可是我們還不會使這信任心完全地實現起來。我們的工作，跟那浸潤着一種英勇的異常的忠誠和燃燒似的熱情的大眾的工作一比，顯然是可憐得很，對於這，我們，同志們，作家們，批評家們，為着某些原故，都還感染得太少了。

論人道主義

「民權主義作家國際聯合會」的總書記里希安·克訥先生，請我參加他們這聯合會的文藝機關報的工作。這聯合會的目的——是「民權主義作家的接近」——它的主席團里有羅曼·羅蘭和辛克萊，這是我所很敬重的人。然而同時，在主席團里還有大學教授亞爾貝·安斯坦，而在委員會里，有亨利·曼。這兩個人，不久以前同其他許多人道主義者一同簽名在德國「人權保障同盟」的抗議書上，反對蘇聯把組織飢荒的四十八個罪犯處決死刑。

我完全相信，在所謂「人權」之中，並沒有犯罪的權利，尤其不會有反對勞動民衆的犯罪的權利。那四十八個人的行爲的難以形容的兇惡，我是很知道的；我知道他們所做的事情，比芝加哥的和辛克萊的「屠場」所描寫的屠宰公司老闆，還要罪惡，還要惡劣。飢荒的組織者，他們鑿刻了反對勞

動民衆的卑劣的陰謀，激起了勞動民衆的正當的憤怒，因為工人的一致要求，而被處決了死刑。我認爲這個死刑是完全合法的。這是民衆的判決，民衆生活在艱苦的條件之中，工作着，犧牲着，不顧惜自己的力量，勇敢的，有成效的努力創造着勞動的國家，脫離那些野獸和寄生蟲而自由的國家，並且也脫離那種用自己的人道主義去掩蔽野獸主義和寄生蟲主義的人。

很明顯的，我對於這四十八個人的死刑的估量，是和『人權保障同盟』的估量絕對不同的。因爲A. 安斯坦和H. 曼，同『人權保障同盟』是同意的，所以，很自然的，我同他們之間的任何接近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拒絕參加『民權主義作家國際聯合會』的機關報。

過去的三年之中，一些民權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的機關報，還請過我好幾次。我都沒有答復，——現在我來改正一下我的無禮罷。我的答復是給羅曼·羅蘭，辛克萊，伯訥，蕭·韋爾斯的，他們的姓名在里希安·克訥的信裏面提起過，而他們的意見對於我是並非不關緊要的；我想，我正應當對他們解釋我對於選定了人道主義做自己的職業的智識份子的態度。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之後，歐洲的人道主義者先生們，被彼得堡街道上的屠殺工人羣衆所激怒了，給尼古拉·羅曼諾夫上了『血腥的』尊號，其實他在這件罪惡以前早就很配得上這個尊號

的了。然而他們並沒有向法國的銀行家抗議，當時法國的銀行家供給了血腥的俄皇許多金錢，幫助他在絞架上，在苦工刑場上，在監獄里摧殘了幾千更寶貴的俄國人。抗議的時間是很夠的，俄皇的恐怖延長了三年。一九一〇年，我同威廉·沃斯特瓦爾德，李却爾德·德美爾，沃朗·愛登和辛克萊，參加了一個國際的智識份子的團體，這團體的目的也是歐洲人道主義者的「接近」。而一九一四年，威廉·沃斯特瓦爾德和李却爾德·德美爾卻也是第一批簽名在反對英國的血腥的宣言上的人。就在那一年，極大部份的俄國作家學者——也是人道主義者呵！——做了一篇叫喊得很惡劣的東西，公布了，這是反對德國人的，但是不反對戰爭的本身。這就是那些智識份子，他們現在坐在巴黎和柏林，無才的，蠢笨的，在造謠——誣蔑蘇聯的工農國家。用醜態的謊騙毒害歐洲人道主義者的腦筋，宣傳武裝干涉蘇聯，就是暗示着新的世界戰爭的必要。在這次，他們這些熱烈的抗議過「德國的野蠻」的人，倒很願意看見德國的，以及其他一切的「野蠻」來到曾經是他們的祖國的國家里，來反對他們曾經認為是自己的「同胞」的民衆。

我認為必須說明，我向來沒有簽名過什麼抗議書，去反對德國的，或是其他的戰爭的野蠻。我知道，戰爭是整個的野蠻行為，在戰爭的時候，互相沒有得罪的人要互相殘殺着，被別人強迫的放在必

須自衛的狀態之中。我知道，戰爭是資本家所組織的，目的是在於鞏固那種秩序，使得『和平』時期的每天的『野蠻行爲』成爲普通的現象，而且還在於他們自己要發財，卻並不是爲着民族的利益；民族——這只是勞動民衆，他們的經濟利益是國際性的；我知道，資本主義是各國民衆的傳染病。我否認那種秩序有存在的權利，那所謂秩序，使得資本家之間的戰爭成爲不可避免的必然，而這些戰爭都要用勞動民衆的力量去進行，而且是要消滅勞動民衆的人權的保障者，對於戰爭，對於這個非常之下流和無意識的事情，卻並不抗議。蘇聯的完全一般解除武裝的提案——馬克希謨·李脫維諾夫同志向國際聯盟所提出的，——人道主義者卻並沒有贊助。

一九一八年，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壓倒了德國，並且在被戰爭所毀壞了的俄國組織了強盜式的侵略，目的是要把俄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是要掠奪俄國，像他們掠奪了德國一樣。人道主義者卻沒有注意這個事實，這種事實簡直使『文化的』歐洲回到科爾特斯（註一）和皮薩洛（註二）的時

註一 科爾特斯 (Cortez) 1485-1547 —— 一個西班牙的武人，他用極殘酷的手段征服了墨西哥。

註二 皮薩洛 (Francisco Pizarro) 1476-1541 年也是一個西班牙的無智識的軍閥，極端殘忍的屠殺了印加人，後來西班牙軍隊內鬥，他自己也被殺了。

代去了。

『人權保障者』沒有聽見法國將軍弗朗塞·德·愛斯彼爾在與德薩暗示自己的兵士：『俄國人都是野蠻傢伙和混蛋，不要同他們講理，鎗斃他們好了，從老百姓起，直到最高級的代表。』

然而這種野蠻人的奇特的呼喊，俄國的人道主義者是聽見了的，他們那時候同他在一起，現在也還準備着幫助隨便那一個白癡，只要他能感受着自己資本家的命令來斫殺羸癯蘇聯的勞動民衆。

所謂人道主義者是不是很奇怪的人呢？印度，中國，非洲，巴萊斯汀的事變一點兒也沒有激怒他們，他們自己國內的事變也一點兒沒有激怒他們，對於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排外主義的動物式的本能的發展，他們是冷淡的，對於資產階級國家的陳舊的，瀰遍了血跡的建築里，差不多每天都在表演着的戲劇和悲劇，也是冷淡的。他們並不想抗議萊孟德·班加寶的卑劣行爲，這個人幾乎斷送了法國，而現在又在努力的詩詞着屠殺工農的新事實了。證明資產階級國家的健康和理智不見得高明的，正是這個事實——他們的命運竟被班加寶之類的渺小的人物管理着。

是的，現代這世界里，人道主義者的工作是多得很。可以提醒一下天主教會的首領：在二十世紀來宣傳十字軍征伐，這最好也不過是 *misanthropo* —— 就是人類憎惡家的幽默，這種宣傳和「文化的利益」沒有絲毫共同之點，而人道主義者最喜歡講「文化的利益呢。」可以問一下基督教會的神父，難道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戰爭期間，他和他領導的教會所處的立場，對於他很有趣嗎？——那時候基督教徒互相殘殺了幾十萬呢。然而，不知爲什麼，在全世界裏面，人道主義者和「人權保障者」只注意着一塊地方，這就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盟所在的地方。

最奇怪的是他們這些識字的人，居然認爲可以並且很便當的相信那種無聊的謊話，說蘇聯是由個人專政的，其實這里專政的顯然是幾千百萬工農羣衆的集中的精力，天才符拉狄米爾·列寧，他的學生和朋友的理智力量所組織的精力。這個專政的目的，是要在蘇聯的全體民衆之中教育他們的意識，使他們認識自己的權利是在於創造文化生活的新的形式和新的條件，建設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目的並不是「幻想家和野蠻人的任性」所定出來的，——像那些因爲憎惡而假裝着愚蠢和瘋癲的人所說的，——這個目的是歷史的意志所提出來的，歷史的意志無可爭論的證明着：作爲文化發展的基礎的個人主義已經枯死了，已經過完了自己的時期了。爲着發展人的意識，用

得着對於人的強暴嗎？我說是用得着的。還沒有這麼一個時候，爲着達到這個目的而不用強暴呢。文化就是理智所組織的，對於人的動物式的本能的強暴。在歐洲的學校里鞭打着小孩子，正是爲着要他們做家庭和社會的馴服的奴才——像他們的父母一樣的「文化傳統」的保護人。我很勸告歐洲的教育家，爲着私有本能的表現而鞭打小孩子，同樣要暗示小孩子有權利鞭打他們的父母——爲着積聚金錢的貪慾，而且這種積聚的方法就是他們父母自己所合法化了的掠奪。

在蘇聯的工人羣衆之中，有叛徒，賣階級的，以前的「國家主人」的偵探在行動着，——這些主人要恢復自己的統治權利——很自然的，工農政權要打自己的敵人，像打蠅子一樣。這些過去的主人，這些過去的人，卻有歐洲的資本家，歐洲的寄生蟲在贊助着他們，贊助着他們，希望能夠滿足自己的病態的，瘋狂的榨取慾望。而蘇聯的工農很有成效的建設着自己的國家，建設的條件卻是全世界資產階級方面的憎惡，這階級已經退化的了，已經用盡了自己的精力的了，沒有能力創造什麼文化，而只不過順着惰性的力量在行動罷了。

這個退化階級究竟要的是什麼？它要在別人的頭頂上再稍微坐一忽兒，再靠別人的勞動來生活一忽兒，稍微它自己也不打算長久的存在了。它的一個馴服的奴才——古斯塔夫·愛爾威，勸告

德國的資本家稱法國的「接近」在勝利報上公開的說出了自己主人的謙虛的意見。他說：

「德國最好是和莫斯科締結關係，同波蘭共同組成反對俄國在爾塞維克主義的壁壘，而參加經濟上的一切辦法，爲着保護文明的利益而抵抗共產主義的野蠻。俄國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崩壞和資本主義的恢復——這是應當記住的——對於歐美的工業可以保證有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到五十年的工作。」

看罷，資本家只要稍微延長一下：二十年以上，五十年以下的習慣的，安逸的，吃得飽飽的，沒有色彩的，不負責任的，放縱的生活，就爲保證自己的「幸福的生活」，他們又在準備着把自己的幾千百萬的工農和殖民地奴隸，派出來打仗，而且是要攻打一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國家，這個國家的軍隊裏的每一個戰士都知道他們將要爲着什麼而打仗。資產階級在自己的全部歷史里，還沒有把自己的非人的獸性，表現在現在這樣的公開無恥的，下流的形式里呢。

然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最近兩年來，歐洲的資產階級特別起勁的，特別無恥的暴露自己的非人的本質呢？對於這個問題，以前的保守黨議員亞爾士爾，霍普京遜，在英國雜誌帝國論論上，給了非常明顯的答復。他「收買人心似的誠懇的」寫着：

「我所要特別着重的通知讀者的，——就是假裝着相信五年計劃不會成功，這是蠢笨的。在許多部門里計劃已經超過了，這是事實。我要竭全力來警告讀者：以為五年計劃要失敗，那是會產生錯誤的，因為事實上五年計劃已經達到了那麼廣大的成功，簡直要變成威嚇整個文明世界的危險。」

霍普京遜非常恐懼的描寫着蘇聯變成脫離世界資本主義支配的國家的前途。他口裏冒着口沫的號召着攻打蘇聯的戰爭。他在那篇文章的結論里，提出這麼一個堅決的警告：

「鐮刀和錘子將來對於歐洲會像過去的半月形（註三）一樣。這也許是對的，所謂「誰舉起劍來，他就要死在劍底下。」

然而以後的五七年歷史將要告訴我們，誰不舉起劍來他要死得更可恥。」

這一個過去的人比古斯塔夫·梭林威要聰明些。他一點兒也沒有提起「共產主義的野蠻」，因為他大概很懂得共產主義和野蠻是不能並存的。他不像別的白癡似的，亂叫些「文化的滅亡」，共產主義要破壞牠了。他的狠叫，正是恐懼蘇聯變成不受世界帝國主義支配的國家所引起來的。

人道主義者先生們，看罷，引起私有財產者的恐懼的是什麼，憎惡蘇聯的原因，誣蔑工農政權和

註三 半月形是土耳其的國徽，這是說以前回教徒征服歐洲的事實。

生活，誣蔑牠的民衆的原因在什麼地方；這個民衆的奇妙的精力已經開闢了新的，全人類復生的時代，人道主義者先生們！請你們准我提出這麼一個天真的問題：

爲什麼你們不提出抗議，反對那種國家制度——那是容許極少的少數精神上破產的人來支配大多數人的生活，用自己的罪惡來毒害大多數人，使他們窮困、愚昧，把幾千百萬人的民族送上戰場去自相殘殺，無意識的爲着武裝浪費極大數量的鋼鐵和土地里的其他寶藏，這些寶藏是屬於勞動民衆的，應當保證他們的將來的。

你們不覺得這個無意識的制度，是你們柏拉圖式的幻想着的，真正的全人類文化的生長的障礙嗎？

世界文化界的慘痛

(安特里)

高爾基的死，不但使全蘇聯，而且使全世界都感到慘痛，俄羅斯人民的偉大的聲音，通過了高爾基，傳送到我們這裏，甚至在最遼遠的國家，都發生了一種回響。正因為這個原故，我才在這裏表示着，不止是我個人的悲痛，而且是法國文學家的悲痛，歐羅巴文化界的悲痛，甚至全世界文化界的悲痛。

文化之為特權階層的所有，那是很久很久的事了。為要佔有文化，就得有餘閒的必要。整個的一個階層勞働着，為的是要少數的有閑者享樂他們的人生，增益他們的知識。文化、文學、藝術的花園，祇是私有的財產，不讓最進步的人們進去，也不讓最有才能的人們進去，都只是為着從小就毫不知需要為何物的人們而開放在那兒。智慧並不一定和財產不能分開的，這倒也是常常很顯明的事。法國文學家裏頭，像莫里哀 (Moliere)，狄德羅 (Diderot)，盧騷 (Rousseau) 這樣的人物，都是從民間

產生出來的，可是他們的讀者却完全是屬於有閱者的一邊的。

偉大的十月革命，攪動了人民的深處，那時候，在西方，就有人說，再三地說，甚至幾乎都相信着，這一驚人的浪潮，會要掩沒了文化。還有一些人說，那是一定的，一旦文化變成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時，文化就發生危險了。一切國家的作家們，都從他們的不可逃避的責任感方面出發，回答了這一問題：不錯文化是發生危險了，然而這種危險並不是由於解放的，革命的勢力而來；恰恰相反的，是由於那些竭力鎮壓和破壞革命勢力以及竭力鉗制革命思想本身的岩層那一邊而來的。對文化加以危害的，祇是法西斯主義和狹隘的人為的民族主義，與真正的愛國主義是毫無緣分的，而且與對本國的深切的愛情也絕不相關的。

我自己本該出席目前正在倫敦舉行的國際保衛文化作家會議的。爲了關心高爾基的健康狀態的驚人消息，我便趕到了莫斯科來。就在這個許多光榮的悲劇的事蹟曾經歷過的疆場，又從世界的眼睛都在指望着的列寧基這個地方，我要代表倫敦會議的各作家，同時以我個人的名義，高聲地宣說：偉大的國際革命勢力應該負起保衛文化的任務。他們應該保衛文化，並賦予以新的光輝。

我們的文化的運命，是與蘇聯文化的運命，直接地緊相聯繫着的。我們一定要保衛這前者。

正如把結合全世界普羅列塔里亞的偉大統一的努力，站在各國個別的利益以上一樣，全世界共同的統一的文化也在個別的民族文化以上；這一文化，產生於各國文學的特殊形態中真切地活著的最有入性的事物中，就如約瑟夫同志告訴我們的話：『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社會主義的。』

我曾屢次說過：作家的個性越濃，特色越多，他的讀者圈也就越廣，因為越富於個性，就越顯得富於人間性。再沒有別的一個俄羅斯作家，比高爾基更富於俄羅斯色彩了。而且，再沒有別的一個作家，比高爾基更發動全世界的觀聽的了。

昨天，我看見人們怎樣地走過着高爾基的靈柩。看不盡的，是無數的婦女，兒童，以及各界的勞働者，而高爾基正是他們的友人，他們的代言人。那時，我在養鴉之中這麼想：這些人們，如果在蘇聯以外的任何國家裏，就是根本踏不進這個大廳的人們，一走到文化公園的門口，就得碰見這些可怕的字條：『禁止入內，』『私產重地。』眼淚突然湧上了我的眼眶，我想着，在這裏是這樣自然的，但在我，一個從西方來的人看來，似乎還顯得這樣地驚異哩。

我又想，在這裏，在蘇聯，有些事物確然是新的，出入意外的；截至現在，一個偉大的作家，在世界各國之中，某程度地總近乎是一個抗鬥者和反叛者。意識強大地或微小地，形式明顯地或隱晦地，他的所思，他的所寫，總是反對着一些什麼的。他決不贊同一切。他的心腦中醞釀着抗鬥和反叛的酵素。那些有勢力者，當局者，如果能夠預見及此的話，他們會毫無疑義地認出他是敵人了。

而現在呢，在蘇聯，這個問題是首先變得不同了：凡作家而同時是革命者的時候，他決不站在反對派的一面了。正相反的，他表現着大眾的意志，人民全體的意志，而尤足令人驚動的，則還表現着人民領袖的意志。這個問題似乎已經是打消了吧。這種再建設的過程是非常奇特的，是人的心腦不易立刻把握得住的。而這還不過是蘇聯許多事物中的一種，值得蘇聯在這繼續動搖我們的舊世界的驚人的時日中誇耀着的。蘇聯已經在一個新的天空中照耀了新的星斗；蘇聯已經展開了新的問題，而新問題的存在，直到如今，我們從不懷疑。

一個驚人的光榮的使命，落在高爾基的運命之中——這使命乃是把這一新的世界和過去的世界聯繫起來，並且鋪設一條通到未來的世界去的橋梁。他目覩了前天的壓迫，也目覩了昨天的悲劇的鬭爭。憑藉其強大的力量，他促成了今天的確固的，輝煌的勝利。他代表了那些不能用自己的話

言發言的人們，也代替着今天已經能夠發言的人們，說了話。從今以後，高爾基是屬於歷史的了。而他的地位卻站在非常偉大的人們的行列中間。

直接地從民間來的——有力的，堅實的。

（羅曼·羅蘭）

我和高爾基相結合的感覺，是特別奇妙的，原來，我們倆是從地平線上的兩個極端地反對的地點出發而相遇在一起的。他是個純血統的俄羅斯人，而我卻是個純血統的法蘭西人。他是直接地從民間來的，有力的，堅實的，而我卻是從舊的布爾喬亞汜出身，病態的，可也包含着一種不可克服的思想。他的足跡遍及各地，他的腳至於出血，而這正是他的教育，我卻僅僅擦開了我的肘子，擦開了中學和大學的座椅上的我的外袴。我很知道，他——高爾基——的生活，從一種物質的意味上說來，是很惡劣的，可是從一種道德的意味上說來，我不知道我們之間究竟誰的生活是較惡劣的。然而我們倆都不得不從偏見底殘跡和亂石中找尋我們的出路。戰士們，有出於民間的，也有出於布爾喬亞汜的，不過，那些從布爾喬亞汜走出來的戰士們，往往比前者所走的一條路還更困難。在這意味和

罪惡之夜，創造光明，總是這樣困難的呵。

不過，有趣的是：我們大家都在一道工作着，巍然地在我們的追求之最終的路程上彼此互相碰見了。我們頓然憬悟了：我們都是同志和同盟者。我們私人生活的環境和氣質，雖是大大地不同，但我們的生活，使我們非解決同樣的問題不可。

一方面，我們倆都熱烈地感覺着國際文化的高度價值，感覺着在諸世紀的過程中人類全體所積聚下來的財富的寶貴。

但在別方面，我們更不得不瞭解那些財富的保護者的這階層的道德，那些佈置着「一七八九年革命」的這知識層的道德，都是不配做這樣的事體的。而況他們的佈置革命目的並不在解放人民的全體，而是在把他們的「封建思想」替代封建制度的廢除了的遺產。

遠在十月革命以前，高爾基在俄羅斯就早已起來爭取真正的文化，並且反抗布爾喬亞的知識份子。他斥責着知識階層的消極性，思想的惰性，浮囂的文詞。恰恰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在若望·克里斯托夫（Jean Christophe）（註一）那篇小說中反抗着那關對了藝術和人類思想的巴黎盛行的

直接地從民間來的——有力的，堅實的。

直接地從民間來的——有力的，堅實的。

二一〇

『開鋪子思想』(註二)反抗着偽善思想，反抗着『理想主義者的謊語』，反抗着假裝美學者和花言妙語的文字紡織者。這就是說：『宗教是民衆的鴉片。』然而最近的十五年間歐洲文學和藝術方面，麻醉作用遠更厲害。他們麻痺了社會的意識，並且僅僅爲了逃避社會的責任而寬容了歐洲的罪惡。他們創立了以逃避現實爲目標的安全之塔。對於一切背離了生活而說着『我願從此洗手』的人們，他們都不惜給以助力，即使是眼光最遠大的人，像佛勞培爾(Fraiber)之類，也以爲精明的幻想和思想可以不需有行動的必要。到了十九世紀的末期，特萊佛斯事件(Dreyfus affair)(註三)激起了一切心地高尚的人士，例如左拉(Zola)之類，但這也不過是一時性的爆發，在這期間，人們誠然是與知識份子中的少數代表們聯合着的。

註一 若蜜·克里斯托夫是羅爾的一部最巨大的長篇小說，作於一九〇四——二二年。三年後以此獲得諾貝爾獎金。

註二 開鋪子思想，是指專聽個人私利和實際事務的思想。

註三 『特萊佛斯事件』一八九七年，法國國家黨排斥法國的猶太種人，誣陷猶太種人陸軍大尉特萊佛斯實因，說他把秘密軍事地圖賣給德國人。那些中了狹義的愛國主義的毒的法國人，全都仇視起特萊佛斯，終於把他判處了流刑。左拉等憤憤不平，指駁政府，並組織特萊佛斯後援會。

然而隔了不多時候，這些知識份子便又很快地回到了他們的老巢，其實他們一向就不會爬出過那邊。在最近的十五年的邊程中，我們中間最優秀的份子，都不會能夠脫出個人主義的柵欄。我們只孤立地行動着，憑我們的良心作為行動的指導。這里有着我们的強處，卻也有着我們的弱點。我們所可告代於這一環境的，是我們的獨立性和無助狀態。對於這點，本文的作者所感覺着的要比許多別的作家們的來得強烈。當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的時候，他（註四）曾經大聲疾呼地「反對世界的大屠殺」，他用了被征服者的悽慘的自傲寫着：「我並不是爲要說服歐洲而寫作，我似乎只是爲要寬慰我的良心而寫作的。」我們的立足點是不穩的。我那時一九一四年所理應的，以及戰後喚召民衆起來的「精神獨立」宣言，只是一株向天空伸出了樹枝的好看的樹吧了。然而那裏並沒有泥土可以使那株樹生出根鬚的。如果不把那株樹本身移植到人類中去，移植到民衆中去，移植到積極的民衆中去，如果不移植到比一種消極的民衆的泥土更深沉的地方，那就是說，如果不移植到黑土的深處，那株樹畢竟還是會死去的。高爾基正是一邊從黑土里生長出來，一邊又把他的根鬚埋在黑土裏了。現在，他溶合着普羅列塔里亞的自我意識。他乃是這階層的知識份子的表現。他們是分不開來的。

註四 此處的「他」指本文作者羅蘭。

直接地從民間來的——有力的，堅實的。

至於我，在這三十年的路程中，爲了找尋我的民衆，爲了把我的根鬚埋植在民衆中間，我的路就困難得多了。

在一九〇〇年，我寫作了我的一本民衆劇場（People Theatre）會用着這樣的字句結束了那本書：「你們希望有一種民衆藝術的產生。這樣，你們就得開始去找尋你們的民衆——自由思想的民衆，不爲物質的需要和難受的勞役所壓迫的民衆，不爲偏見和宗教狂所蒙蔽的民衆，以主人自居的民衆——他們現在正爭取着鬭爭的勝利。可是這些民衆，我還不能找到。這些民衆，我還不能在西方找到。」

我期待着這些民衆，我從兒童時代以來，一直是竭力在找尋這些民衆，然而我的周圍的泥土，竟是這樣地枯乾，這樣地荒蕪。

於是，我遙遙地向着全歐洲伸展我的根鬚，使我自己和俄羅斯民衆的多產的部分，和蘇聯的深處發長起來的豐富的生活結合起來。就在那悠久的地下的工作之後，我的根鬚碰着了高爾基的根鬚，而且像兄弟似的和他們結合起來了。

爲人類幸福而生活

(曼狄爾文威格)

人類——具有一個值得誇耀的指環。高爾基曾在他的一篇傑作夜店 (The Lower De-
pity)。中借了一個主人公底嘴巴這麼說。這人，他的性格像一個莊烈的美麗的戰獸向全世界傲然
地鳴響着的，正是高爾基自己。人類底尊嚴及其幸福，乃是高爾基著作中的主要主題。

可是在資本主義底條件之下，勤勞大衆祇經驗着重大的苦難，卻找不到什麼尊嚴和幸福。這一
真理，從人間底下層出來的高爾基，是在他很早的兒童時代就明白了的，他一直背負着非全世界任
何大作家所可得的這些苦痛和難堪。

在高爾基看來，人類及其幸福，並不是像在許多布爾喬亞人道主義者眼中所看出的那樣美麗
而空虛的名詞，這卻正是高爾基生活的目的。高爾基用盡他那偉大的藝術手腕，他那戰士底如火如

茶的熱情，他那個人特殊的生活經驗底一切深刻性，向着摧殘人類的野蠻的資本主義掀起了偉大的戰鬪。

在一九〇八年，富有才氣的十分風行的布爾喬亞作家安特烈夫 (Leonid Andreyev) 雖則和高爾基分隔着一條巨大的鴻溝，然而也還是誠懇地對他表示着愛慕之心：「人確然應該像你一樣地生活……應該在生活底前線，創造……」

這樣的，高爾基差不多經常地在鬪爭底前線和生活底前線，以迄於他的臨終的日子，而現在是完了。地球上任何藝術家底死，不能像高爾基底死那樣地引起幾千萬勞動者底憤痛的激動。這決沒有誇張，這卻是赤裸裸的事實。

天下的人，都已經知道許多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革命家。然而在高爾基以前，這樣一個以言語的天才和不倦的革命底驚人的有效的結合，獻身於勞動者底目標的人，卻是從來未曾見到過的。這種結合，實在可說是無匹的，而在全世界的被壓迫者和被擄取者是有意義的，爲的是高爾基自己就是從民間的最低深最受壓迫的地層出來的。

這一切，就使他和大眾親愛地聯繫着，不論他們的皮膚是什麼顏色，也不論他們的家庭是在什麼地方。高爾基生前，不僅是被重視爲一個偉大的經典作家，而且是全世界最爲人愛讀的作家之一，甚至初學者也都能讀懂他。

作爲一個藝術家，高爾基賦有光輝的才能。他是第一流的天才。是一個和俄國文學的建設者普式庚、果戈理、托爾斯泰這些人物並肩的偉大作家，在他的壯麗的用語底通俗性方面，在他的特殊的俄羅斯生活底描寫方面，他是徹底地民族的，同時他是深切地國際的，而且是屬於整個世界的。

伊里奇，他是很賞識高爾基的，曾不止一次地批評着說，高爾基「賦有着特異的藝術手腕，已經是而且將來也是，對全世界普羅列塔里亞運動發生巨大作用的。」約瑟夫底有名的文化公式：「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社會主義的」，在高爾基身上確然被發展到齊全的程度了。他的「暴風雨的使者」，（即「海燕」，「母親」，「夜店」）他的反抗者底，流浪人底典型，他的俄國商人的全部陳列所，以及他們的可怕的貪慾，雖則是從俄羅斯生活中以豐富的具體的事象被描寫着的，但在人民大眾底意識底形成上，卻擔負了一種重大的革命任務。

高爾基是一個具有異樣的力量和意志的藝術家。差不多半個世紀以來，他高踞在全國和全世界的文學地平線和社會地平線之上。他經歷着兩個時期，以三次底革命爲分界線——即是資本主義底沒落時期和社會主義底勝利時期。他有精明的觀察力，優美的想像，光輝的豐富的文字，才氣和細緻的生活認識。徒步的，他跨過了全國廣大的區域——烏克蘭，克里米亞，北高加索，外高加索，他參加過一打不同的行業。

因此，他能夠向着好奇的世界表現出在榨取者底鞭下的人底苦難底煌煌的全圖，用着非常的力量，他把不光榮的資本主義底實踐中的一切戴假面具者底假面具撕了下來。他的勢力，他的範圍，是這樣地偉大，即使是高爾基底一卷作品，也就足以震撼世界了。他的敵人就要害怕得發抖，榨取者和榨取者的朋友們也就要橫加反抗。

藝術家的高爾基，乃是一種高級的革命制度的形象，因爲他是一個非凡的文字駕御者，正如盧那卡爾斯基說，他是散文底音樂家，他使用文字是替勞働人類服務的。他自己就是勞働人類底一份子，入於勞働人類而又出於勞働人類。——一個典型的民間俄羅斯人，帶着他的故鄉，他自底，諳符

果洛特 (Nashin-Novgorod) 的口音。甚至他的化名「高爾基」的意思就是「苦難」也是從民間的生活中取來的。

從他成爲緊迫的普羅列塔里亞革命底暴風雨的海燕起，一直到他的最後呼吸爲止，他一向是人民的眞實子孫。他的精神，他的忠實性，決不爲他的健康大損的青年時代底不幸所壓抑，也不爲布爾喬亞社會的排斥或可惡的布爾喬亞的詭辯所撲滅，甚至監獄和流放，也不能威脅他。他已經挺身起來爲解放人類而鬪爭，他便從不放鬆。

作爲藝術家的他的特異的創作，卻並不自滿自足。他感覺着自己是一個政治的戰士，而且這樣地幹起來了。最初和伊里奇，其後和約瑟夫底友誼，在他的世界觀底形成上，是演着三種巨大的作用的。他並不放下他的著作事業，卻作爲一個戰士捲入了鬪爭底前綫，並在政論中以及其他文章中反映出一切重大的事件。

他不只是一個藝術家。他實是一個英勇的，誠實的，戰鬥的入道主義者。這是在這里的最高級最純潔的意味上說的。這種人道主義，不僅僅跟天衆發生了影響，並且影響了世界知識階層。

他蔑視着中間底商人階層。他在文學作品里，在每次的公開談話中攻擊了它。他扶植着尊嚴感

和公民權，就正因爲這一理由，他對於名不符實的公民是毫不留情的。

他猛烈地恨惡着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在他誠然是不能相容的，它象徵着理性、尊嚴和進步的壓抑。高爾基反抗着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多數派一樣，他也認爲這一戰爭是無意義的，而且是一種很可怕的罪惡。

他暴露着虛偽的流淚的感傷的人道主義，並對着全世界大聲疾呼地說：「若果敵人不來屈服，自己就一定消滅它。」他徹底地信任着理性和人道主義底勝利和康閱尼斯姆底勝利。他的信念，乃是一種不可撲滅的信念，因爲在合理的社會主義路線上組織而成的人類底天才，本來是不可克服的。

這一切——他的第一流的才藝，他的無我的獻身於勞動者的事業，他對主張的堅執，他的戰士般的英勇堅毅——都是使高爾基甚至在革命以前就成爲俄羅斯文學界的一個特出的人物。革命以後，他便被公認爲它的領袖，佔領着具有驚人的聲勢和權威的一個地位。

高爾基對他自己的責任，看得非常嚴肅。這兒，我們不能把他對於蘇聯文學所做的工作——一列舉。在他的經常的創作活動以外，他更提高了，實踐了許多有興味的觀念：「內戰史」、「工廠史」，使

人們認識蘇聯底成就，此外還計劃出版『十九世紀青年底故事』和『偉人生活』這類的書。

他培植了許多青年作家，給他們展開了最大的心願，用各種的方式幫助了他們。同時，他對於他們的作品，尤其對於較成熟的作家底作品，所取的態度卻是非常嚴格。看他自己的工作上的巨大的容量和對自己的嚴格的態度，就正是一個模範。

這些特質，以及他目標上的特殊單純性，使他這樣一個沒有受過特殊教育的人能夠成爲世界上最有文化教養的人物之一。從高爾基這模範身上，也可以知道一個爲人民底福利而工作的藝術家，一個受到人民擁戴的藝術家所能達到的成就。

高爾基底一切作品底樞軸，就是人類。『一定要學習去愛人類，視爲我們行星上的最美麗最特異的對象的時候，』——高爾基這麼寫着——『我們才可從我們的生活底卑劣性和虛偽性裏面解放出來。懷着這樣的信念，我來到了人間，也就是懷着這樣的信念，我將離開人間，而在告別之際，我將毫不動搖地相信，總有一天，世界一定要認出人類乃是『聖中之聖。』』

在他爲着人民底幸福的繼續不斷的戰鬥中，在聯合着勞働人民而且密接着多數派的一種戰

關中，高爾基達到了歷史上任何其他作家所沒有體驗過的一種幸福。在他的眼面前，他的崇高的，尊貴的人類底夢，正顯現着活生生的形象。

附錄：

M. 高爾基的死，舉世含悲，這是大家都已知道了的事實，現在保留在這里的，凡三篇。第二篇作者是「法國保衛文
化作家協會」書記 P. 紀德，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高爾基出殯日在紅場追悼會上的一篇演說。第二篇
爲 R. 羅蘭所作，該文寫於一九三五年羅蘭訪問了高爾基以後，直到高爾基逝世，才在蘇聯發表。但我是根據莫斯科
科日報譯出的。我痴心這題目已經不是羅蘭的原稿了。第三篇是蘇聯作家曼代爾支威格所作的悼文，一併收入本
書，作爲對於這一巨人之死的永久紀念。

爲 了 人 類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

著者 高爾基
譯者 白勤
發行人 華勤
出版者 華勤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實價國幣 元

1
0022